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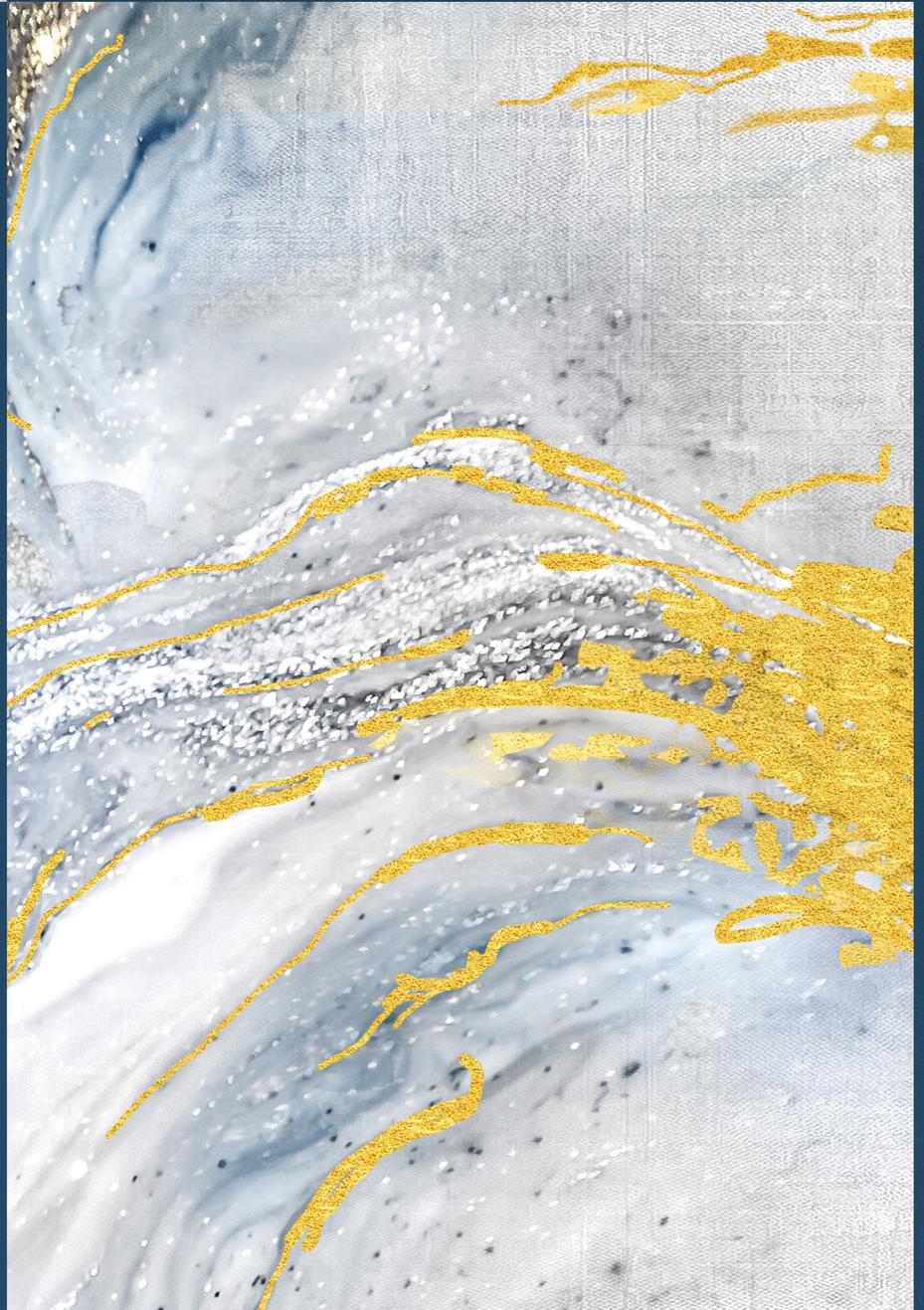


太和文明論壇
Taihe Civilizations Forum

第五届

太和文明論壇

内容集锦



2021.09.05-11

目 录

太和文明论坛简介	
太和智库简介	
开幕式致辞.....	001
分论坛主旨演讲.....	015
国际关系分论坛中美关系研讨会.....	015
国际关系分论坛中欧关系研讨会.....	050
经济科技分论坛.....	078
教育文化分论坛.....	122
青年对话分论坛.....	146
分论坛重要观点综合摘要.....	151
媒体传播.....	177



太和智库
Taihe Institute



Taihe Institute



太和文明论坛
Taihe Civilizations Forum

太和文明论坛简介

中国传统哲学经典《易经》有言：“保合太和，乃利贞”，展意为自然赋予万物独特禀赋，成就各自品性，协调万物并济，达至最高和谐，是为“太和”。其旨在引导人们正确认知本我与世界，体悟其中深蕴的哲学道理，创造共同价值，进而获取源源不断的生活智慧与前行动力。

几千年后的今天，人类社会虽然步入高速发展轨道，但人类文明传承与可持续发展却面临种种挑战。科技飞速演进对社会伦理制度的冲击、人类生存环境面临的多重威胁、国家地区经济发展的失衡、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冲突等，正严重影响着人类文明体系的和谐运转与共同价值观念的建构。

2017年，太和智库发起创办太和文明论坛，每年一届，以“探寻共同价值，共谋和谐发展”为根本宗旨，以“科学文化，未来伦理，共同价值”为主题，以“严谨客观、面向国际、着眼前沿、务求实效”为原则，聚焦人类文明共生共享，发掘研究矛盾问题根源，寻求平抑化解冲突之道，旨在促进国家地区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人类社会和谐恒续发展。



太和智库
Taihe Institute



Taihe Institute



太和文明论坛
Taihe Civilizations Forum

太和智库简介

太和智库是 2013 年在中国北京成立的民间智库，以“凝聚全球精英，寻求共同价值”为使命，秉持“关注时代需要”的行动理念，致力打造高质量智慧产品，为中国发展贡献决策建议，为国际交流提供智力支持。

太和智库聚焦国际关系、民族宗教、教育文化、经济、科技五个研究领域，与中国政府各有关部门建立了课题委托关系，并接受各级地方政府委托，开展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太和智库与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艾森豪威尔基金会、欧洲学院等近百家中外机构建立了合作与交流关系，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湖南大学、湘潭大学等高校建立了联合研究中心与研究机制。同时，太和智库还是“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和“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成员单位、中美青年创客交流中心专家委员会主席单位。

太和智库与全球主流媒体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并持续通过媒体伙伴和自有平台对外发布研究成果。太和智库定期对外发布英文电子期刊“TI Observer”，部分重大研究成果以“太和文库”形式集结出版。

2017 年，太和智库以“探寻共同价值，共谋和谐发展”为宗旨，以“科学文化，未来伦理，共同价值”为主题发起创办太和文明论坛，每年一届。目前，该论坛已成为重要的学术交流和公共外交平台。2019 年，太和智库发起成立“太和青年国际学者联盟”（简称“TYISA”），为中外青年精英交流互动提供了全新平台。

开幕式致辞

首先我对太和智库举办第五届太和文明论坛表示祝贺!

本届论坛是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肆虐、全球经济复苏艰难、气候变化咄咄逼人的大背景下召开的。

论坛将聚焦中美关系、中欧关系、气候变化、职业教育、青年未来等问题。我希望与会的中外嘉宾能就这些问题进行坦诚、深入和理性的讨论,从而洞悉未来之变局,探索大国相处共存之道;寻求应对气候变化对人类生存威胁的对策之举;提出振兴职业教育的路径方略;指明青年未来的发展方向。

思想的交流,观点的碰撞,必能激发出奔涌的真知与灼见。



吴海龙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

我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 Orlins。2020 年 8 月是我第一次通过网络参加太和文明论坛，没有想到一年后，我又一次只能通过网络参加论坛，跟我的老朋友彬哥和各位见面。

过去的一年多，中美关系经历了很多，世界经历了很多。我很高兴看到今年的论坛将从国际关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讨论我们共同面临的重大议题。我非常期待在接下来的几天跟大家交流。



Stephen Orlins

美国美中关系
全国委员会会长

第五届太和文明论坛即将举行。一路走来，太和文明论坛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尊重历史、面向未来、尊重多元、开拓对话和交流，这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我认为，在当今世界上，如何就文明的多元性、世界的多元性达成共识，是对全人类非常大的挑战。全球化的势头势不可挡，更多的人被卷进这一历史的大潮。如何达成对世界多元性的共识，以及在这个基础上为人类开拓更多互相交流、互相理解、互相进步的机会，都需要很多人的参与。

我特别想强调一点，就是青年的作用。我长期在大学工作，和许多优秀的青年在一起，我越来越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他们有全球视野。他们经过了现代知识体系的培养、训练，一路成长起来。他们有很多国际经历，很会交朋友，有很强的语言能力，有的甚至掌握多达十几国语言。他们希望能够帮助我们来面对未来前所未有的挑战，通过合作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困难和挑战。发达的网络也给我们开启了很多新的思路。希望年轻人在太和文明论坛的平台上起到更多的作用。



袁明

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
北京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大家好,我是 Susan Thornton,中文名叫董云裳。我退休前一直担任美国外交官,现在是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我很高兴加入本届太和文明论坛主席团。

我希望通过本届论坛讨论如何应对当今国际社会的共同问题,比如卫生健康、新技术及其影响、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以及全球治理等。

我相信,唯有建立积极的国际关系和有效的治理体系,我们才能够抓住机遇,迎难而上,共同推进全球化。

同时,我还希望讨论如何让现实、务实、切实的举措蔚然成风。



Susan Thornton

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
蔡中曾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

太和文明论坛本着面向国际、求真务实的原则来探讨科学技术、人文伦理等方面的问题。

中国政府在去年提出了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远大目标，和全世界共同来探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或者叫做低排放发展的道路。我们的目标就是为了保护地球家园，把一个美丽的地球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在这样一个大的问题上，我们可以求同存异，共同探讨如何实现低排放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一点上，中国需要与世界的合作，世界也需要中国的参与。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太和文明论坛应该本着去伪求真、求同存异的原则，不断地去发掘合作的机会，共同推动人类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李俊峰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
国际合作中心首任主任
中国能源研究会常务理事

朋友们，距离我们上次相聚已经过了一年。新冠肺炎疫情阻挡不了世界的日新月异，出行限制也无法消除跨国威胁。纵使我们齐心协力，气候危机依然持续，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愈发严重。

全球经济一片低迷，国际关系正面临信任危机。在这一关头，我们更需要坚持国际合作和多边主义。新冠肺炎疫情表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中国人民团结一心、英勇抗疫，给全世界树立了榜样，让我们大受鼓舞。

现在，我们应该携起手来，抗击疫情、全力止损，解决气候危机，共商、共建、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我相信，太和文明论坛将为此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Rashid Alimov

太和智库高级学者
上合组织秘书长(2016-2018)

各位来宾,大家好!我是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张新生。目前我研究的主要领域是信息通信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这是我第二次参加由太和智库举办的太和文明论坛。太和智库为我们开展思想交流、研究新技术和新发展、提出新的观点和意见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平台。感谢太和智库邀请我参加这次论坛。

第一,信息通信技术给我们带来的新的红利。

第二,由于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世界变了,人类社会变了。

第三,由于世界整体的变化和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过去我们信息通信技术的一些单项技术或者单项产品、单项服务,再也不能适应我们今天新世界发展的需求。技术发展的一个大的趋势,就是信息通信技术融合跨界发展的趋势。

第四,大国之间在信息通信领域欲占领的高点是什么。

第五,信息通信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中所面临最大的挑战是节能减排,也就是要实现碳中和的目标。碳中和的重任给中国信息通信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同时,利用好信息通信技术和数字技术,也同样可以为实现中国的碳中和目标带来好的解决工具和方案。将信息通信技术、数字技术与碳中和结合在一起,就能更好地完成中国的碳中和目标。



张新生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通信科学技术委员会秘书长

大家好, 很荣幸受邀参加本次盛会! 第五届太和文明论坛聚焦人类文明的三大支柱——科学文化、未来伦理、共同价值。这是我最关心的三个话题, 也是我在各种会议上常常谈到的三个话题, 因为这是我们构想未来世界绕不开的核心问题。

我们先来聊一聊科学文化。可以说, 这是一个科学的时代, 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很多, 人类历史上所有科学家加起来都比不上当今科学家的数量。我们生活在一个基于科学、信息和知识的时代, 一个拥有海量数据的时代。这些数据经过梳理就变成了信息, 而信息经过解释就变成了知识。但我们需要的不只是知识, 更需要智慧。所以, 面对自然科学知识, 我们要学会运用社会科学的眼光以及人类的聪明才智。

昨天, 我们回顾了最近的四个世纪, 科学研究给人类生活带来的种种便利逐渐融入了我们的生活, 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粮食产量充足, 卫生水平上升, 死亡率下降, 教育普及, 幸福感提高。科学已经战胜了迷信、恐惧和成见。科技创新创造了一种现代模式, 方便了私营和公共部门的合作, 也方便了教育和培训设施。科技创新紧密依托于研发以及保护专利和版权的法律体系, 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提升了幸福感, 极大丰富了我们手头的资源, 最终将对我们的社会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经历了战争的考验后, 面对越来越多的毁灭性武器, 我们逐渐意识到有必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比如保护人权, 拒绝奴隶制, 打击殖民主义以及关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我们已经认识到, 过往的错误亟需在全球范围内采取补救措施。我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全球性问题, 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粮食安全、水资源管理不善, 我们赖以生存的空气、水源、土壤和植被遭



Ismail Serageldin

阿塞拜疆尼扎米国际中心

联合主席

到污染。为了因地制宜地应对这些全球性问题，我们需要充分调动科学力量和优秀的科学人才。

如今我们深陷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病毒无差别地威胁着我们每一个人。这时候，全球合作显得尤为重要，不仅仅需要通过检测、治疗和疫苗控制疫情，更需要共同制定能惠及贫困阶层的政策方案，而不是只满足权贵们的需求。

得益于信息通信技术革命，在当今社会中，信息以光速进行传递和交换，同时，科学机构也不断向开放科学体系迈进。但遗憾的是，还有许多别有用心的团体在攻击、抹黑科学。他们提出阴谋论，声称科学不过是精英话术的新花样，但事实上，科学是唯一自带纠错机制的知识生产形式。科学始终承认我们的知识不尽完备，需要不断取得新数据和新进展来改进我们的观点，这就是科学研究和科学进步需要完成的任务。面对那些抹黑科学的人，我们目前还没有太多回击手段，但真正的科研人员会永远团结在真理的旗帜下，而真理终将扫清丑恶政客和无良媒体在社交媒体和电视上共同编织的谎言之网。

那么未来将会如何？前三次工业革命改变了我们的世界，创造了现代社会。每一次革命都带来了新的科学进步，从蒸汽机到电力和大规模生产，再到当前数字技术的兴起，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风口浪尖。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的预测，本次工业革命的颠覆性将是过去几次的 3000 倍。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是人工智能的出现以及物质、数字、生物世界间趋于模糊的界限。这将开启一个全新的世界，我们应该重新思考这样一个新世界的伦理观，未来的伦理需要我们对当前的伦理准则做出调整，以应对未知的挑战。

这些挑战主要来自四个方面。第一，制定指导方针，应用新技术解决医学、农业和工程领域一直存在的问题。在过去，一个人生与死的状态是很容易区别的。而现在，新的医疗技术造成了新的伦理困境，比如何时给病人上生命维持系统，何时又该拔管，谁来替病人做决定。现在，临终问题还要考虑到道德层面。在信息通信技术革命和新生物学的共同作用下，随着现代医学持续大步迈进，在不久的将来，这样的困境会越来越多地出现。而在生命周期的另一端，胚胎研究也需要仔细谨慎、合乎伦理的指导、监测和评估。

第二，需要指导新领域的行为。这个领域可以是太空，也可以是地球上无人踏足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前所未有的问题。比如，就太空而言，我们需要考虑太空垃圾处理、太空军事化、月球和其他行星的殖民以及摆在眼前的问题——如何管理数以千计的卫星所导致的交

通拥堵以及卫星是私人机构所有还是政府机构所有的问题。而在深海也可能面临和太空类似的问题。

第三，我们需要应对重大技术突破所带来的全新挑战，比如核武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基因组编辑和合成生物学的潜在力量，甚至是脑机接口技术能带来新的可能。所以，要利用好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力量就需要相应的伦理准则，因为技术上可行不等于伦理上可行。现在，人类已经展现出应对此类问题的能力。比如，我们已经掌握了核能技术。75年前，美国轰炸了广岛和长崎，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人类遭受核武器的打击。

第四，在我们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中，有一些的严重程度已经使问题本身发生了质变，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气候变化。我们对弱势群体和我们的后代、包括那些尚未出生的人都有伦理层面的义务。但伦理不仅是为了获得科学和技术，更是为了造福社会。我坚信，各国在本世纪将团结一致，用于指导2000年至2015年全球发展的千年发展目标就是好的开始，而目前全球所采用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将指导我们2015年到2030年乃至以后的共同行动。

这让我想到了共同的价值观这一概念。先来谈谈科学的价值观。科学事业需要特定的价值观、事实和团队合作，与他人一起进行颠覆性创新，还需要自由、想象力以及仲裁争议的方法。科学家始终坚持科学的价值观，其态度之严谨远非其他职业可比。事实上，任何编造数据的科学家都将被逐出科学界，永不接纳。出于利益而解读数据可以理解，但编造数据是无法接受的。在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中，科学领域是最崇尚事实的。科学家需要忍住发表个人见解的诱惑，这很重要。在大多数的科学领域，团队合作已是必不可少，而团队合作的本质是确保团队的所有成员得到他们应得的认可。

科学进步依靠的是推翻现有范式，至少也是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修改现有范式。因此，每当新一代科学家做出自己的贡献时，科学事业就会产生一些颠覆性成果。正所谓不破不立，没有推翻就没有科学进步。但我们对牛顿的尊重和钦佩并不因为爱因斯坦的成就而减少，这两位科学家都值得尊敬。不断更新和进步正是科学事业的特征。科学需要容忍对立观点，在证据支持和理性判断下解决主观的争议。科学需要自由，让人们去探索、去挑战、去思考、去想象，如果被迫循规蹈矩，不敢挑战成规，科学就无法进步。科学在发展中需要理性和稳定，科学不能容忍攻击。

科学面前，人人平等。科学家们关心科学工作的内容，而不是谁完成了这项工作。科学对所

有人开放,不分国籍、种族、宗教、性别,这些科学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值得捍卫。这不仅是为了我们对科学的追求,也是为了创造一个更美好、更人道的社会,真正的现代社会必然具备这些普世价值观的核心部分。

今天,科学是一项全球性事业,全世界的科学家形成了同盟,建立了全球科学共同体。他们有着共同的语言,并用超乎常人的严谨态度对待这些行为规范。现在,除了这些科学价值观之外,当代社会还必须坚持其他一些价值观,包括同理心、利他主义、对美和艺术的欣赏、了解并尊重人与自然的相互影响、尊重和支持法治、在富足中不忘消除贫困和饥饿等等。如果大家都接纳这些价值观,我们的社会将变得更加友善、美好、自由、平等、正义。

各位,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开始,我们可以看到,科学为我们提供了新技术,这些新技术将释放超乎想象的能力,让我们有能力改正过去的错误,用新方法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贫困、饥饿、性别歧视、种族歧视、贫富差距等问题。我们将采用科学的政策和讲求证据的法规,忠于我们所坚持的价值观,为下一代考虑。铭记被遗忘的人,激励失去希望的人,包容不被接纳的人,向弱势群体伸出援手,让我们用今天的行动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明天!

今年的经济科技分论坛将聚焦碳达峰、碳中和的主题进行研究讨论。碳达峰、碳中和是当前关注度非常高的一个话题。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中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总书记的讲话是中国基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因此,从今年起,主席团也将把碳达峰、碳中和作为太和文明论坛的重要议题,予以持续和长期关注。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当前仍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阶段中后期,能源总需求一定时期内还会持续增长。2020年,中国GDP是100万亿人民币,这是一个令人瞩目的数字;但同时,我们也是世界最大能源消耗国,去年的能耗是50亿吨标煤,也是一个令人瞩目的数字。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发达国家有60年到70年的过渡期,而中国只有30年左右的时间。这意味着,中国减排的难度和力度都要比发达国家大得多。毫不夸张地讲,碳达峰、碳中和将给中国带来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政府的庄严承诺将倒逼中国的经济结构、能源结构、金融结构乃至全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向可持续发展方向。这是重大的国际责任、社会责任,同时也蕴涵着巨大的发展机遇。今年经济科技分论坛的主题“责任与机遇——碳达峰、碳中和的科技驱动力”也是基于这样一个目的所设计的。

碳中和的实现过程是一个系统性的创新体系构建过程。在技术创新这一侧,要依赖低碳技术、零碳技术、固碳技术还有负碳技术创新;在体制机制这一侧,我们的GDP结构、社会治理方式、经济管理模式、国际合作模式都要探索形成一些制度化创新成果进行支撑。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太和文明论坛所关注的重点,在接下来的活动中,我们将有多位业界专家,从政策、产业、金融等多个视角对此进行深入解读和探讨。



孙永福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中国商务部欧洲司司长
(2003-2015)

很高兴受邀出席由太和智库主办的第五届太和文明论坛，在此，我谨代表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对本届论坛的隆重举行表示热烈祝贺，并预祝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多年来，太和智库和太和文明论坛不断汇聚精英，聚焦当代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热点问题，展开广泛的交流和研讨，汇集众智，建言献策，为中国社会经济的改革发展，为中外文明的互鉴互学做出了积极贡献，令人印象深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发展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当前，推进现代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不仅是中国教育事业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重要内容。对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十分重视，中国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发展，中国建立起了世界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培养了数以亿计的技术技能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为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支持。

随着中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直面人类社会百年未有之变局，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深刻影响人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大背景，中国职业教育的改革创新也迎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为此，中国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了要“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的新命题，根本要求就是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瞄准科技变革和产业优化升级，着眼新发展格局，推进职业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的、适应数字经济数字技术发展的技术技能人才和能工巧匠、大国工匠，更好地服务中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刘建同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
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我们认为,对世界各国来说,职业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意义具有普遍性。因此,在以“一带一路”倡议为重要标志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过程中,中国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发展的经验既能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十分有益的借鉴,也能为全球的职业教育治理提供中国的解决方案,并由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的贡献。

国际关系分论坛 中美关系研讨会

处理中美关系， 中国需要怎样的“护栏”？

不久前，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来华会谈，带来了一个新词——“护栏”。可以说，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造词能力还是很强的。“护栏”一词听上去很顺耳，似乎表达出维护两国关系、避免发生冲突的意愿。然而从历史经验来看，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之所以说美国人是造词高手，是因为美国人造出的词听起来好听，用起来好用，而其产生的效果则颇为狠辣。

细品之下，“护栏”背后至少有三层意思。

第一，美国不会改善中美关系，未来中美关系只会更坏不会更好；第二，美国暂时不希望与中国彻底摊牌；第三，美国试图制定中美“竞争”规则，美国称其为“极限竞争”。

正是因为中美关系可能下行，而美国却不敢摊牌，所以要设立“护栏”。“护栏”的另一层作用是在“极限竞争”中限制对方的出手力度。从过去几年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分析就可以看出，中美关系将持续下行。美国全面遏制中国的讨论从奥巴马时代就已开始，到特朗普时代，美国已经无所不用其极。而今天，遏制中国已成为美国国内的“政治正确”。“护栏”一词的提出，只是再次印证了这一判断。



陈虎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世界军事》杂志总编辑
(2006-2019)
《中国军队》杂志主编
(2009-2019)

在处理中美关系时，不仅美国需要“护栏”，中国同样也需要“护栏”。中国所需的“护栏”是为美国划定底线，让其不可越界。

7月26日下午，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会见了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中方向美方提出三点基本要求：第一，美国不得挑战、诋毁甚至试图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第二，美国不得试图阻挠甚至打断中国的发展进程；第三，美国不得侵犯中国国家主权，更不能破坏中国领土完整。这三点基本要求可视为中方对“护栏”的定义和诉求。可见，目前中美两国对“护栏”的定义差距颇大。

中美双方只有对“护栏”内涵达成一致时，“护栏”才可真正成立，否则“各说各话式”的单方诉求无法发挥“护栏”作用。中美双方针对“护栏”内涵达成一致的局面短时间内不可能轻易实现，而达成一致的过程并非仅靠谈判桌上的唇枪舌剑，更多的是“你来我往”的实力较量。双方一旦就“护栏”定义达成一致，中美关系将进入新条件下“和平共处”的稳定期。

可以想象，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国将不断利用自身局部优势，向中方发起试探性进攻。而一旦某一方向上的进攻取得突破，便会演化为强力攻势，甚至引发决定性进攻。中方则需把美方的攻势一一挡回，直到美方感到无计可施、只得坐下来谈判为止。

从以上推演可看出，中国需要在发展中补齐自身短板，直到达成中美间的均势。在这一过程中，需特别注意的有两点：其一，不可让美方攻势形成突破，否则中美间将发生大危机。只要中方防线未被突破，中美关系就可在当前状态下保持稳定，反之，中美关系就只得在更加不利的新态势下形成稳定。其二，“对等反制”并非“绝对对等”。在美国目前尚处整体优势的情况下，中国更应采取“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的策略，用局部优势弥补整体劣势。

中美间“护栏”正式建立前实属最危险的一段时期，对美国如此，对中国亦如此。只有度过这一危险期，才有可能最终实现中美关系的稳定与改善。

美中两极: 对和平与自由主义 国际秩序的影响

世界现在是美中两极结构。在军事领域,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显示, 2020 年国防支出的前三名分别是美国、中国、印度。虽然中国国防支出只占美国的 32%, 但印度的国防支出只占中国的 29%。第二大国和第三大国之间国防支出的巨大差距是美中两极结构的核心论点。在经济领域, 中国更接近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 2020 年中国名义 GDP 是美国的 70%, 高于 2019 年的 67%。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 2021 年这个数字将会上升到 73%。同时, 还有很多人预测中国 GDP 到本世纪末会超过美国。美中两国之间缩小的经济差距也支持了美中两极结构的主张。

三个因素共同造成了当前的美中两极结构。一是两极化。鉴于美中两国的国力远超其他国家, 结盟等“外部平衡”措施是次要的, 远不如加强经济实力等“内部平衡”措施来得透明、可靠、可预测。二是核武器抑制了战争。虽然存在核扩散的风险, 但目前核武器还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三是精英阶层。自 2016 年以来, 美中政治精英阶层对彼此充满敌意, 叠加上民粹主义, 抬高了紧张局势。中国采取了更加强硬的外交政策, 美国也在强调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特朗普政府存在两股势力, 以蓬佩奥、纳瓦罗为代表的强硬派, 以姆努钦为代表的温和派。特朗普在两种主张间取得平衡。到目前为止, 拜登则采取了比较统一、比较强硬的对华政策。但随着时间推移, 拜登政府可能会软化下来, 或者向一个更加温和的方向发展。

美中两极结构会产生怎样的结果? 就和平与战争而言, 美中两极结构能够防止大国之间发生战争。很多学者认为, 美中可能因为台湾问题爆发战争。这类分析忽视了核武器对战争的抑制作用, 核武器的存在使美中不大可能因为台湾问题发生战争。



Cliff Kupchan

美国欧亚集团主席

美国和中国都在追求自身利益,并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产生影响。这可分几个领域看:金融领域,中国现在越来越关注金融改革。蚂蚁金服、滴滴等事件显示,中国越来越担心外国资本带来的风险。贸易领域,中国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就非常支持世贸组织的规则和协定,现在则更加关注其在水贸组织内部发挥的作用。中国还可能会进一步加强双边贸易政策。但总体而言,中国对于改变贸易规则和贸易秩序还是非常保守的。科技领域,美国和中国都做出了非常激进的政策变化。特朗普政府以来,科技脱钩已成为常态,美国和中国分别朝向组建集团和自力更生发展。

此外,虽然我今天发言的主题是中国,但美国也是一个长期变量。如果一位极左或极右人士赢得美国大选,将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产生深刻影响。这不仅会影响两国关系,还会影响全球的地缘政治。

中美关系走势的研判

拜登上任后，中美关系比较冷淡。可从以下几方面对中美关系走势进行研判。

从结构性因素考虑，世界格局和世界秩序发生了变化。中国的 GDP 在 2010 年超越日本时就有美国学者称，世界权力中心开始东移，权力从主要大国向中型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扩散。在这样“单极结构的结束和多极结构的形成”过程中，美国的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存在战略焦虑，这源于美国自身实力的下降，也源于世界各国向美国发起的赶超。美国担心中国有朝一日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2011 年，美国出现了政策的巨大转向，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特朗普时期，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又升级成“印太战略”，世界秩序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从长远来看，世界秩序呈现“东升西降”的趋势，权力中心向东半球转移的趋势已经形成，美国已经没有能力恢复二战后“自由主义黄金时代”的世界秩序。

美国的外交决策可从五个维度进行解读，即政府、政党、国会、利益集团、媒体和公众。

从政府维度看，中国已被定义为美国的主要竞争者。美国下一步主要推行的是对华竞争政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对中美关系做出了新的定调：“对于中国，应该竞争的时候竞争，可以合作的时候合作，必须对抗的时候对抗。”但中美并未进入冷战状态，中美之间仍是竞争大于对抗的关系。

从政党维度看，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现象异常严重。美国民主党、共和党虽然在很多议题上意见不一，但还是在对华政策上达成了一致。美国对华态度只会愈发强硬，对华竞争性政策会不断增多。



陈征

太和智库研究员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
高等研究院讲师

从国会维度看，美国国会历来就有对华鹰派的传统。国会对华态度甚至比政府更为极端。

从利益集团的维度看，美国国内的利益集团也存在分歧。在对华投资和贸易中获利的利益集团更希望保持良性的中美关系，而认为自身利益受损的利益集团则强调对华采取强硬政策。

最后一个维度是媒体和公众。美国媒体对中国以负面报道为主，因此美国公众生活在由媒体用信息构造出的“镜像世界”中，美国的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关于中国的虚假信息，甚至包括对中国的污名化报道，从而导致了美国公众对华反感。

当今世界，中美两国面临许多需要共同应对的全球性挑战。没有中美合作，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就是一句空谈。而全球疫情的发展受制于疫情防御最差的国家，也就是“短板理论”。中美必须合作，才能应对此类全球性的挑战。中美经济深度融合，相互依存度很高，这也是两国关系十分重要的压舱石。

从拜登政府的政策优先级来看，拜登首先要解决疫情问题，其次要复苏美国国内经济，接着还需解决美国国内尖锐的种族冲突问题和不平等问题。因此，美国的国内问题优先于国际问题，而中美问题只是国际问题中的一小部分。要解决美国国内的问题，尤其要管控好疫情、促进经济复苏，这都离不开与中国的合作。因此，拜登在面对国内中期选举压力和三年后总统大选的压力时，应优先解决国内矛盾，与中国进行合作。

影响中美关系走势的关键变量是疫情的发展。疫情刚暴发时，中国一度对美抱有善意的期待，认为中美应该携手抗击疫情。但是，随着美国国内疫情走势失控，特朗普政府却选择指责中国，将全部责任推到中国身上。因此，疫情何时能结束？是否会出现新变种？这些都会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势产生较大影响。

总之，在对中美关系走势进行预判时，从长期来看，应关注两个关键量，即中国的经济体量和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而从短期来看，中美关系取决于疫情的走势以及美国经济状况和中期选举。明年的中期选举具有“风向标”的作用，如果民主党在明年失去了国会中的一个院，这就意味着拜登政府提前进入了“跛脚鸭”状态，需要耗费更多精力应对来自美国国内共和党的压力。到那时，拜登即使有心修复中美关系，也无力再去推动。因此我认为，中美关系将继续保持低位运行状态。

中美中产阶级的双边关系

我实际上非常担心，全球正在走向一种对抗性的状态。在这种不断恶化的环境下，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全新驱动力。我认为，美国和中国的中产阶级可以扮演这个角色。两国政府的优先事项都与中产阶级相关。拜登政府将如何解决美国中产阶级衰落的问题置于政策核心，中国也将消除贫困当作重中之重，两国都强调扩大中产阶级的规模。

当然，华盛顿存在一些不同观点，例如认为中国中产阶级规模的扩大并没有使世界变得更加和平与繁荣，或者担心只有中国受益，而美国的国家利益则受到损失。但这些问题的原因之一其实是美国的经济结构存在一些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了解到经济全球化对于不同国家、不同社会群体的影响是不一样，可能造成更多的不平等。美国确实从经济全球化受益了，但美国中产阶级并没有太多受益。从中国改革开放到 2019 年，中国人均收入增长了 25 倍。然而美国中产阶级却在缩水，从战后占美国人口的 70% 到七十年代初的 61%，再到现在的 50% 左右。

当然即便如此，美中两国还是可以在以下四方面实现中产阶级之间的合作。一是建立共同的身份认同。美中两国虽然存在着历史、文化以及政治上的差异，但两国中产阶级是比较相似的。他们在生产方式、保护私人财产以及维持全球经济稳定等方面分享着相同的观点。这些共性能够帮助我们展现出同理心，尊重彼此的共同愿望和利益，而不是将对方妖魔化。二是拥抱人文外交。中美关系不仅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存在着人与人之间联系。我们在外交政策领域要考虑到其他的一些可能性，比如人文交流。在 2020 年疫情暴发前，34% 的美国留学生都来自中国大陆。当美国重新恢复签证时，85% 的学生都拿到签证并回美国学习，这足以证明人文交流的持续性。三是减少对华尔街的关注。如果我们只关注华尔街，只关注精英或者巨富阶级，这将是不可持续的。我们也要考虑中小企业。拜登政府有时只强



李成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
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
及外交政策项目
资深研究员

调与中国的竞争，却损失了双边合作的巨大潜力。四是建立稳定性力量。郑永年也认为，在任何的国家，中产阶级通常是比较和平的。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是非常大的转变，会重新把资源转到国内发展，使美国的中产阶级受益。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都在转向国内，重点关注经济，努力终结战争。

总而言之，全世界最大的两个中产阶级大国都应该摒弃零和思维，努力找到共同愿景。

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困局

拜登政府上台7个月有余，其对华政策全面评估迟迟不见出台，中美关系没有出现当初人们期望的某种积极转变，高层战略对话更是几乎陷入僵局。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调整的困境，与当下的美国内政有直接关系。然而更加根本的原因在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基本方针与国际关系发展的大趋势相违背。

作为主要的大国关系，中美关系的演变从来都与国际格局密切相关。冷战结束后，全球化促进了世界多极化发展。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实现了和平崛起，美国霸权则日渐式微。与此同时，中美两国也发展了相互依存的经贸和金融关系，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从奥巴马政府后期开始，中美关系逐步呈现结构性变化，这是国际关系格局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特朗普政府2017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大国竞争作为新时期美国面临的主要挑战，同时把中国设定为主要对手，由此将美中关系变成战略竞争关系。其逻辑起点是，迅速崛起的中国对美国全球主导地位构成最大挑战。显而易见，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实质是为了维护美国的主导地位，也就是冷战后美国所拥有的“一超独大”的霸权地位。这是特朗普和拜登两届政府对华战略的共同逻辑框架。华盛顿的决策者无视历史发展趋势和国际关系变化的现实，坚持把遏制中国和平崛起作为维护美国主导地位的主要外交战略，其逻辑设定和目标选择从根本上进入了误区。

与特朗普政府有所不同的是，拜登政府力图显示其总体外交政策更有章法，所以他强调美国的领导地位，同时强调美国回归多边主义。具体到对华政策上，拜登政府突出“用实力说话”和“区别性施策”，即：一方面要示强，另一方面力图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做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



崔立如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2005-2013)

阿拉斯加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中对此做了明确的阐述。他把战略竞争主导下的对华关系大体分为三种情况,也就是所谓的“布林肯三分法”:一是竞争性的关系,“be competitive when it should be”;二是合作性的关系,“(be) collaborative when it can be”;三是对抗性的关系,“(be) adversarial when it must be”。

对应“布林肯三分法”,简要梳理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的对华政策,可以归纳出五类政策目标:

A, 确保美国的主导地位和战略力量优势。这就是要力图削弱和迟滞中国战略竞争力的发展,明确的政策选择是选择性的脱钩,即在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里切断中美之间的交往,同时动员和施压盟国采取联合行动。在此范围内,中美关系是对抗性竞争,是零和游戏。

B, 遏制中国在亚太地区和全球范围影响力的扩大。组织所谓的“民主同盟”,以维护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名义,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对中国的国家事务和对外关系发展进行攻击、阻挠和制约,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在此范围内,中美关系或是对抗性的,或是竞争性的。

C, 维系相互依存的中美经贸和金融关系。在此范围内,中美关系既有竞争性的,也有合作性的。

D, 在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方面,视情与中国进行必要的合作,如气候变化、全球流行病、核不扩散、战略稳定等问题。

E, 对中美之间的分歧进行管理,以避免因误判或意外事件而引发大规模的冲突和对抗。

从形式上看,拜登政府是要实行所谓“有区别”“有管控”的战略竞争。然而7个多月来的实际情况是,“布林肯三分法”运用于五类政策目标,实际上并没有明确的标准和清晰的界限可循。在遏制中国竞争力发展的核心目标辐射下,突出的表现是对抗性竞争的政策倾向;本应积极推进合作的领域和议题基本上都被竞争战略的阴影笼罩而步履艰难,或者根本不在考虑之列。

鉴于以上分析,只要华盛顿决策圈对国际关系演变和中国和平崛起的主流观点不发生转变,加之严重受制于2022年和2024年两次选举的政治需求,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调整很难走出目前的困境。当下中美关系的状况将是未来几年的常态。

美中关系展望

自大选以来，我一直主张希望拜登政府能够扭转特朗普政府对于美中关系造成的破坏。我向拜登政府提出诸多建议，例如停止征收关税，重新审视对 59 家中国公司的投资禁令，不要逼迫中国公司从美股退市，促进商业和学术合作，重开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重启富布莱特在华项目，取消对中国官方媒体的限制，等等。

拜登政府采取了一些行动，有一些和我的建议相似，比如暂停对微信、抖音的禁令，开始向中国学生发放大量签证，禁止使用“中国病毒”等种族主义用语。更重要的是，国务卿布林肯重申了一个中国政策。这都是一些小的行动，但确实是在向前迈进。

美中之间有很多问题是极难解决的，特别是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美中只有通过采取小的、具体的、实际的、有时甚至是单方面的行动，才能够重建信任。正如荀子所言，“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我建议美中两国共同采取五个相对简单的行动。一是在重启科学领域的合作，特别是在疫情防控和气候变化领域。最近的暴风雨和洪水告诉我们，两国需要在这些共同挑战上进行合作。二是就重开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和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进行谈判。三是迅速就降低关税达成协议，这将会使两国人民获得立竿见影的好处。四是就“国家安全”达成一致的定义，不要因此中断贸易和投资。五是尽快开启高层会议，为领导人会面做准备。领导人会面将有助于美中关系的改善。

五十年前，基辛格博士对北京进行了秘密访问，我们也接待了中国乒乓球队。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不受欢迎的举措，但却为现在的美中关系奠定了基础。从那时起，中国和美国都受益于和平友好的竞争，而不是脱钩和对抗。尽管我建议的双边或者单边行动都不能够完全恢复双边信任，但它是一个重要的起点。



Stephen Orlins

美国美中关系
全国委员会会长

新时期中美关系走向很不确定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中美关系的形势，那就是：一个以“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为特征的时期已经结束，而新时期中美关系的走向充满不确定性。

过去的那个时期是指从 1989 年到 2017 年。之所以这样设定，是因为 1989 年老布什总统提出了对华接触政策，而 2017 年特朗普总统上台后，全盘否定了对华接触政策。

1989 年，邓小平提出了众所周知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对外政策。虽然是对外政策，也是心照不宣地回应了老布什总统的对华接触政策。此后，中国按照“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政策处理对美关系。美国按照对华接触政策处理对华关系。虽然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由于在政策上的“知底”，都是“斗而不破”，中美关系虽然没有好到哪里去，也没有坏到哪里去。现在，这个时期结束了。

华盛顿不仅在否定对华接触政策及这一政策所基于的“假设”上达成了共识，而且在重新认识中国和怎么跟中国打交道的原则问题上也形成了共识。大多数美国人都说，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激烈竞争的新时期”。

我认为，激烈竞争只是新时期中美关系的一个突出特点。新时期中美关系的走向仍是很不确定的。这主要基于三个方面考量：

第一，两国的政策之间几乎没有“两相呼应”的地方。这与上一个时期的中美关系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对美政策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并希望这样一个基础上，跟美国建立一种“新型大国关系”。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是“应该竞争的时候竞争，能够合作的时候合作，必须对抗的时候对抗”，并且会按照这样三个“战略参数”处理与中国的关系。



郭长林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针对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三分法”，中国外长王毅明确回应：如果要合作，中方表示欢迎，但合作需要兼顾彼此关切，实现双向互惠，不能单方面提条件、拉清单。如果要竞争，中方不回避，但竞争应当公平公正，遵守市场规则，而不应下绊子、用强权，剥夺别人正当的发展权利。如果还是要对抗，中国也将坦然处之，无畏面对。

可以看出，除了针锋相对，两国在对彼此的政策上没有什么“呼应”的地方，更谈不上什么“相向而行”。

第二，拜登政府的“三分法”会把中美关系推向何方，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应该竞争的时候竞争，能够合作的时候合作，必须对抗的时候对抗”说的都是“活话”，为的是给自己留下了很大的“活动空间”。这个“活动空间”从政策上看，就是很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可以理解为“竞争可以无限边界”（endless frontier），合作可以“虚无缥缈”，对抗可以“没有底线”。阿拉斯加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就是个“没有宴席的鸿门宴”，中美关系以“对话对抗”的方式“重启”，发出了一个明确无误的信息。但阿拉斯加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以来，这一套打法也打得拜登政府自己心里发虚，担心“持续的激烈竞争演变为冲突”。拜登总统在视察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时还指示他们研究，如何既对华保持优势，又能避免中美对抗出现不必要的升级，希望他们为这一目标出谋划策。可见不只是中国不确定这套拳术会把中美关系推向何方，其实拜登政府心里也没底。

第三，美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决定了中美关系的走向是很不确定的。美国国内政治可能正在进入一个“总统四年一换的循环期”。这个循环期从特朗普总统开始，可能要延续一段时期。这样一个“循环期”注定是要更加折腾中美关系的。民主、共和两党把中国推向了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使中美关系成了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尽管两党在对华政策上形成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但是，受残酷的党派政治斗争的驱使，大势还是“比谁对中国更强硬”。恐怕在一段时期内，美国的对华政策会处于“没有最强硬，只有更强硬”的状态。这对中美关系来说是一种“恶性循环”。

未来中美关系怎么走？我们确实不能抱什么幻想，但也不是全无希望。希望在“民之交”，在经贸往来，在作为中美关系桥梁的专家学者。希望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让我们重新架起中美关系的桥梁。

全球化世界中的美中外交

当前,有人说大国斗争是二十一世纪的主流,这让我感到十分奇怪。然而一小群人存在一些极端的想法,并有更多权力来执行其意愿,这也就是我们在讨论大国权力竞争的原因。人类目前面临着许多共同挑战。疫情改变了人们的工作生活方式,尽管我们实施了很多防范疫情的措施,但是我们仍然没有办法进行面对面交流。联合国就气候变化提出了新要求,我们这代人可能会看到更多极端气候,我们的生活也会受到更多影响。全球经济体系在过去几十年中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发展和繁荣,但并没有真正实现全球公平分配,大量民众对此感到不满。二十一世纪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政府来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共同挑战。如果我们把思想局限在大国斗争,不仅无法应对二十一世纪的挑战,还会使我们之前为此做出的努力付诸东流。

我相信美中两国可以认识到开展合作的重要性,只不过还没有说服彼此。同时,美中两国都有非常复杂的社会,需要努力在国内形成共识。否则,美中关系就会因为当前的紧张局势陷入困境。当然,美中之间的问题源于彼此的差异,但在我看来,美中之间的问题与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相比没有那么重要。美中都需要为人类应对全球性挑战做出贡献。

现在国际社会对美中两国有很高的期待。如何才能让美中两国坐在一起面对共同挑战?美中两国需要认可一些现实,比如当前美中两国遇到的挑战不是由其中任何一方造成的,这点十分困难。领导变革的人总是会饱受批评,我们需要认可他们的贡献。美中两国应该开展合作,而不应被困在争端当中。美中两国对于开展合作的期待还是比较强烈的,我们需要更加坚定地推动美中两国进行沟通,这是过去五年里非常缺乏的。当前,美中应努力促成领导人会晤,这有助于舒缓紧张局势,促进两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合作。美中第一个非常清晰的合作领域是抗击疫情。虽然我们暂时无法预见疫情的长远影响,但毫无疑问的是,疫情将会给各行各业带来非常大的变化,包括



Susan Thornton

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
蔡中曾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

旅游、零售、金融等。第二个非常清晰的合作领域是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需要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逐步实现能源、交通以及建筑领域的转型。这一转型需要政府部门和社会部门之间的充分合作。第三个清晰的合作领域是努力避免科技竞争可能造成的负面外溢效应。有时我们能从技术发展中获益，但有时技术发展也会给我们带来风险。美中两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技术密集型社会，并且拥有非常先进的科学技术。美中两国有责任保证彼此间的技术竞争不会引向毁灭。

这些议程在当前都不算是特别现实，但我相信世界仍然会持续提醒我们真正的优先事项，而不被大国竞争分散精力。相信美中两国能够在双边关系和全球合作问题上做出正确的选择。

用文明话语体系探讨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问题

由于受不同历史文化影响和发展阶段存在差异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价值标准,面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问题,需要用文明价值或文明话语为基础进行沟通。所以,面对疫情和百年变局交织,世界需要用文明话语体系探讨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问题。

一、反思范畴——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问题是什么?回答时代之问——文明的根本价值是什么?

反思范畴——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问题是什么?

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问题是什么?这是一个值得世界重新思考的问题。其是用于检查人类观念和行为的总体正当性及其价值矛盾或失衡与症结,以及用于反思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合理性的基本问题。其目的是还原人类历史的实践过程经验,并解释那些常识性和理念性的问题。近代以来,当人类面临严重威胁生命健康的天灾人祸危机之时,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问题或根本问题总要被提出。

人们问得最多的问题可被通俗表达为:人类文明发展至今,为何出现这样严重的问题?而将其上升为思想性的深刻反思就会如此表达:人类文明发展到底是因为什么?到底为什么要重新认识人类文明?

文明与健康的历史依据

回顾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可将其简单概括为“共同体形成的历史



姜晓琪

文明杂志创始社长兼总编辑
首都文明工程基金会
创始人兼执行会长

进程”。

首先，人类是生物共同体，即基因生命体延续、增殖和进化的历史；其次，人类是有效保障生命延续和增殖的文化共同体，在此基础上，人类开始了文明寻梦进程；第三，文明出现后，人类历史就是形成、更新、完善更有效保障生命健康的文明共同体的历史，并继续开始了更高文明形态的寻梦进程；第四，伴随当代全球化进程，生命健康的全球性危机也在形成和加深，共同命运的全球文明形态呼之欲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历史正在出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开始加速推进。

回答时代之问——文明的根本价值是什么？

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人类社会需要携手共同面对。所以，“文明的根本价值”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问题”再度被提出，成为反思的理论范畴。

在如此发达文明的条件下，新冠肺炎疫情来得迅猛暴烈和难以平息，有些国家实施了不利的抗疫政策，使感染人数激增，带来了严重的健康危机。引人发问：文明究竟在进步还是走向没落？人类今后往何处走？

我们需要有意识地审视和反思人类文明发展成果中的不足和短板，关注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问题日益凸显其紧迫性和必要性。

文明的根本价值就是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民众健康是社会进步的基础，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民众的共同追求。全世界积极携手共同抗疫，为建设美好新世界而共同努力，这应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方向，也体现着今天人类文明的根本价值。

二、重新认识人类文明的根本价值是认识人类文明发展共同问题的新起点。

面对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可提出“文明是什么”的新时代之问，“文明为什么”的新时代反思，以及“什么是文明价值或文明尺度”的人类文明发展反思。除此之外，还应反思人类文明的“柔软而致命的腹部”。

全球新冠肺炎病毒疫情肇始于地球生态系统的变化之端，游走于人类密集交往的青萍之末，暴发于防疫疏漏的各种微澜之间，穿越了所有用意识形态和真枪实弹筑起的防线，无差别地攻陷了由硬实力和软实力构成的各大文明圈。

世纪疫情使人类文明发展深陷全球化危机、沟通障碍以及不平等的种族观念等文明软肋造成的危险鸿沟。疫情如此惨烈，说明人类文明发展走到今天，很可能出现了重大问题，走到了未来发展的十字路口。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问题，重新回答“文明是什么？文明为什么？”我们也应对文明价值或文明尺度重新加以认识。

文明是什么？面对自然环境，文明就是共同体的组织性；面对野蛮、混沌，文明就是共同体的有序性。伴随文明的出现，人类开始有效地生存和发展；伴随文明交流互鉴、文明对话、文明传播，更多的人得以有效地生存和发展；伴随文明的更大发展，更多人能够更好地实现生命健康和较为全面的发展目标。这一进程不断体现文明的核心价值——建设公平正义的美好世界。文明是人的伟大创造，创造的目的是让生活更美好，其前提就是生命健康。因为人是文明的主体，只有首先保障人的生命健康，才能促进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

文明是生命健康的组织保障与秩序效能。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用群居协作的形式展开了共同体组织的有效功能，发明了维护生命和健康发展的各种秩序和规则，创造了能够保障生命健康的无数物质技术成果和文化成果。用总体协作与各种具体合作的形式，抗拒各种严重威胁生命的天灾人祸。这是人类主观愿望的合力进程，也是人类文明共同体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性。也就是说，不管“文明”的定义如何多样，在实践范畴中，文明就是生命健康的组织保障体系及其秩序效能。

农耕文明出现时，人类种群数量已数以百万计，而当工业文明出现时，人类种群数量已数以亿计。工业文明的传播与发展造就了人类种群数量以十亿计地增长，各大文明带和文明圈逐渐形成、更新并不断完善了生命健康的有效保障体系。当数字文明出现时，人类数量正逼近 80 亿大关，各大文明圈的人均预期寿命增长了 20 岁以上。其中增长最快的是西方文明圈，其生命健康保障体系使得圈内人均预期寿命已经突破 80 岁大关。

反思结论——什么是文明发展的共同问题？

文明发展的共同问题就是维护健康生活的总体秩序,其包含文明安全的价值秩序,即文明国家的效能与文明习俗传统;文明治理的价值秩序,即多元化主体共治的文明防御实体;文明发展的价值秩序,即产业与生活方式的文明抗疫能力。

中国在全球率先形成了一套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为目的的、有效的抗疫措施。因此,我们坚定地认为:

关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问题,应优先保障更多人的生命健康和美好生活,而不是让少数人追求财富或奢侈生活以及集团利益最大化;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问题就是如何有效构建和维护人类的健康生活方式,绝不能让懒政和劣政、为富不仁和不择手段的劣文化盛行。

三、通过对人类文明发展问题的反思和对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与文明对话过程的重新认识,需要世界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美好的新世界。这就是用“文明话语体系”探讨人类文明发展共同问题的原因。

为什么要提出文明话语体系?

习主席曾强调,“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

文明话语体系以人类文明发展的尺度为基础,有利于不同国家以相同的文明尺度认识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问题,减少东西方文明冲突和意识形态纷争;文明话语体系以文明话语为基础改善国际关系与国际秩序,有利于大家共同认识、关注全球公共利益及共同价值,是世界各国形成共识和走向美好未来的必经之路;文明话语体系有利于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与文明对话进程,有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利于全球携手建设美好的新世界。

什么是“文明超越”?

涉及“文明超越”,中共十九大报告称“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并存超越文明优越”。“超越”是在近代被赋予最多哲学意义的词汇之一,其逻辑前提是在对某个思想基础的包容、承认与合理性传承中,发现其矛盾性、无效性和不合理性,而后在这一

基础上进行上升和跨越,从而重新认知其解释力、概括力和实践力。在文明语境中,“超越”并不意味彻底否定或全面替代,而是在吸收、传承和组织实施了某个文明发展阶段成果之后的反思和跃迁。

人类创造的文明作为主体的价值,是可学习、可传承、可交流与可持续的生存方式或实践结构,构成最高的文化形态,这就是文明。文明的传播和发展就是不断解决其价值悖论与矛盾的进程。

纯粹独立创造和高纯度化的、普世的文明是不存在的,文明是在不断地交流和超越中进行传播和发展的。因此,文明话语体系的关键词是“超越”,是认识论和实践论意义的超越,不含任何阻断、否认、割裂前置价值的合理性。

如果文明是“巨人”,文明的本性更是超越,即开放与包容、学习与借鉴、纠错与创新的升华过程,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非“跪在巨人的脚下”;就是揭露和解决前置价值的矛盾性;就是不断适应从宇宙到地球生态条件下自然逻辑的进程;就是不断开辟新型文明范式和形态的过程。

如果不是这样,人类走不到今天,更没有未来。

文明话语体系的研究方法与目标

一、重新解读中华文明史,建立对自己民族历史和文化遗产的敬仰意识;

二、重新诠释世界文明史,确立对世界发展进程的辩证观念;

三、重新分析中国发展的世界意义,进一步建构和推动文明话语及其理念;

四、重新研究文明传播普遍性规律,针对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缺陷,弘扬中华文明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渊源与开创性作用;

五、重新构建文明价值的认知方式和话语体系,建构富有中国智慧的全球治理理念与模式;

六、重新阐释和表述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发展形态,创新中国文化的象征符号,在文明传承和文明升华中重塑中国人的精神价值,以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再谈文明是什么?

文明作为价值概念,是社会历史发展方式和有效成就的表征;同时,文明作为种族、民族、国家集群的整体发展,是世界历史和现实的实体范畴,是开放、动态、复杂的巨系统,其包含了种族、民族、国家群落的结构体系。也就是说,人类文明是一种进步发展的特质文化,这种特质文化的创立传世、繁衍存续、交流互鉴、互动交融、吐故纳新、不断升华,通过文明交流互鉴与文明对话,构成文明传播和文明价值形成发展的过程。

文明交流互鉴与文明对话的具体形态是指人在改造客观世界、协调群体关系、调节自身情感的过程中所各自表现出来的时代特征、地域风格和民族样式。在文明进程中,只有通过文明价值及文明话语的传播、交流与互鉴,即文明对话和文化交融,才能达到人类社会的升华境界。

拜登政府“联盟制华”战略 能否如愿以偿？

拜登执政至今，仍在延续特朗普政府时期遏制打压中国的政策。但相较特朗普政府，其方式手段明显不同，拜登政府的联盟制华趋势明显，且已在各方面进行布局。这既是民主党建制派、自由派基于长期“民主同盟”与“均势外交”理念的现实反映，也是拜登政府着眼国际格局变化和中美实力消长，对特朗普政策的及时修正以及对奥巴马政策的翻新升级。

拜登政府需要的不是简单的联盟，而是意图在四个领域打造针对中国的联盟，分别是阻止中国改写所谓“世界规则”的民主治理联盟；遏制中国建立所谓“霸权”的地缘安全联盟；抵消中国经贸影响力的全球经济联盟；以及确保中国无法占据二十一世纪科技制高点的高新科技联盟。

在民主治理联盟上，美国欲将“美式民主”作为划分盟友伙伴和对手的标准，以“保护民主原则和普世价值”为口号，拉拢盟友共同实施对华竞争。其拉拢的目标成员包括“五眼联盟”、印太地区和欧洲“志同道合的伙伴”，抓手则为新疆、香港、西藏、“人权”、宗教等问题。

在地缘安全联盟上，美国想以美印日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为基础，将日本升级为印太安全体系的支柱，还欲加强与印度在对华安全问题上的合作，巩固印度“主要防务合作伙伴”的地位，使其在安全问题上倒向美国。美国加强与菲律宾、泰国等东南亚传统盟友的防务合作，扩大与越南、新加坡的“安全合作伙伴网络”，并争取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家加入，帮助台湾地区发展所谓“不对称防御能力”，鼓励英国、法国、德国和加拿大等域外盟友扩大在印太的军事存在，使中国陷入地缘安全包围网。

美国牵头主导全球经济联盟，联合那些反对所谓中国“胁迫政策”的



钱峰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
研究部主任

国家、试图减少对华经济依赖的盟国和伙伴、寻求摆脱所谓中国“经济控制”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其他期望从供应链调整中受益的国家，如印度。

高新科技联盟以美国为主导，以 G7 等发达经济体为中心，包括所谓“民主国家和地区”，从而让信息、资本、技术、人员在联盟内部自由流动，对外则划定好边界和管制范围，进行高技术严格审查，实施对华科技封锁。

然而，拜登政府的“联盟制华”战略有相当多软肋。安克雷奇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之后，拜登政府在中国议题上全力出击。表面上，拜登政府将对华立场成功写入了西方国家一系列高峰会议的联合声明，但这其实暴露出美国无法仅靠自身实力强压中国低头屈服的客观事实。

目前，除澳大利亚等少数几个“反华急先锋”外，美国其余盟友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均未在对华问题上做出明确表态。可见，美国在欧洲和亚太地区的盟友伙伴是在利用美国“联盟制华”的心理捞取好处。因此，“联盟制华”看似摆脱了特朗普政府“单打独斗”的蛮横套路，符合所谓的“政治正确”，也契合二战以来美国传统的外交理念，但在现实中却困难重重。

第一，美国的地位已不复当年。美国战略界均认为，美国应“先打好内功，做好自己的事”。在他们看来，美国当前所面临的问题既是技术性的，更是结构性的。其根源在美国国内，并非来自中俄等竞争对手。受疫情难控、经济衰退、政治极化、社会分裂等影响，美国当前的软硬实力下降态势明显，拜登也无法划清与特朗普主义的界线，美国的众多盟友难免心存疑虑和忌惮。拜登政府欲在内部问题缠身的情况下恢复美国昔日国际信誉并重建所谓全球领导地位，说易行难。

第二，中国已远非“吴下阿蒙”。中国历经数十年积累，无论是综合国力、经贸实力、经受疫情考验的治理能力，还是多年来始终坚持的合作共赢外交理念，都为中国赢得了更广泛的国际“朋友圈”。亚洲的未来更可能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来书写，而不是以“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来书写。

第三，美国以意识形态划线背离了当今的时代大势。当今世界的意识形态环境已发生巨大变化，以意识形态标准建构国际体系的吸引力已不复当年。美式“民主自由”历经特朗普时代已千疮百孔，美国的国际号召力已经大幅下降。美国期望如昔日那样仅靠“民主自由”的理念来引领世界的想法已经不切实际。

第四,美国组建安全联盟存在先天不足。与美国战后组建的各类联盟相比,拜登打造围堵中国的地缘安全联盟这一做法并无新意。一方面,印太地区各国的安全诉求、利益诉求不尽相同,军事联盟体系在多边层面相对松散,无法达到北约的高度和层级;另一方面,拜登政府从欧洲、中东、印太三面向欧亚大陆发力的布局显然超出了美国现有实力,美国终将会面临“给我上”和“跟我上”之间的平衡问题。

维持良性竞争，实现中美共存

目前的中美关系，是一种竞争式的大国关系。在承认中美之间存在战略竞争关系的同时，要努力把中美竞争关系保持在良性竞争的范围内。这是比较现实和明智的态度。

中美双方现在都承认，彼此之间是一种竞争的关系。但是双方都不承认也不认为，中美竞争关系是意在把对方彻底消灭的恶性竞争。中国仍希望与美国保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8月16日，中国外长王毅在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时指出，中美两国要共同寻找在这个地球上和平共处之道。美国布林肯国务卿也同意美中实现和平共处是共同目标。

何为良性竞争？良性竞争和不良性竞争之间最重要的指标就是竞争双方的目标。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提出，中美之间竞争的目标是实现“共存”——追求中美“竞争式的共存”，而不是努力去消灭对方，或者是共同毁灭，这是维持中美良性竞争的基础。

在确立良性竞争的目标之外，要维持良性竞争，还要坚持四个原则：

一是必须明确双方非敌的定位。拜登总统一再强调，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这对于中美关系非常重要。但更关键的是，除了口头明确彼此不是敌人外，还要在行动中确认中美竞争是非敌对关系的竞争，要明确不以消灭对方为竞争目标。我活着也让对方活着；可以去阻滞对方但是不要去阻止对方，可以去遏制对方但是不要去遏杀对方。目标是有限的，定位是明晰的。

二是认同双方的价值观和利益都具有合理性。中美两国坚持各自的价值观和维护自身利益是正常的竞争行为，应互相理解和尊重。不管是美国的民主自由，还是中国的以民为本、安全与发展都应该得到彼此的理解和尊重。中



王湘穗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国和美国谁也不是妖怪。

三是以建设性方式竞争。竞争应该有规则：可以是乒乓球，两边隔着打；也可以是美式橄榄球，有合理的冲撞。但中美两国之间必须存在共同确认和恪守的规则，可以有“护栏”，也可以有规则制约下的合理冲撞。中美之间基本的占据主导地位的相处方式不应是对抗，也应是给彼此挖坑，应该是竞争做更好的自己。

四是坚持非暴力的底线。竞争不是战争。中美要共存于世，就要避免直接针对对方的暴力行动，控制混合战争的领域，建立管道和“护栏”。谋财而不害命，谋财尚可容忍和理解，害命是无法接受的。良性竞争应尽可能地避免直接使用暴力。

从目前情况看，中美关系的好消息是，两国对竞争的目标和原则基本持认同态度。这是中美关系向好发展的起点。但中美关系也存在着坏消息，一是特朗普前政府在和中国达成协议之后又挑起了全面的竞争和对抗，破坏了双方的互信，导致两国间目前存在的信任赤字；二是最近美国国会通过了一系列涉华法案，极大地限制了拜登政府与中国开展良性竞争的余地。

综上所述，中美之间要实现良性竞争，需要双方付出很大的努力，也包括需要今天晚上各位朋友付出的努力。

现阶段中美关系的六大矛盾

最近一段时间，世界被三件大事所困扰。一是新冠肺炎疫情形势更加严峻，二是极端天气频发举世震惊，三是中美关系停滞徘徊。其中，美国实施所谓对华大国竞争战略，严重干扰了世界正常的政治经济和公共安全日程。

中美关系现阶段低位停滞徘徊。前不久，中美外交高层在天津举行拜登就任总统以来的第二次接触。相较 3 月的安克雷奇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天津会谈的接触层级下降。虽然双方交流坦率，但实际并未达成明确的共识和承诺。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责任在美方，而解铃还需系铃人。下一步，如果美方对中美关系没有明确而又积极的定位，没有改正错误的实际行动，则中美高层在近期内没有任何实质接触的可能性。

有关当前中美关系的内容和实质。涉及对华关系，拜登政府提出了“合作、竞争、对抗”三位一体的策略。中国早就提出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美国没有接受，而中国也未曾公开放弃。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锋明确批评美国人的“三分法”是遏制打压中国的障眼法，遏制对抗是本质，合作是权宜之计，竞争则是话语陷阱。

在此背景下，把握中美关系的内容和实质，需要精准的概念定位和逻辑边界。从形式与内容角度看，中美关系有四个方面的矛盾斗争。

一、制裁与反制裁的矛盾。从特朗普政府时期开始，美国就展开了对中国企业和个人的制裁，一直延续至今。最新的制裁与反制裁发生在美常务副国务卿访华前。美国四大部门联手对中国香港发布所谓商业警告，肆意扰乱香港营商环境。中方将包括美前商务部长罗斯在内的七位美方人员列入实体制裁清单。美国对中国企业和个人实施制裁，其意图就是扼杀中国的经济、科技发展。



王在邦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二、脱钩与反脱钩的矛盾。“Delink”的本意就是“断开联系”，手段包括对中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阻止美国高科技企业对华投资，也阻止中国高科技企业对美投资，阻断中美高科技领域的交流合作，阻止中国高科技领域专家和学生赴美访学。美国对华经济和科技脱钩的目的是迟滞中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进程。脱钩迫使中国加快优化产业结构步伐，加大科技领域投入，更加坚定地走自力更生道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三、威慑与反威慑的矛盾。这主要指美凭借其在核与常规军备领域对中国的明显军事优势，在南海、台海和东海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地方，摆出一副好战且自信必胜的姿态，妄图迫使中国在国家核心利益方面妥协退让。而中国恰恰不信邪、不妥协，坚定地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四、颠覆与反颠覆的矛盾。这主要指依据其主观臆测的所谓中国党和政府与民众的矛盾，通过合法和非法的途径，以公开和非公开的方式，通过人员招募、派遣和渗透，在中国境内推动西方所谓“民主”和“自由”的价值观，物质上诱惑中国年轻人，理念上鼓励中国年轻人仇视、蔑视中国党和政府领导人，策动颜色革命，从政治上颠覆中国。在此方面，美国中情局 1951 年就编制了颠覆中国的《十条诫令》，几经修改完善，一直沿用至今。中国则通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完善社会治理，大力开展反间谍、反渗透、反颠覆斗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挫败美国颠覆中国的图谋。

中美关系上述四个方面的矛盾斗争，在本质上又反映着两对矛盾斗争。

一是遏制与反遏制的斗争。美国对华制裁、脱钩、威慑与颠覆，目的很明确、很集中，就是为阻止或大大迟滞中国的发展。美国绝不愿意看到，更不愿意接受中国发展可能超越美国的前景，不管中国是不是以超越美国为战略目标。中国要发展，要不断提高全体中国人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就不可能对美国的遏制熟视无睹、无动于衷。美国遏制中国发展就是要剥夺中国的发展权，这是非正义的行为。中国反遏制的斗争是争取和维护发展权的正义斗争。

二是霸权与反霸权的斗争。美国为了维护自己世界第一强国的实力地位，千方百计地遏制中国发展，这是彻头彻尾的霸权主义。这种霸权主义要比仗势欺人的大国沙文主义、强权政治更恶劣，更加不可饶恕。

中国反遏制，就是反霸权，就是主持国际正义。如果中国不能理直气壮地反对并成功挫败

美国的遏制, 这个世界就没有希望, 人类社会就没有前途。

在互动态势上, 中美关系表现为“美攻中守”的矛盾。美国先发制人, 中国后发制人。美国先发制人所表现出的是强者自信、危机感与战略焦虑, 其要凭借自身的优势, 阻止事态继续向于其不利的方向发展。中国后发制人, 体现出来的是新兴强国的谦虚、定力与自信, 相信时间在我, 真理在我, 正义在我。

我相信,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中美关系的互动态势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因为霸权主义有其内在的生命逻辑和历史逻辑, 只要称霸, 就免不了破产衰落。

美国在对华认知上出了大问题

当前中美关系出现严重困难。中美下一步是走向冲突与对抗，还是缓与改善？这是令所有人都关注的问题。中美关系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根源是美国在如何看待中国、判断中国上出了严重问题。错误的判断必然导致错误的决策，错误的决策必然产生错误的结果。

美国认为中国是其“战略竞争对手”和“潜在敌人”，认为中国要取代美国的地位，中国要改变现行国际秩序，中国不按国际规则办事，中国占了美国的便宜，中国侵犯了人权等等。美国对华的这大堆的认识和判断，没有一个能占得住脚，没有一个能说得通。

中国这几十年确实发展得很快，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这一方面是中国发展的路走对了，另一方面得益于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各国的合作。在中国几十年的发展进程中，美国始终是中国的一个重要合作伙伴。中国得到了发展，美国也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可以说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中国的发展壮大从未损害和威胁过美国的利益。中国从未想要取代美国。中国不想当老大，更不想称王称霸。

就实力而言，中国人均 GDP 只有一万美元，而美国是六万美元，中国再发展三十年，人均 GDP 也只有美国现在的一半。至于 GDP 总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几年前中国已超过美国，但这并无太大的实际意义。中国的 GDP 总量最终会赶上和超过美国，但“赶上”和“超过”并不意味着要“取代”。中国有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意愿，但目前，人民币只占世界储备货币的 2% 多，而美国占到了 60% 多。在金融、科技、教育、军事等方面，美国仍然有着全球最强的实力。美国的政治家、战略家和学界对自己太没自信了，太低估了美国，太高估了中国，而核心问题是没有弄清楚中国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什么。中国的发



吴海龙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

展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让人民过上越来越美好的生活。中国不想与谁争高低,中国不想与谁搞对抗,更不想欺负和威胁任何人。

断定中国要改变现行的国际规则和秩序根本不能成立。今年是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五十周年。五十年来,中国一直忠实地履行联合国的宪章,一直认真遵守联合国的有关规约,尽到了作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责任和义务,为完善全球治理,解决各种热点问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国是现行国际规则和秩序的受益者和贡献者。说中国不按国际规则办事,要颠覆现行国际秩序毫无道理。反倒是美国对国际规则和秩序合则用,不合则弃。

美国口口声声说中国在贸易上占了美国的便宜,为此与中国打了一场贸易战,对中国商品加征高额关税,逼着中国买美国货。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场贸易战打的意义何在?中美贸易还在增加,美国还是逆差,增加的关税大都摊到了美国消费者的头上。贸易就是做买卖,一个愿买,一个愿卖,两厢情愿,互利互惠,根本就不存在谁占便宜,谁吃亏的问题。

美国一直指责中国的人权问题。但不管是涉港、涉疆、涉藏等问题,都是中国自己家里的事。中国不出台香港国安法,香港反中乱港势力、港独势力能被制止吗?香港能安定繁荣吗?香港问题压根儿就不是人权问题,而是中方维护国家稳定、安全和统一的问题。今年初美国暴徒冲击国会,美国政府不也下令抓捕、调查、问罪吗?新疆涉及的是反恐、反极端、反分裂势力的问题。总不能说美国在阿富汗反恐是正确的,中国在新疆反恐是错误的吧?至于西藏,涉及的也是反藏独分裂势力的问题,也与人权问题无关。如果美国有人要把夏威夷或阿拉斯加分裂出去,我想美国政府决不会坐视不管。美国拿人权问题说事,如果不是故意找茬,就是别有用心。

新冠肺炎疫情似乎是中美关系恶化的催化剂。中国是疫情最早的受害者之一。但中国从未加害过美国。美国疫情失控,感染和死亡人数激增,那是美国政府防控不力,举措失当造成的。不能把美国政府该承担的责任甩到中国身上,把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不满迁怒于中国人民,更不能通过罔顾科学和事实的病毒溯源,把祸端栽赃于中国。

中国不想挑战美国,但也不允许美国损害中国的利益,遏制中国的发展。中美关系要想改善,中美要想避免冲突和对抗,最根本的问题是美方要改变对中国的认知,要理性、客观、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的发展,看待中国的对华政策,重新审视中美关系的定位,重新评估中美的利益关系,重新调整美国的对华政策。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美关系的解冻和回暖也需要一个过程。但只要双方都能相互尊重，都抱有诚意，都争取务实的态度，都从两国关系和世界的长远利益考虑，都能对彼此做出正确的判断，中美关系重回正轨也还是有希望的。

为何拜登政府继续把中美关系推向对抗

拜登上台前，针对中美关系是否可以脱离特朗普时期的敌对与对抗这一话题，曾有观察家发表较为乐观的预期，认为中美关系会趋向缓和，中美间高层对话机制也可能恢复。但到目前为止，这些预期并未实现。

中美关系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会沿对抗的轨道进行。其中包含三个主要因素：一、结构因素；二、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因素；三、美国政府新团队的背景、资历等个人因素。

首先，是较为根本的结构因素。过去一段时间，中美逐渐走向大国战略对抗，其背后存在四重激化中美关系的矛盾，且从美国的角度看，此类矛盾均很难化解。

第一重矛盾，美国认为中国有可能挑战其霸权地位。美国长期在国际体系中充当具有全球行动能力和支配国际秩序能力的超级强国，并且从未真正遇到过可与自身等量齐观的对手。美国需要强力维护自身的霸权地位，而中国是唯一有潜力动摇、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国家。因此，美国的决策者是从“零和博弈”角度看待中国崛起的。

第二重矛盾，美国昔日占据了全球产业供应链的金字塔地位，获取了最高的附加价值，在垂直分工的地位上享受着巨大的经济益处。而中国过去在国际经济分工中扮演着产业链中下端的分工角色。随着中国的科技能力提升、产业升级，美国感受到了压力。未来，中国可能会在新能源、生物科技、航天和太空等新兴科技领域赶超美国。如此一来，在科技领域享受了 70 多年绝对优势并位于价值链“上位圈”的美国，担心会失去或被削弱自身产业竞争力，因此展开了全力防范。



朱云汉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第三重矛盾，美国过去主导着全球政治与文化相关话语权，其将自身的社会、经济、政治模式当作普世标准。而中国目前所展现的发展经验——“中国模式”对美国模式的普世性、优越性构成了挑战，美国对此难以承受。鉴于中国的社会模式与核心价值与美国存在很大不同，中国也有可能的发展中国家中取代美国的话语权优势，与美国展开展发展模式的竞争，进而挑战美国模式的普世性和美国的话语权。

最后一重矛盾源于美国国内的结构矛盾。美国政治经济体制性矛盾产生了严重的贫富差距和不同群体间的经济利益冲突。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利益加剧美国国内的分配不均。美国内部为了转移该矛盾，更倾向找“代罪羔羊”，将国内的劳工失业、产业空洞化归咎于非法移民或中国。特朗普就是极力煽动此类情绪的代表。

所以，这四重矛盾在短时间内，尤其是在美国的霸权心态下，都不易化解。因此，这是驱动拜登政府继续把中美关系推向对抗的根本力量。

第二个重要因素有关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态。拜登赢得总统选举的过程非常惊险，而且民主党在国会的多数优势非常脆弱，美国参议院内基本两党势力均分。拜登可谓是在特朗普的巨大阴影下进行执政的。由于特朗普煽动美国对中国的仇恨、疑虑情绪，并渲染、夸大所谓“中国威胁”，美国被民粹氛围所笼罩。因此，拜登团队绝不可表露对中国示弱的态度。

比如，特朗普时期所遗留的贸易战，以及价值 3600 亿美金的中国进口货物仍需额外征收关税。尽管拜登的财经幕僚明白这对美国并无裨益，相当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但碍于遭受媒体和国会批评的可能性，拜登的外交团队仍不敢轻易主动加以取消。所以，拜登脆弱的政治基础让其瞻前顾后，让其不敢做对的事情，唯恐共和党和民粹主义者对其责难。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最后一个重要因素，包括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在内的拜登新团队资历尚浅，缺乏大格局和大智慧，只有小聪明和花拳秀腿，无法看清全球大格局。虽然他们声称“中美在一些重要的全球议题上可以进行合作”，但他们从未真正布局，并未据此设定中美关系的新走向。因此，拜登的新团队没有胆识，也没有相关的政治操作能力。

目前存在许多重大议题，如全球变暖问题、新冠肺炎疫情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人类社会造成巨大的伤害与干扰。从中长期来看，这对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存在巨

大挑战和威胁，但遗憾的是两国却无法就此形成合作共识。

面对全球疫情，如果中美两国携手合作，形成全球共同行动，必将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同理，朝鲜问题、反恐问题，以及近期出现的阿富汗战后重建问题也是如此。但是，拜登的外交团队并未展露相关胆识与魄力。总之，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并不乐观。

中欧之间的文明对话 需要更多的宽容与理解

中欧关系是两种文明的对话。我们这两种文明之间的对话曾经给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带来了非常丰富的知识，并使双方受益匪浅。但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中欧之间的交往可能需要更多的宽容和理解，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更多的共情。唯有这样，才能使两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持续下去，并让我们双方继续受益。

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文明交流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汉唐与罗马帝国的交往。那时，中欧之间就有很频繁的贸易往来和文明对话。而我们最为熟知的，还要数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到中国的见闻。他与中国元朝皇帝忽必烈结下了比较特殊的关系，回到欧洲后，他的一位狱友将他的见闻写成游记。这本书在欧洲广泛传播，而东方文明、东方文化也开始引起了欧洲人的关注。

十六、十七世纪，罗马教皇开始对中国感兴趣，派了第一批传教士到中国传教。这批传教士发现了中国文化的绝妙之处。他们的首要任务本是把罗马天主教传给中国人，但他们却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把包括四书五经在内的中国典籍都翻译成了拉丁文传播到欧洲。这些中国典籍对欧洲文明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启发了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在整个十八世纪，“中国风”是欧洲启蒙时代的重要参照。



丁一凡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中欧之间的文明对话对双方都是非常有益的。中国文化影响到了欧洲，反过来，欧洲当时领先世界的数学、天文学知识也经传教士特别是利玛窦的传播，对中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中国的朝廷和民间第一次意识到世界上还有其他文明，中国文明可以通过跟其他文明的交往丰富自身的内涵。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的成就建立在“利玛窦规矩”之上，即天主教传教士不干预中国人的风俗习惯，特别是要尊重中国人崇尚祖宗的传统。利玛窦向传教士们嘱咐道，虽然中国人的这些传统跟天主教原则以及欧洲的行事方式并不一致，但仍要予以尊重。在此基础上，传教士传播的宗教文化被中国所接受，并被发扬光大。

但是到了清朝初年，教皇克雷芒十一世变得非常不宽容。他要求传教士们不再尊重中国的文化传统，禁止中国的天主教徒继续崇拜祖先，让他们放弃所谓“落后”的风俗。中国皇帝康熙因此大怒，痛斥传教士们违反了“利玛窦规矩”，干预中国的文化传统。于是，康熙下令禁止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并将不尊重中国传统的传教士包括教皇派来的枢机主教多罗驱逐到了澳门。此后，中欧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陷入了停滞，这是历史上的一个教训。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与欧洲交流变得愈加频繁。通过文明和文化的交流，中国从欧洲引进了许多现代知识，包括国家治理模式、企业管理形式。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曾经请了一些欧洲人来改革中国的企业，甚至请了一些德国人来当中国国有企业的厂长。应该说，中国和欧洲的交流对于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对于中国现代治理的改善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而欧洲国家通过跟中国的交流，也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开始重新评估历史传统的作用。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最近几年欧洲的舆论重新开始变得不那么“宽容”了。他们开始对中国的社会治理模式评头论足，说三道四，抱怨中国人没有走欧洲人指出的那条道路。这些批评和指责自然引起了中国官方和民间的反弹。于是，双方开始互相指责，针锋相对。

我们需要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如果今天的欧洲像当年的教皇克雷芒十一世一样，认为他们有能力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时中国的社会治理模式，那么中欧之间的交流也一定会像当年一样陷入某种僵局，这种发展趋势无助于中欧文明互鉴。而如果我们不加强文明交流，不互相理解对方的立场，就一定会走向隔绝。如果中国和欧洲走向隔绝，那么人类文明前进的脚步一定会放慢。

中欧对于社会治理模式和人权标准确实有不同看法，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疫情。欧洲前些日子出现大规模群众抗议，要求解除防疫措施，之后政府不得不出动大量警力去维持秩序。这在中国人看来是很不正常的，基于我们的传统和习惯，我们完全接受不了这些事情。反过来讲，欧洲人的成长环境、社会价值观跟中国不一样，自然也会不理解中国现在采取的防疫措施。但如果我们能够更加宽容一些，多了解一些对方防疫措施背后深层次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可能我们就更容易化解误解和分歧。

其实和美国人主张的“美国治下的和平”不一样，中国和欧洲都主张“文明多样性”“多极世界秩序”“跨文化交流与发展”，我们在这方面的观念并没有多大的差异。但问题在于，欧洲人为了推动欧洲一体化，在欧洲高举“文明多样性”的旗帜，可转过身来却要求中国人完全按照欧洲希望的方向发展。我觉得，欧洲人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更加言行一致，采取更加宽容的态度，通过换位思考理解中国的现实。唯有如此，中欧才能团结起来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难题。

中国的国际关系

当今世界正经历着显著变革,特别是在国际层面。全球力量平衡不断发生变化,联合国宪章关于国际关系的理想还没有实现,各种使用武力的行为却在国际舞台上盛行,这导致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冲突。同时,各国还面临许多非传统的挑战。我们每一个人都不禁思考,新兴大国能够为国际关系和全人类提供什么?

中国积极参与双边和多边外交,不仅拥有世界上最为广泛的外交网络,还坚定参与区域和国际组织,并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外交政策符合国际关系准则,包括尊重国家主权,不干涉他国内政,尽可能地远离冲突和战争等。中国外交的和平性质得到了世界上很多政党的支持。同时,中国也倡议为世界上众多冲突和问题寻找公平的解决方案,优先考虑人民的利益,反对外国干涉。

中国坚定地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遵守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根基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而不是按照力量大小来决定国际事务。中国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发展中国家建立伙伴关系。这为发展中国家根据各自的国情实现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机会,有助于缩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例如自疫情以来,中国对国际社会表现出了极大的责任感,不仅成功地在国内遏制了疫情,并以创记录的速度研发了疫苗,还向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其他国家提供医疗设备与疫苗。

多年以来,中国一直是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可靠的合作伙伴,中非合作论坛和中阿合作论坛都证明了中国领导人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中国不仅支持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的发展,还努力协调本国与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的发展战略,这是目前其他大国不曾做过的。此外,中国在贸易、基



H.E. Ahcene Boukhelfa

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

(2016-2021)

建和投资等很多领域提出的倡议也为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加强地区合作、提高区域一体化水平提供了很多机会。

中国外交政策的不同之处源于中国伟大的历史和文化的遗产。中国从来没有寻求霸权,而是表示愿意向其他文明和国家学习,特别是那些和中国在外交领域当中保持原则一致的国家。中国是阿尔及利亚的老朋友。阿尔及利亚有着和中国一样光荣的斗争和革命历史,也是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除此之外,我们的外交政策有很多共同之处,包括充分尊重他国主权、不干涉他国内政、尊重联合国宪章等。当今的世界需要中国成为国际社会当中一个强有力的行动者,在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推动国际关系实现更大的平衡。阿尔及利亚愿意和中国朋友密切合作,进一步加强两国的关系,造福两国和全人类。

始终从战略角度 把握中欧关系的发展方向

中欧作为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主张什么、反对什么、合作什么，不仅对中欧关系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也将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始终从战略角度把握中欧关系发展方向，积极推动中欧关系长期友好发展，妥善处理彼此矛盾分歧，共同应对世界面临的各种挑战，是当前摆在中欧面前的重要任务。

一、推动中欧长期友好合作有助于增进双方人民的福祉

中欧建交 46 年以来，双方高层交流频繁，发挥了对中欧关系重要的引领作用；各种对话合作机制不断增加、完善，有力地推动了双方关系的发展；经贸投资合作持续增长，促进了双方经济的发展。欧盟自 2004 年起连续 16 年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中国去年超过美国成为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是欧盟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地，双边贸易规模达到建交初期的 250 多倍。中欧在教育、科技、文化、人文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成果丰硕，双向人员往来达到 800 万人次，增进了相互了解。中欧关系的发展符合各自的现实和长远利益，切实增进了双方人民的福祉。

二、中欧加强合作，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具有世界意义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多边主义受到挫折，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以各种形式呈现，恐怖主义威胁不断加大，气变环境问题更加突出，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在世界处于十字路口



李瑞宇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意大利共和国
特命全权大使兼驻圣马力诺共和国
特命全权大使(2013-2019)

的关键时刻，中欧作为当今世界的重要力量，更应携手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抵制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促进全球抗疫和卫生合作，促进世界经济的复苏，推动世界向着和平稳定的方向发展，同时打造更具世界影响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世界的和平和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三、坚持对话沟通是确保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根本保证

中欧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在所难免，双方在发展关系中也时常会出现一些摩擦和矛盾。但中欧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互不构成威胁。中国一贯重视中欧关系，视欧洲为伙伴而非对手，双方的合作远大于竞争，共识远大于分歧。双方应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不干涉内政、互不干预各自发展道路的原则，坚持对话，加强沟通，妥善管控分歧，而非像欧方有些机构那样动辄发表“声明”“决议”，对中欧合作造成严重干扰。

1975年建交后，中欧关系曾面临各种挑战和波折，一路坎坷不少，但最终双方还是以大局为重，排除障碍，克服摩擦和分歧，聚焦合作，使中欧关系不断向前发展。这说明，只要双方从战略角度把握中欧关系的大方向和主基调，中欧关系就能经受各种考验，不断向前发展。

四、中欧要着眼未来，抓住新机遇、新动能，加强双方合作，并为不稳定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签署了中欧地理标志协定，完成了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决定建立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和数字领域高层对话，致力于打造中欧绿色合作伙伴、数字合作伙伴关系。中欧在促进疫后世界经济复苏、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卫生领域合作、完善全球治理等方面都有共同利益。2021年是中国“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欧盟实施大规模复苏计划的启动之年，中欧合作前景广阔。双方应当加强合作，创造更多的互利共赢机会，不断使中欧关系行稳致远，并为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不稳定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

中欧关系：前进的道路

2020年，中欧关系取得了一些积极的进展，比如签署中欧地理标志协定并谈成了中欧投资协定。遗憾的是，从今年3月份开始，中欧之间出现的分歧与紧张局势严重影响到了中欧关系，历时7年谈成的中欧投资协定也因此搁浅。不仅如此，欧洲舆论对于中国的看法也变得更加消极，不断质疑中国外交政策日益强硬背后的理由。

欧盟如何看待如今的局势？一方面，疫情加剧了整个国际体系中本已存在的紧张局势。一年以前，争端主要是集中在贸易和技术领域，而当前这些争端更多的是关于政治共存的原则性问题，其中有相当危险的一些言论，例如“为最坏结果做好准备”。如今，国际关系中的灵活性、妥协性、开放性都远不如疫情之前，中欧的合作空间也在逐步缩小。另一方面，中国外交采取了新的基调，但欧洲对于“东方崛起”和“西方衰落”的说法感到非常担忧。中国宣称，疫情证明了中国治理体系的优越性和西方自由主义的失败，这样的想法不利于推动积极和具有建设性的国际议程。在我看来，这是助长对中国负面看法的一个因素。

鉴于这些不幸的事态发展，欧盟应该做些什么呢？今年7月8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对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表示，尽管中欧仍然存在严重分歧，但合作不仅是一种选择，还是一种必要，中欧必须正视分歧并认真地处理分歧，以巩固彼此间的合作基础。

有人认为，意识形态差异或地缘政治竞争并不新鲜，不会也不应阻止贸易和投资的流动。然而，这种观点只是部分正确，全球化意味着相互依存，而相互依存不仅需要互相信任且公平的竞争环境，还需要共同的交往规则。因此，欧洲人不能不去关注中国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挑战，并继续坚守自己的原则和价值观。2019年3月通过的《欧盟—中国战略展望》仍



H.E. Nicolas Chapuis

欧盟驻华代表团团长

然有效，欧盟不寻求对抗，但会挺身而出捍卫自己的价值观和利益。无论面对怎样的问题，欧盟都坚持根据普世价值以及国际法进行处理。

欧盟呼吁中欧就共同关心的所有问题开展务实的接触，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挑战需要中欧共同应对。中欧在气候变化、能源和农业政策等多个领域拥有共同关切，欧盟也邀请中国在这些领域做出更多贡献。另外，欧盟不惧怕公平开放的竞争，但不幸的是，中国欧盟商会即将发布的报告再次指出，中国尚未做到这一点。

最近，一位中国高官问我，欧盟是否反对中国的崛起？让我给一个简短而直接的回答：不，恰恰相反。因为中国的现代化和繁荣对于全球的增长至关重要。

战略伙伴抑或制度性对手 ——从欧盟对中欧关系的三重定位谈起

2003年，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我作为外交部欧洲司分管中国与欧盟关系的副司长，参与和见证了全过程。我清楚地记得，当年中欧展现出战略上的默契、经济上显著的互补性和开展各领域合作的热情，令世人瞩目。自那以来，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结出硕果，不但造福于中欧双方，也为世界的稳定和发展做出贡献。

然而，2019年3月，欧盟提出对华关系三重定位，不再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反突出了中欧关系的竞争性，特别是首次将中国视为“制度性对手”。欧盟对中欧关系定位做出的这一颠覆性改变，反映出欧盟的对华认知发生了错位，对中国的发展壮大感到疑虑和焦虑，对中欧合作中遇到的问题缺乏理性的判断，更是受到了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严重影响。三重定位客观上造成了欧盟及其部分成员国对华政策的混乱，而“竞争”和“对手”的不断强化，也严重干扰了中欧关系。

一段时间以来，欧方出台了一系列不利于中欧投资合作的政策，在涉疆、涉港、涉台等问题上，屡屡做出伤害中方利益之举，甚至基于不实之词，执意对华搞单边制裁，挑战中国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对此，中国人民不能接受，中国政府当然有权做出正当、必要的反应。中欧克服种种困难和挑战、谈成投资协定带动起来的难得的合作势头得而复失。中欧关系陷入困境，双方重大的合作议程难以推动。这一局面令所有关心和支持中欧合作的人们感到遗憾和痛心。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局势错综复杂，新冠肺炎疫情延宕，经济复苏步履维艰。世界呼唤作为两大重要力量的中国和欧盟加强相互协调与合作，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克时艰，这也符合中欧各自的利



马克卿

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
常务副会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捷克共和国
特命全权大使 (2014-2018)

益。当此之际，将中欧关系引向何方？对于这一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双方必须审时度势，做出负责任的回答。

中方的回答是明确、坚定的。中方认为，中欧关系源于广泛的共同利益，相似的战略诉求。中欧之间没有重大利害冲突，没有地缘政治矛盾，双方合作远大于竞争，共识远大于分歧。基于这一判断，中方主张，中欧应当坚持的相互关系定位是“经受住了时间和实践检验的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已多次表达推动中欧关系进一步发展的诚意，愿同欧方一道，办好下一阶段的重要议程，接续深化务实合作，围绕疫情应对、经济复苏、气候变化、WTO 改革、多边主义等多双边议题加强沟通、协调和合作。同时，中方也将坚定维护自身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据我观察，迄今欧方并未表现出积极的态度，近期个别欧盟成员国及议会某些势力在涉台问题上违背一个中国原则的行径更是传递了错误的信号。我们希望欧盟各机构和各成员国能够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的发展，看到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实力不断增强，对欧盟和中欧关系带来的新机遇和对提升中欧合作水平的利好；希望欧方能够本着相互尊重的原则，摒弃对中国过时的、不符合时代潮流的成见和偏见，不做伤害中国利益、干扰双方关系的事情；希望欧方能够秉持其标榜的“战略自主”，拿出政治勇气，做出符合欧盟自身根本利益的决断，与中方相向而行，尽快走出中欧关系当前的困境。

中欧关系对双方、对世界都太重要了。双方应从中欧关系的历史发展中汲取有益的启示和教训，坚守初心，增进相互认知，始终从战略高度、以更宽广的视野运筹中欧关系，推动中欧关系行稳致远。

中欧关系：前进的道路

随着中欧关系不断发展，我觉得，中欧合作的驱动力还是十分强劲的。尽管中欧关系存在挑战，但中国和欧盟在世界舞台上仍是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双方的合作关系也对中欧共同实现繁荣以及应对全球挑战至关重要。如果中欧希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解决气候变化问题，那么双方的密切合作就是必不可少的。欧盟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欧盟。

中欧关系也存在一些挑战。有人认为，双方关系并没有向着合作的方向发展，比如欧盟对中国实施了制裁。也有人认为，欧盟对华政策受到了美国的严重影响。我认为这种观点不完全准确：一方面，欧盟对于中国的制裁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过去欧盟一直通过双边和多边渠道向中国表达了关切和顾虑。另一方面，欧盟并不会听从华盛顿给出的命令，比如当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时候，欧盟没有退出《巴黎协定》；当美国退出伊核协议时，欧盟没有退出伊核协议；当美国阻碍世贸组织任命新的总干事时，欧盟也没有追随美国。中国不能简单地认为欧盟就是在盲目追随美国。当中欧谈到双边关系，其实都是从双方各自的利益出发的。同时，欧盟也希望中国和美国能够基于良好的意愿进行对话，增进交流，加强合作。

中欧关系将会往哪个方向发展呢？在贸易领域，尽管国际贸易体系是由西方主导的，但一直以来欧盟都希望发展平等互利的贸易。当前疫情给全球贸易带来了很大风险，所以欧盟希望减少贸易紧张局势，同时维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继续进行贸易。欧盟希望能与中国、美国以及其他各方就此进行讨论。同时，在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中，欧盟希望各方都能相互合作，保证世贸组织能够正常地运行，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感觉受到孤立。

在人权领域，中国的进展非常迅速。欧盟并没有想要告诉中国人如何



H.E. Wim Geerts

荷兰驻华大使

治理中国，欧盟采取的行动也并不是要针对中国，但欧盟希望鼓励世界各国保护人权。当然，欧盟看到中国在减贫方面取得了许多成就，但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中国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在气候变化领域，今年将是应对气候变化至关重要的一年。欧盟希望《巴黎协定》能够真正落实，以证明全球并没有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倒退，而是在继续前进。这也是为什么欧盟非常欢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双碳”目标，即中国力争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荷兰和欧盟也会努力实现到 2030 年二氧化碳减排 55%、到 2050 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欧盟希望所有国家都能携手实现气候行动目标。

总体上看，我仍然坚定地相信中欧关系是强健的，并希望中欧关系能建立在一个为各国带来繁荣、保护全球人权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经济体系中。无论中国还是欧盟都是实现这些目标的关键参与者，如果中欧想要取得成功，就必须持续对话，并认真地对待彼此。

欧盟对华战略调整与中欧关系

作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以超国家和政府间合作方式共同运作的地区性组织，欧盟自建立以来在其不断扩大和深化的过程之中经历了无数的挑战和危机，也做过许多政策调整。

《里斯本条约》于 2009 年生效后，欧盟对其外交系统进行了改革，成立了欧盟对外行动署。这不仅加强了成员国与欧盟在外交领域的协调与合作，也使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的工作更有力度。

2008 年至 2016 年间，欧盟经历了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欧盟各级政府的工作精力很大程度集中于欧盟内部问题，无暇顾及对外关系。但在此期间，欧盟的政策已经开始出现重大调整。欧盟就中欧关系的政策调整始于 2016 年欧盟对华政策文件的发布。

欧盟对华政策的变化首先源于其整体对外政策的调整，该调整发生在容克担任欧委会主席后，以两个政策文件的出台为标志，分别是 2015 年 10 月发布的《全民贸易——制定更负责任的贸易和投资政策》和 2016 年 12 月发布的《共同的愿景、共同的行动：一个强大的欧洲——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全球战略》。

值得注意的是，两个文件虽然一个为贸易政策，另一个为外交与安全政策，但两者有一个强烈的共同点，即价值观至上。贸易政策本属于很务实的领域，但时任欧盟贸易专员的马尔姆斯特伦特别强调价值观的重要性，她在该贸易政策的前言中指出，欧盟在贸易政策中不仅要重视利益，也要重视价值观。在这一长达 35 页的文件中，“价值观”一词出现了 15 次，“人权”一词出现了 26 次之多。



门镜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
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特聘教授

与该政策文件相呼应，欧盟 2016 年发布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文件中，“价值观”一词出现了 26 次，而“人权”一词的出现频率达 31 次。时任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在文件前言中指出：“脆弱的世界呼唤一个更加自信和负责任的欧盟，欧盟需要采取外向的和具有前瞻性的欧洲外交与安全政策。”

欧盟一直将自身视为规范性力量。这两个文件的发布标志着欧盟在逐渐走出危机阴影，并根据自身定位主动调整政策和目标。其在对外关系领域将利益与价值观捆绑，积极输出价值观，并借此增加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力。

在欧盟 2016 年 6 月所制定的新的对华政策文件中，“价值观”出现 10 次，“人权”出现 17 次，该文件还提出，欧盟与中国的接触应有原则性，要忠于其利益和价值观。

在容克任欧委会主席期间，其大力调整对华政策，除了拒绝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还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15 年的过渡期结束之时，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拒绝认可中国市场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 2017 年年底通过了修改后的反倾销法规，对中国进口欧盟的产品展开反倾销调查，同时也加紧对中国国内给企业的补贴措施制定限制对策。

2017 年 9 月，容克发表盟情咨文，指出应建立新法规的原因：“如果一个外国的国有公司想购买欧洲的港口、能源基础设施或防御技术企业，这必须经过仔细审查和辩论，且一定要在透明的状态下进行。掌握自己‘后院’的情况是我们的政治责任，这能保证我们可在必要时保护自身的集体安全。”

盟情咨文发表的第二天，欧委会向欧洲理事会和欧洲议会提交了外国直接投资筛选机制的法规建议。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之后，该规定于 2019 年 3 月通过，并于 2020 年 10 月 11 日生效。其涵盖了欧盟成员国评估、调查、授权、限制、禁止或解除外国直接投资的程序。

2019 年是欧盟大选年，时任欧委会主席容克在这一年结束了任期。为了给未来的欧委会留下政治遗产，欧委会在 3 月发布了这一届欧委会的第二个对华政策文件。文件中最重要的内容莫过于对华关系的重新定义。虽然文件中提到要对中国继续执行接触政策，但其颠覆了以往互利共赢的双边关系定位，有史以来第一次提出中欧之间是制度性对手，还毫不含糊地指出中欧之间在经济领域的竞争，并且提出欧盟要做技术发展的引领者。

冯德莱恩就任欧委会主席后，立刻提出“地缘政治”为本届欧委会的关键词，并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政策和措施。比如，2021年5月初，欧盟发布新的工业战略，支持建立新的工业联盟，旨在分化国际供应链，增强欧盟战略自主。虽然在欧盟发布的此类官方文件中并没有直接提及中国的名字，但可明显看出，这些动作均在针对中国。

除政策层面的多种努力，欧盟还以意识形态为粘合剂，在内部努力加强政治团结，试图在对华问题上用一个声音说话。总之，欧盟正在把政治和经贸联系起来，使两者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也正因为此种变化，中欧关系会愈发下行。

欧盟的一系列动作看似偶然，但在仔细梳理其近年来的政策变化后，我们不难发现偶然背后的必然。欧盟以价值观为由对中国施压其实显示了其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和不自信。无论在工业、贸易领域，还是在技术、投资领域，欧盟的一系列政策均旨在限制中国的快速上升，期望寻回自身的优势地位。

正因如此，欧盟对华强硬政策不可被简单理解为只是应付来自美国的压力。欧盟自身有向美国靠拢的需求，对华施压符合欧美双方利益。欧盟及其成员国普遍对拜登上台的结果比较满意，欧盟对拜登寄予厚望，希望双方能全方位修复跨大西洋关系。

作为民间智库，我们应认真研究欧盟的政策变化，在竞争中找出彼此合作的可能性。虽然欧盟的对华政策愈发强硬，但无论是在重大国际问题、地区热点问题上，还是在双边关系的议题上，欧盟均离不开与中国的合作。

因此，我们应认真审视欧盟政策变化的原因，努力把握中欧关系的发展方向，在变化中争取主动，推动双方关系真正做到相互尊重、互利共赢。

共同价值观与国际关系新架构

当代国际秩序正处于多极化格局的形成阶段，这意味着，继苏联解体和两极体系崩溃后所形成的单极世界体系已寿终正寝，但成熟的多极世界体系目前尚未形成。在该阶段，曾经的单极体系中心，即美国及其盟友客观上正在逐渐减弱，而其他潜在力量中心的影响力在不断增长，包括中国、复兴中的俄罗斯、逐渐巩固自身实力的印度、积极发展的巴西等。

在国际实践中，针对当今形势包含两种主要立场。美国及其盟友坚持捍卫“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他们认为中国、俄罗斯、伊朗以及其他不愿服从该规则的“修正主义国家”会破坏这一所谓的“国际秩序”。该立场决定了美国及其盟友会对那些极力反对美国霸权政策的国家——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实行遏制政策。

遏制中国必要性的理论依据是建立在美国思想家们的历史理论和哲学认识基础上的。根据他们的认识，所有国家或早或晚均会采取西方的社会、政治、经济模式，即“民主”“市场经济”“法治”等。如果某个国家拒绝如此，那就必须遏制该国的力量增长，让其无法抗拒这一“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并会给该国以时间和动机进行“自我改正”。而促进“自我改正”的方式包括更换该国领导层，即让新领导人走上“正确”的历史道路。

尽管其建立在过时的理论之上，但西方立场的根基非常牢固，其中一条就是现代化理论的简化版本。根据该理论，建立在自由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培养出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将在特定阶段要求其政治权利，从而必然走向“民主”，即接受西方的政治模式。因此，西方主导的历史发展模式就会成为普世规律；而民主世界理论的另一个逻辑路线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交恶或发生战争，从而不会动摇美国霸权，而只有美国霸权可以保障和谐的世界秩序和“正常”的历史进程。



Alexander Lukin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
东亚与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
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大学
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系主任
浙江大学求是讲座教授

这种对抗性的立场在西方并非无人质疑。那些为美帝国主义“救世主”理论和在此基础上所产生的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所工作的研究者和思想家们旗帜鲜明地拥护此类立场；而另一些遵循政治现实主义传统的国际政治专家们，如基辛格、傅高义、格雷厄姆·艾利森则坚持另一套看法，即在不否定西方在历史进程中普遍优势的同时，应考虑当今世界的现实。其中，首当其冲的是中国不断增长的影响力。他们主张实行更加谨慎的政策，即延续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中的旧有政策。根据其观点，历史发展逻辑终将会把中国带向“民主化”；反之，若要与如此强大又自豪的国家进行激烈对抗，将可能导致灾难发生。

格雷厄姆·艾利森在自己的“修昔底德陷阱”理论中指出了强硬政策会导致破坏性的后果。根据“修昔底德陷阱”理论，当今形势是新兴世界霸主力图取代旧霸主的自然而然的结果，而世界历史上的大多数情况表明，此类崛起往往以战争结束，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就如此评价雅典和斯巴达的冲突。为避免拥有核武器的冲突各方发生此类情况，就必须采取化解对抗的新机制。然而，这种现实主义理论的支持者在当代西方属于少数派，无法左右国家政策。

与此同时，新兴力量国家认为西方企图在意识形态上巩固自己正在失去的霸权，因而激烈批评西方的立场。比如，什么是“基于规则的世界”？

首先，到底应以何种规则作为基础？当人们向西方提出该问题时，他们无法作答。而这很能说明问题。如果西方举出任何具体的规则，如“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不侵略”“民族自决”等，人们就会发现，美国及其盟友首先违反了这些原则，并且相比其他国家而言，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此，这个世界并非是各国相互平等的世界，一些国家制定规则但不遵守规则，而另一些国家不能制定规则却必须遵守规则。这对非西方大国来说当然是不可接受的。这种世界体系并不具备现代意义，更像是中国古代法家所说的“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

各个非西方力量中心正是以这种观点看待美国及其盟友禁止其他大国建立“势力范围”。这恰恰是美国和西方针对其他国家制定的规则，而在现实中，这意味着整个世界都要唯美国和西方势力马首是瞻。

其次，“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在现实中从未存在过。这是西方思想家乌托邦式的构想，其

描述的不是现实世界，而是按照他们的意识形态给未来勾画的世界模式。因此，他们说“中俄两国是正在破坏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这种指责是彻头彻尾的无稽之谈，现实中并不存在的秩序是无法被破坏的。

现实中的国际秩序完全建立在另一种原则上，即现行的国际法。该秩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过各战胜国达成共识所形成。处于其中心的是联合国及其安理会，而其主要原则是尊重主权和各国平等。该秩序限制了美国及其盟友的霸权主义企图，因此在这一现实存在的秩序面前，美国及其盟友才是秩序破坏者和修正主义力量。中俄两国则主张维护现行秩序，因此两国均扮演着维护稳定的角色。

来自美国和西方的对抗性立场也不难理解。在其立场之下隐藏着控制国际秩序的自私企图。同时，意识形态也在其外交和内政中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但该立场是非建设性的，出于对外交政策非正确理解的基础之上。俄罗斯和中国不是扩张主义国家。它们支持现实存在的国际秩序，可以随时为了维护国际秩序而进行合作。

苏联曾试图将全世界纳入自己的影响范围内，使世界成为共产主义的天堂，而俄罗斯放弃了苏联基于意识形态的外交政策。当今的俄罗斯不仅没有占领全世界的企图，也没有重建苏联帝国的想法。主导俄罗斯政府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大国维护自身领土和势力范围的正当诉求。

有鉴于此，有两股势力威胁着俄罗斯的国内稳定、对外关系和领土主权。第一，主张让俄罗斯从属于美国及其盟友的亲西方反对派们；第二，在 2014 年乌克兰危机后有所抬头的重建“俄罗斯世界”的民粹主义企图，即民族主义者们支持把所有俄罗斯族所在的他国领土合并为一个俄罗斯。受西方支持的基辅政变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了威胁，而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恰恰是对此所做的回应。中国的立场也基本如此，中国一直强调，改革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就是保持国内稳定。

该立场有着严肃依据。西方企图将自己的规则强加于人、拒绝协商，这与联合国宪章精神背道而驰，已经破坏了世界上包括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在内的许多国家的稳定局面。问题不在于这些非西方国家是否完美，是否需要改革；问题在于，历史经验已经证明，试图从外部改变此类国家只会导致灾难，因为美国和西方国家强加于此类国家的价值观和制度脱离了当地的政治文化。在好的情况下，所强加的制度会适应当地条件，但制度本身也会变得面目全非；而在坏的

情况下，消灭旧的国家体系会造成混乱和内战。这不仅不会健全国际秩序，反而会为国际社会的紧张局面提供温床。

此外，西方国家本身也愈发认清了自身并非价值观和社会稳定的典范。美国各大城市的暴民捣毁餐厅、商店和国家机关，而政客们则号召向暴乱分子下跪，如此看来，未必会有很多国家愿意照搬这套实践，但也许有人会把这种实践强加于它们。

因此，俄罗斯和中国都不是试图打破某些规则的修正主义国家。中俄两国只是认为，别国的规则不应破坏本国的主权和稳定。而在建立真正的共同规则时，中俄两国和其他大国一样，都应该参与到制定规则的过程中。

制定国际规则是必须的。但为了让多极体系趋于稳定，必须让规则真正成为国际化的规则，即应建立所有主要国际主体均可接受的规则。这必须在互相让步的基础上进行共同协商，而不是依据实力而强加于人。

正如十九世纪的欧洲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所建立的欧洲协调一样，此类规则也应建立于新的“全球协调”之上。该“全球协调”应建立在政治现实主义的原则之上，人们可以对其他思想和理念保持异议，甚至加以批评，但必须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并防止将分歧演变为严重冲突。

古代中国的另一原则“和而不同”就很好地描述了这种和平共处的新秩序。希望在一段时间后，该原则能被所有世界大国所接受。否则，我们将面临国际混乱和互相争斗的艰难时期。为了避免这一局面出现，我们尤其需要展开文明对话。而本届太和文明论坛必将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欧经贸合作前景依然看好

中欧双边关系目前处于 1975 年建交以来的低谷。今年 3 月欧盟因为所谓的“新疆问题”对我实施制裁，立即引起我强烈反制。欧洲议会通过决议，如果中方不解除制裁将暂停中欧投资协定的批准程序。因此，去年底结束谈判的中欧投资协定处于停顿状态。何时能够重启批准程序，短期看并不乐观。

一、中欧经贸合作总体顺利，互利共赢仍为主流

欧盟连续 16 年为中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合作伙伴，但在 2020 年被东盟超过。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是英国脱欧使得中欧贸易数字减少近 1000 亿美元；二是美国对中国出口货物加征关税，使中国部分主要用于出口美国的生产企业投资转移到东盟国家，从而带动了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的增长。中欧贸易去年在疫情突发的情况下仍逆势增长 4.9%，贸易额为 6495.3 亿美元。今年上半年双边贸易额 3882 亿美元，增长 37%。

欧盟是中国第三大投资来源地。截至 2021 年 5 月，欧盟对华实际投资 1206.4 亿美元。2021 年 1-5 月，欧盟对华实际投资 23.8 亿美元，增长 20.8%。欧盟是中国第三大投资目的地。截至 2021 年 5 月，中国累计对欧盟直接投资 834.6 亿美元。2021 年 1-5 月，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 20.3 亿美元，增长 69.5%。

总体来讲，中欧经贸互补性强，合作虽有波折，但总体可控。双方的贸易摩擦基本上可以在 WTO 原则基础上，通过谈判圆满解决。前些年，双方纺织品和太阳能电池板的争端就是通过友好磋商解决的。总体来看，经贸务实合作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二、中欧投资协定对双方意义重大，仍应积极推动



孙永福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中国商务部欧洲司司长
(2003-2015)

经过 7 年 35 轮技术谈判，2020 年 12 月 30 日，双方领导人宣布中欧结束谈判，达成投资协定。这一投资协定内容广泛、对标高水平的经贸规则，着眼于制度型开放，是一项平衡的、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协定。其中，“平衡”主要体现在：一是双方在做出开放承诺的同时，十分注重保留必要的监管权；二是双方既注重促进双边投资合作，也强调投资需要有利于可持续发展。“高水平”主要体现在：双方致力于促进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达成了高水平的谈判成果。协定涉及领域远远超越传统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成果涵盖市场准入承诺、公平竞争规则、可持续发展和争端解决四方面内容。双方都拿出了高水平互惠的市场准入承诺，所有的规则也都是双向适用的，并将为企业打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惠及中欧双方乃至全球企业。高水平的市场准入承诺将为双方企业带来更多的投资机会。高水平的公平竞争规则将为双边投资提供更好的投资环境。在市场准入方面，协定采取的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模式。中方首次在包括服务业和非服务业在内的所有行业，以负面清单形式做出承诺，实现了与《外商投资法》确立的外资负面清单管理体制的全面对接。在公平竞争方面，双方立足于营造法制化营商环境，就国有企业、补贴透明度、技术转让、标准制度、行政执法、金融监管等与企业运营密切相关的议题达成了共识。协定还对与投资有关的环境和劳工问题做出专门规定，双方承诺处理好吸引投资与保护环境和劳动者权益的关系，并遵守相关国际规则。

可以肯定的说，这是第一次欧盟先于美国与中国达成的最高水平投资协定，中方为达成协议做出了巨大努力。这一协定对于双方今后的经贸合作意义重大。可惜的是由于欧方制裁，协定尚未进入相关的批准程序。这对双方特别是欧方是极为不利的。我认为，将所谓“人权”等价值观问题与具体的、务实的经贸议题紧密挂钩是极为不明智的，其有损于中欧双方企业和人民的利益。“人权”问题应该在现有的中欧人权对话机制内通过磋商沟通加以解决，而不是动不动就以制裁相威胁。制裁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还可能把本来在正确轨道上运行的双边合作引向歧途。我们当然希望欧方能改弦易辙，回到中欧合作的正确轨道。中欧双方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双方都赞成多边主义，愿意在联合国、WTO 等多边机制中发挥积极作用，双方在落实《巴黎协定》、应对气候变化、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方面都有合作的可能和意愿。希望双方积极扩大合作领域，通过对话减少摩擦，努力实现互利共赢，造福于中欧人民和全人类。

欧洲在对华政策上被美国带了节奏

中欧关系与中美关系比本来应该更好些,但遗憾的是,双方关系陷入了僵冷期,短期内回暖的可能性不大。

中欧关系出现今天的局面,其主要根源是欧洲在对华政策上被美国带了节奏。美国把中国定为“战略竞争对手”,欧洲随后就把中国定为“制度性对手”。美国搞印太战略,欧洲就跟着搞印太战略。美国认为华为 5G 技术不安全,欧洲就开始和华为解除合同,拆除 5G 设备。美国说“南海航行自由受到威胁”,欧洲国家就纷纷派军舰到南海巡航。美国说新疆搞“种族灭绝”“强迫劳动”,欧洲人就跟着大呼小叫。美国要对中国的新冠病毒溯源,欧洲就随声附和。美国指责中国搞网络攻击,欧洲遥相呼应。美国说孔子学院有问题,欧洲就一股脑把孔子学院都关了。退一万步讲,如果美国这个“带头大哥”不搞上面这些事,欧洲会主动搞这些事吗?被美国带了节奏,欧洲就没有了自己的主见,也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尽管欧洲也曾一度在特朗普大搞“美国优先”的时期强调要“战略自主”,但拜登上台后,美国重新回来“领导西方世界”,欧洲似乎觉得又有了主心骨,因此也就不特别强调“战略自主”了。只是最近,在阿富汗撤离问题上,美国抛开盟友,自作主张,欧洲又觉得美国靠不住了,才又再次重提“战略自主”的事。

中国并不反对美欧关系走近,毕竟美欧是盟友,美欧在对华政策上进行协调也无可非议。但欧洲作为多极世界中的独立一极,在对华关系上不能美国说白就是白,美国说黑就是黑,美国吆喝什么,欧洲就跟着吆喝什么。

中欧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中欧关系与中美关系有很大的不同。中欧既不存在历史遗留的包袱,也不是战略竞争对手。中国从未做过损害欧洲利益的事情。中国一直支持欧洲的一体化进程,支持欧洲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欧债危机时,中国主动向欧洲伸出援手;在别人退出《巴黎



吴海龙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

协定》时，中国力挺欧洲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在伊核等热点问题上，中国与欧洲顶住压力，保持了相近的立场；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与欧洲一道，旗帜鲜明地反对单边主义，支持全球贸易自由化。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中，中国一直秉持公开、透明、开放、包容的立场，从未有任何要分裂欧洲的想法。恰恰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反复肆虐，欧洲物资运输格外吃紧的情况下，中国与中东欧合作的成果——中欧班列，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使欧洲许许多多的国家都从中受益。

中国与欧洲确实存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但这不是双方发展关系不可逾越的障碍。1949年新中国建立就得到了不少欧洲国家的承认。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得到欧洲许多国家的支持。中国与欧洲一直保持着较为稳定和持续发展的关系。中国与欧盟1975年建交以来，双边关系也从未因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而止步不前。中欧关系一度被夸耀为超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典范。中欧在人权问题上确有分歧，但中欧之间一直在人权问题上保持着对话关系。中欧关系也没有被人权问题绑架和裹挟。

中国确实在快速地发展，但中国的发展并未损害别国的利益，而是提供了巨大的机遇。中国是世界上最能挣钱、也是最好挣钱的地方。欧洲大大小小的企业几十年来在中国挣得盆满钵满。正是有中国这个超级大市场才维持了欧洲稳定的出口，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欧洲的就业和经济发展。中国的市场和世界提供的机遇，没有谁能替代，天下找不到第二家。

我们希望欧洲在对华政策上能有独立的思考和自主的判断，从欧洲自身利益出发，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来处理对华关系，不要受美国因素的影响。欧洲要对自己有充分的自信。中国没有把欧洲当对手，也不想让欧洲把中国当对手。这个世界不需要对手，更需要伙伴。中国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会是欧洲的合作伙伴。中欧之间可以通过广泛和深入的对话沟通，消除疑虑误解，增进理解与互信，让僵冷的双边关系逐渐回暖。只要欧洲的对华政策对头了，中欧关系的路就会越走越宽广。

我看中欧关系走向

目前,有三个不利于中欧关系的关键因素正在起作用:一是拜登上台并访欧,要求欧盟与美结成反华阵营;二是欧洲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反弹,经济跌落至战后最低点;三是欧洲以所谓“新疆种族灭绝”和新冠病毒溯源为焦点,对中国展开“舆论攻势”。这三大因素已使中欧关系步入了极其微妙、前景莫测的历史阶段。如果中欧双方应对得当,可以缓和之。否则,中欧关系可能形成新态势,接近“新冷战”。但出现该局面的可能性不大。中欧关系还是会在既有合作、又有分歧的状态下继续发展。

一、欧盟主要大国对华政策相对明确

德法两国都将举行大选,而两国大选所面临的国际格局非常明确,其关键特征是:美欧关系出现分歧、欧中关系相对稳定、美中关系趋于冲突。在这种背景下,德法均无意与美国联手对付中国。

对于德国而言,默克尔总理已公开宣布,不参加今年的德国大选。在默克尔担任总理期间,美德关系一直处于相对低潮状态。主要原因是历届美国总统对德均较傲慢,而特朗普更是与默克尔完全不合拍。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分歧,包括北约的作用、对伊核协议的态度、对俄关系、对华关系和对国际组织的立场。

未来几年,德美最主要的分歧可能是对华关系。德国明确反对两点:与中国展开“新冷战”、在经济上与中国脱钩。事实上,德国在去年年底担任欧盟主席国期间,极力促成了中欧投资协定。默克尔离任前最后一次访美时说:“我们与拜登总统还谈到了与中国合作及竞争的多个领域,包括经济领域、气候保护领域、军事领域及安全领域。”由此可知,德国将坚持与中国在经济、气候保护等领域的合作。德国目前的对美政策、对华政策是符合其战略利益的。



郑若麟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文汇报高级记者

因此，德国的新政府不会轻易变更对华政策。

对于法国而言，法国戴高乐主义的独立外交传统始终存在，法国又是欧盟中最不甘对美俯首帖耳的国家。随着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的崛起，法国也认识到，法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国际地位正在下降，法国和欧盟必须与中国等亚洲国家建立更为紧密的关系。因此，法国对美关系的走势向下，而其对中国与亚洲的关系则有向上趋势。

法国外交常常会进一步，退半步，其在对美关系、对华关系上就是如此表现。从法国采取的种种做法中可看出，其一方面赞同德国，率领欧盟签署中欧投资协定，另一方面又接受美国的要求，派军舰到中国南海活动。但可以确定的是，法国与德国一样，拒绝与美国联手全面对抗中国。在明年法国大选之后，这一点会更为明显。

二、中欧合作前景相对乐观

德法两国在对华政策上处于“异曲同工”的状态。之前中法德领导人的视频峰会就传递出此类明确信息。峰会达成的共识是：中欧间利益大于冲突，共识大于分歧，双方的合作具有全球战略性意义。在经贸合作、气候问题、多边主义、对非关系等领域，中国与法德有广泛共识。

欧盟自认是美国的“盟友”，但与此同时，欧盟有自己具体的对华关系利益。正如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兼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回答西班牙《国家报》的采访时所说：“我们将永远更接近美国而不是中国，我们将永远更接近一个与我们有相同政治制度的国家，一个实行市场经济、开展选举的多党制民主国家，而不是一个一党制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与美国对华立场保持一致，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具体利益。”换言之，中欧之间的共同利益再大，也与美欧间的“同盟关系”不可同日而语。不过，形势会不断发展，关系和利益永远是处于变化中的。

在这一背景下，中欧关系的走向可总结为：第一，双方均拒绝进入“新冷战”；第二，双方均对美国“围堵中国”策略持明确反对态度；第三，双方的经贸依然有较大发展前景。

三、中欧传统分歧依旧存在

欧盟内部依然存在强大的反华势力，这股势力主要由媒体和部分跨国资本、特别是跨国金融资本构成。这股势力首先体现于中欧在政治体制领域的对立状态。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已对西方政治“民选体制”、经济“自由市场体制”构成威胁。西方“民选体制”一直被其民众视为世界现存的唯一可行模式。但当前形势已完全改变。由于西方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失业率居高不下，西方民众的生活水平在近三十年内始终没有提升，所以西方民众对其政治及经济模式开始产生怀疑。而在此时，有关“中国模式”的成功故事却不断传到欧洲。这必然会对欧洲形成明显的政治性压力，使其“民选体制”备受质疑。这是西方跨国资本反华的主要因素。

对于这股力量而言，目前的西方政治和经济体制是其生存和赢利的唯一保障。他们甚至梦想在全球都推行这种体制。殖民主义时代结束后，西方跨国金融资本得以在世界范围内赢利的政治保障，就是将全球主要大国都变成“民选体制”国家。只有这样，其才能通过自身垄断的政治和经济权力，控制各国的选举和经济模式，进而操纵其各国代理人维护其全球利益。这是西方跨国金融资本集团最根本的利益所在。而奉行另一种政治体制并获得连续成功的中国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实现上述战略目标的重大障碍。其次，这股势力也存在于欧盟部分资本内部。他们认为自己在对华贸易和经济交往中“吃了亏”，从而要中国出让更多的利益。另外，欧盟媒体被控制在资本手中，一直幻想通过“舆论战”促使中国政体走向“民选体制”。中欧双方的“舆论战”一直在激烈进行。但其主要态势是“欧盟进攻，中国防守”。目前，这场“舆论战”的主战场在新冠病毒溯源和“新疆种族灭绝”上。

四、中欧关系未来不会成为世界主要矛盾

当今世界存在着三大矛盾，即中美之间的矛盾，西方基督、犹太教国家与伊斯兰国家之间的矛盾，西方内部产业资本和跨国金融资本之间的矛盾。在这三大矛盾中，跨国金融资本均处于核心位置。在巴以冲突、中美冲突、美国特朗普与拜登大选冲突中，都可以看到跨国金融资本的影子。

跨国金融资本目前在欧盟占据主导地位，其面临的主要矛盾不是中国，而是美国和欧洲内部的极右翼政治势力。欧洲国家如果在未来十几年无法恢复经济增长势头，其内部矛盾将不可避免地被激化，从而引起社会动荡。

中国应密切关注西方内部这两大资本力量的矛盾发展。有种种迹象表明，目前西方国家内部

反跨国金融资本的力量已迅猛崛起，西方国家内部的动荡已不可避免。欧盟与美国只会在一个领域联手对付中国，那就是“舆论战”。

中国应全力做好对欧舆论工作，向欧洲媒体和民众说明，无论是新冠病毒溯源还是“新疆种族灭绝”问题，均为美国特意“调制”的问题。前者旨在挑起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后者则试图挑起中国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矛盾。如果我们让欧盟舆论明白和理解这两点，我们就能与其达成共识，从而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问题。

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在实现碳中和目标中的作用，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中的伦理和法律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向国际社会郑重承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实现碳中和目标主要从减少碳排放和增加碳吸收两方面发力，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在这两方面都能发挥很关键、很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应用，能够精确解决工业生产中的质检、分选、安全、物流仓储等问题，实现工艺优化、节能减碳、降本增效。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人工智能作为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进行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一代人工智能正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当前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正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广泛应用于社会民生领域，激发创新活力和社会潜能，成为经济发展新引擎。随着我国移动基站、光缆线路、互联网接入端口等物质基础不断夯实，加之中国人口众多所形成的海量数据和市场需求的优势，为人工智能广泛应用和深度挖潜提供了持续动力，中国已跻身国际“第一方阵”。

但是，人工智能发展机遇与安全风险并存，主要体现在：



陈智敏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特邀)
中国公安部副部长(2009-2017)
中国友谊促进会理事长

一、数据非法跨境流通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主权；二、数据信息过度采集和非法使用可能侵犯公民权利和隐私；三、算法偏好可能加剧社会偏见或歧视，威胁公平正义；四、机器深度学习难以理解人性和道德，无人驾驶汽车紧急避险等智能决策可能威胁特定人群生命；五、人机交互式产品广泛应用带来的工作、生活、情感高度依赖，可能威胁社会伦理。

这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安全问题，同时还涉及伦理、法律和国际规则等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加强人工智能发展的潜在风险研判和防范，维护人民利益和国家安全，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要加强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社会问题研究，建立健全保障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伦理道德。

党中央、国务院和有关部门、研究单位、企业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的科技伦理与法律问题，有关研究正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并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全国政协对这一问题十分重视，在2020年专门组织到安徽、江苏、北京开展“人工智能发展中的科技伦理与法律问题”专题调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双周协商座谈会，政协委员们与相关部委负责同志进行了深入、广泛的交流与协商。

要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在碳达峰、碳中和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必须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的伦理法律问题。目前尚处于弱人工智能时代，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开始面临解构和重塑；无论强人工智能、超人工智能时代是否真的到来，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秩序都将受到撼动，甚至颠覆。

需要对潜在的风险进行预判和研究，用伦理和法律搭建起风险治理的框架，为人工智能持续健康安全发展提供保障。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中充分利用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优势，在人工智能治理的国际规则制定上占据主动、拥有更多话语权，是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特别是推动全球环境治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途径。

一、要历史、辩证、全面地看待人工智能发展中的伦理和法律问题。一部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科学技术的进步史。科学技术具有创造性、革命性、颠覆性，它既重塑着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重构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伦理法律秩序。任何一项重大的科技创新及广泛应用都会对现有的社会生活、伦理、法律秩序带来不同程度的冲击和挑战。

历史上,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都是对当时伦理法律秩序的挑战。人类社会就是在科技创新与伦理法律规制的对立统一、彼此转化中,在两者的冲突平衡、再冲突、再平衡的螺旋式上升中不断前进的。

文明的发展会不断推动伦理和法律的发展变化。现在有关人工智能带来的伦理法律上的挑战,是按照现有的理念去思考,还是按照人工智能的发展变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调整,不断地重构?如碳达峰、碳中和就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提出了新目标、新要求。

二、从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制定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引导人工智能发展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相衔接,特别是在高端制造业、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相关产业中充分运用人工智能,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三、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构建多部门协同、多学科融合、多元主体参与的风险治理和规则治理研究框架和工作体系。重视人工智能红利可能形成的“数字鸿沟”“贫富鸿沟”等社会财富分配问题、人工智能发展所引发的就业问题,充分运用碳达峰、碳中和等产业创造的新的工作岗位、工作方式,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同时,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四、弘扬“科技向善”理念,在科研人员中树立扬善避恶、善作善为、保护环境、造福人类(特别是子孙后代)的道德准则和道德底线。针对深度伪造技术可能引发的政治风险、社会风险,以及对国家安全和国际社会安全的潜在影响,个人信息被窃取倒卖所引发的刑事犯罪(现在电信网络诈骗处于高发阶段,在有的地方已经占刑事案件总量的一半左右),“数据投毒”导致人工智能系统误判后危害社会公共安全(如卫生医疗、道路交通、环境保护等)等问题,应从法律法规上建立数据确权、数据安全保障、算法安全审查等制度,为人工智能发展形成正确价值导向和稳定社会预期提供有力保障。

五、构建人工智能伦理法律体系必须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发展人工智能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始终坚持习近平总书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谆谆教诲,在增进人民福祉的同时,解决好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绝不能损害生态环境、群众身体健康、生命财产安全,不能侵害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能沦为不法资本利益集团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工具,不能形成数据、算法和算力的垄断。

要重视数据产权问题研究，规范数据权属、使用、交易、共享机制，解决数据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等问题。从制度上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让人工智能创造的财富为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共用，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属性所决定的。

六、在人工智能伦理法律体系国际规则制定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要走出自己的人工智能伦理法律路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体系，胸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立足中国国情、立足先发优势，在人工智能治理国际规则的制定中积极参与并发挥引领作用，为构建新规则、新秩序、新格局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國方案，为推动全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贡献中国力量和中国效率，努力推动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健康安全发展。

落实碳中和目标， 推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推进气候保护、应对气候变化，以及缓解气候变化的影响都是非常重要的领域。我们必须将这一可持续性目标融入我们的制度体系、经济结构、技术目标和社会意识中。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商业活动都需要做出切实的改变，才能最终实现可持续的生态社会。

一些国家已经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立下了远大的目标。如德国计划在2045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将期限定在了2060年，这看似时间充裕，实则任务紧迫。在各国政府的精诚合作下，我们已迈出关键的第一步，确立了减少碳排放并最终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可以说《巴黎协定》代表了全人类的共同愿景。现在是时候在全球范围内迈出第二步了，那就是在市场经济体系中落实碳中和的目标。

人们曾经肆意污染环境，罔顾这背后的代价，最终只会让全人类自食其果。各种生态灾害正是大自然的警告，我们必须悬崖勒马，让污染环境的人付出相应的代价，这样才能及时止损。德国和中国走在了前列，率先尝试将碳定价系统与碳交易系统相结合。欧洲已经推出了一个与工业生产挂钩的碳排放交易系统。2021年，德国政府也在国家层面推出了一个专门针对运输和建筑部门的碳排放交易系统，市场价格会在2027年开始形成。

早在多年前，中国就已经在多个省市开始了碳排放交易系统试点。如今，国家层面的工作也开始推进了，最初仅覆盖发电企业，后来逐步扩展到其他产业部门。如果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这个系统，各方公平竞争，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最佳的解决方案自然会脱颖而出。

发展技术解决方案对于迈出气候保护的第三步至关重要。在能源节约、



Hans-Peter Friedrich

德中联络协会“中国桥”主席
德国联邦议院副议长
(2017-2021)

可再生能源生产、储存和运输以及能源生产与利用的智能联网等领域,数字化都发挥着核心作用。

最后我想说,重要的是持不同观点的各国专家能够求同存异、集思广益、共商共创解决方案,这也正是太和文明论坛的宗旨。

中国碳中和、碳达峰 对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贡献

中国政府做出了庄严承诺，誓在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在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双碳”目标是中国政府在深思熟虑后做出的承诺，而中国一定会遵守减排的国际义务，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公共政策措施。

中国之所以重视“双碳”目标，是因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中国工业化的飞速发展，中国已成为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城市化过程成正比，但中国拥有 14 亿人口，因此中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依然远低于美国、西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

二氧化碳排放之所以对全球气候产生巨大影响，是因为碳排放是逐步积累的过程。而世界发达国家都曾为工业大国，在其工业化进程中，这些曾经的工业大国向大气排放了很多二氧化碳。回看历史，欧洲国家、美国、日本的排放量均远在中国之上。

尽管如此，中国仍有责无旁贷的国际义务帮助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这一严峻挑战。众所周知，近几年人类经历了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各种自然灾害。比如，2021 年是气候变化对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年份，中国多个地区均发生了洪水，造成了人员、物资等各方面的损失。同样，美国也出现了大干旱、大灾荒和森林火灾。这均是气候变化所引起的全球气候反常现象。为防止此类现象再度出现，中国有责任减少自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中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途径主要包括两种，途径之一是依靠技术更新、技术革命。这包括很多相关的技术途径。在城市的能源使用方面，由于中国人口在城市化过程中不断向大城市集中，而大城市的运输大多依靠汽油、柴



丁一凡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油等化石燃料，从而造成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

因此，为了实现承诺，中国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以鼓励人们使用新能源汽车。中国有多个城市将柴油公共汽车逐渐淘汰，升级为电动公共汽车；中国家庭也用电动车替换了汽油私家轿车。此类发展趋势将大大减少未来中国社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此外，早在“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中，中国已对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做出了多项规定，而中国也在实现此类目标的过程中取得了不凡成就。

途径之二是进行民众教育，改变民众的生活习惯，让民众适应减少碳排放量的生活方式。面对中国人口众多的国情，这无疑是一项大工程。城市生活采取少碳的生活方式，比如减少私家车的使用，增加低碳或零碳公共交通工具的使用，就可保证人人为降碳做出贡献。

中国已在科技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成为世界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国，为世界提供了大量不同种类的可再生能源工具，如太阳能板、风能电机、风能叶片，从而为其他国家发展可再生能源提供了物质保障。

中国在能源技术方面正在开发世界领先的可控核聚变技术。在此方面，中国已取得巨大突破，预计在 2035 年或 2040 年之前推出核聚变商业堆。核聚变的材料取自海水这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然资源。而核聚变是安全且环保的技术，核聚变的过程不会产生任何二氧化碳。因此，如果中国率先实现核聚变商业化过程，则意味着人类彻底解决了能源短缺的问题。

中国是一个工业制造大国，工业制造过程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而中国也为此做出了巨大的减碳努力。比如，炼钢过程需减少一氧化碳注入以增强钢的坚固性，用氢替代一氧化碳后，则可杜绝二氧化碳的排放。在此方面，中国虽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中国的潜力无限。

从技术角度分析，中国目前已有不断减排的把握。中国承诺在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在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从而为构建更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中国希望其他国家与中国携手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为人类的未来发展而努力，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而努力。

哥伦比亚在数字化技术和气候行动方面的经验和工作

随着各类新技术在全球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哥伦比亚自 2018 年以来也在不断完善有关数字化转型的国家政策。我们的政策力求利用数字技术为私营和公共部门带来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双重提升,从而推动生产力发展,实现可持续增长,并造福我国人民。

为实现这一愿景,我们提出了三项具体的国家目标:

第一,减少如文化差异、认识不足等碍于数字技术引入的壁垒,并调整相关法规,加强数字治理能力,优化数字经济。

第二,通过国际合作营造更好的创新环境,联通不同生态系统,制定资金支持项目以激励创业,发展信息技术,升级采购系统,提升公共服务。

第三,从教育的早期阶段入手提升人力资本建设,新技术优先,以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和文科为重点,最大限度增加当前和未来的科学、工业和学术成果产出。

我的家乡——麦德林市就是哥伦比亚在数字技术领域取得的长足进展的一个典型例子。麦德林市正积极发展数据科学、区块链、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先进技术,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智慧城市和区域中心,也是拉丁美洲唯一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中心。

该市着眼于四项更为宏大的目标:第一,加速拉丁美洲数字化经济转型,以此增强竞争力、提升国际影响力;第二,促进数字化转型和新兴技术的实施以提高中小企业的生产力水平;第三,将哥伦比亚打造为农业 4.0 标杆国



H.E. Luis Diego Monsalve Hoyos
哥伦比亚驻华大使

家，利用数字技术为作物耕种和供应链赋能，实现该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第四，带头制定和实施技术伦理和监管方面的框架，确保以合规方式应用新技术。

此外，我们将按照哥伦比亚政府的“国家发展规划”，力争在 2030 年前建成知识型社会。知识型社会中的国家机构、私营部门、科学界以及公众将共同运用科学技术解决各种国家问题。去年，哥伦比亚在科技和创新方面的投资占全国 GDP 的比例从 0.67% 升至 1.5%，这标志着哥伦比亚发展模式的转变以及哥伦比亚社会各界在数字化和包容性经济体系方面参与度的提高。

基于此类发展，哥伦比亚积极拥抱现代化和数字化，将创新作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原则，从而在与中国合作时形成可观的协同效应。中国正向着 2030 年成为人工智能强国的目标稳步迈进，此外，中国还制定了 2050 年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的规划。因此，在数据科学、数据治理、数据多样化、数字经济、机器学习和物联网在农村和城市发展中的应用方面，我们期待能与 中国携手合作，开展政策交流和实践交流。我们也欢迎中国对哥伦比亚制造业和其他产业部门进行投资，以此实现人工智能技术的知识转移。当然，我们也希望加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以造福当代和子孙后代。

关于哥伦比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工作，该话题与本论坛主旨十分相关，对“和谐发展共同价值，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至关重要。气候行动是哥伦比亚的头等大事。2020 年是有记录以来温度最高的年份之一，而从国家自主贡献、气候适应报告、减排报告和多个财报来看，要将升温幅度限制在 1.5 度，实则任重而道远。

哥伦比亚于 2020 年 12 月通报了更新版国家自主贡献报告。在《巴黎协定》的框架下，哥伦比亚承诺在 2030 年实现温室气体减排 51%，还设立了有关黑碳的目标。这是在技术层面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既着眼于宏图大计，也充分考虑了可行性。这将指引我们沿着正确道路向 2050 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迈进。

新冠肺炎疫情和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让哥伦比亚遭受了沉重打击，在此情况下，要兑现上述承诺，我们必须付出大量努力，采取相应手段，在财政能力建设和技术方面加以落实。在环保、能源转型、电动汽车、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可持续农业等领域中，技术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我们将继续巩固此类领域的工作。

此外，我们有必要加快和简化流程以迎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和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我们的目标是在大会上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并在透明度、气候适应、气候灾害、气候融资以及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等问题方面给予高度重视。

就哥伦比亚与中国的双边关系而言，鉴于双方均属全球最具生物多样性的国家，我们期待在 2021 年的 COP 大会以外，另行安排会议与中国共商合作。我们有意与中国携手合作，在生物多样性全球框架和气候变化的谈判中，确立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愿景。同时，我们认为财政资源的调配也是各方所共同关切的问题，并可借此团结其他发展中国家共襄大业。

为保证当代和子孙后代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必须尽早在技术创新与清洁生产之间实现平衡。其中，技术、气候变化与经济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不可分割的纽带。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同时也生活在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我们在探索新产业的优势时也应思索新产业对社会平等的作用，思索怎样利用其改变社会，以及政府应如何扮演好技术使用者和技术监管者的双重角色。

完善产业结构助力实现低碳转型

当前，中国产业结构主要还是高碳模式，将来肯定要往低碳、零碳的模式转轨、调整，这与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的本质和愿景上是一致的。碳达峰、碳中和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我有以下观点分享：

一是宏观层面的战略管控。我们已经开始协调资源、生态、环保、能源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双碳”作为一个新的变化或者比较大的变量，怎么样能够融入整个宏观层面的管控，需要各方面协同推进。宏观上的战略评价要把碳作为一个因素吸收进来，中观要有相应的手段，微观上要能落到具体的碳减排上。

二是把责任体系建立起来。之前的思路更多是从能源能效、低碳示范创建上，现在要从产业发展的总体思路、路径上进行大的调整，由此带来新的责任要求。目前中央已经明确，强度目标的考评要抓实，总量指标的考评作为辅助性手段，当前可能是抓强度指标的考评，逐步过渡到总量指标为主的考评，这也是回应碳达峰目标实现的需要。达峰的时间、峰值的总量，对应着责任体系以强度为主调整为以总量为主，同时要把责任与督察等做好衔接。

三是建立完善市场机制。“双碳”目标提出之后，比较快的有两项大的政策在推进。一项是气候投资，从高碳到低碳是需要资金投入的，需要发挥金融资源、金融力量的作用，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到“双碳”中来，需要更多的更有效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另一项是碳市场交易体系的构建。从七个省市的试点开始由点到面推开，当然还有行业范围、企业范围的一些限制，同时交易规则、体系能力建立以及有效性上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市场手段需要引起重视，包括价格、税收、定价手段等。当前碳价格的信号没有很好地反应出来，需要做一些创新。比如创



董战峰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中国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
政策所副所长

新补贴手段，补贴是导向性很强的政策，要结合“双碳”目标，在补贴的导向上进一步调整，包括碳汇补偿等。

四是做好立法和标准等基础性支撑工作。要推进产业转型，立法和标准是根本，比如碳中和促进法的立法要研究推进，再比如标准体系也不够完善，包括监督管理、核查、减排减污协同等，现在还有所欠缺。

五是加强监管和帮扶。首先是监管，各方面的要求、手段、责任都需要监管去落实。我们要快速把监管能力的短板给补齐，进而补强补优，包括应用新的监管手段等。其次是帮扶，现在很多部门和地方的认识是比较模糊的，思路不太清晰，需要加强指导和帮扶，帮助这些部门、行业、企业知道怎么去做。

六是加强技术创新。产业从高碳到低碳到零碳的转型，技术的角色是重中之重，技术到底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需要哪些技术上的创新突破和支撑，需要深入探讨。目前整个技术体系建设还有很大的不足，有些技术可能没用起来，还有很大的空间。需要通过科学的评估，摸清情况，谋划技术路线图、技术路径、技术体系，用科学的方法做一些科学的工作来回答这些问题。

智能脱碳

当前，全球疫情蔓延，民众生活艰难，热浪与洪水肆虐让人们更加坚信极端天气频发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

今年伊始，全球气候协作前景较为乐观。几周前，G20 财长首次承认“碳定价”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潜在方式。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就减少碳排放提出若干新政，并计划加大投资绿色能源产业。在此背景下，实行有效的经济激励措施是十分必要的。此外，今年还将举行《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15 次缔约方大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6 次缔约方大会以及罗马 G20 峰会。

近期，火灾和洪水频发凸显了相关会议的紧迫性，各方需加快落实碳达峰和净零排放承诺，完善国家和地区相关机制建设，制定相关法律。这些举措将推动世贸组织改革，加速能源转型，推动与《巴黎协定》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相适应的经济转型。

欧盟公布了《欧洲绿色新政》，其包含先进的碳定价方式和有效干预措施，其中包括最先进的碳排放交易系统、绿色金融共同分类标准，用于披露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投资风险 (ESG) 的《欧盟可持续金融信息披露条例》，以及碳边境调节机制。美国正在全力向欧洲和中国看齐，而欧盟与中国已开展大量务实合作。欧盟和德国支持中国建立自己的碳排放交易系统，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已于 2021 年 7 月 16 日开市，这将超越欧盟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其次，中国人民银行与欧盟一道参与绿色金融合作，致力于形成绿色分类的统一国际标准，以引导资本流动方向，助力中国实现“双碳”目标。参考《欧盟可持续金融信息披露条例》，中国的金融市场参与者们正在调整 ESG



Thorsten Jelinek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太和智库欧洲中心主任
世界经济论坛主管(2011-2014)

指标以适应中国市场，中国政府也在有序推进信息披露标准化工作。

第三，虽然中欧投资协定被冻结，但其包含的投资和环境条款有助于改善激励结构。这些成就源于中欧双方 2005 年在气候变化领域所建立的伙伴关系，以及有益于双边合作的中德环境论坛等高层对话平台。我本人就曾参加中德环境论坛。

对于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中美两国均持反对态度。碳边境调节机制计划于 2023 年实施，届时将对具有碳泄露风险的产品征收进口关税。虽然该机制的发布可谓是欧盟的又一“高光时刻”，但域外国家视其为潜在的贸易壁垒及保护主义措施，可能会引发反制措施，反而不会减少排放量。因此，中国敦促欧盟将碳边境调节机制与碳排放交易系统挂钩，以减少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避免对中国企业双重征税。然而，鉴于中欧碳市场计划存在显著差异，想要实现两个系统的挂钩以确保公平，仍有大量工作要做。因此，持续的合作与协调对于求同存异，承认分歧并努力减少分歧至关重要。对此，时间是关键。

技术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例如，当前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的科学论文中，仅有不足 1% 涉及包含气候行动在内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科学家们必须对当前引发暴风雨、火灾、洪水等极端自然现象的多种复杂因素进行研究，并针对碳减排技术与地球工程技术，如碳捕集、碳封存、森林碳汇、地质碳汇、智能信息物理系统脱碳等开展更广泛的研究。

但是，相对于过去那样过度依赖技术和市场，国家和国际层面协调一致的政治行动更值得人们关注。其实，人们可以通过政府治理与政治干预改变激励结构，让全球循环经济成为可能。事实上，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早些时候所报道的，我们正在经历“产业政策复兴”。大多数国家在过去三十年间任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经济进行调节，而如今各个派别的政客都坚信经济增长离不开强有力的政治引导。因此，我认为不同政治体系目前存在一定程度的趋同，只是我们还不愿完全承认罢了。

作为结束语，我想说：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 1.5 度以内的可能性非常渺茫，采取更为直接的减排措施和更有效的干预措施势在必行。但是，必须要从社会公正的角度出发，根据经济发展阶段来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总的来说，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需要继续为发展中国家做出表率。如果中国在协调全球气候行动方面能发挥出超过欧洲的作用，我们就可以更加确信，由人类所引发的气候问题将得到大大缓解。

主动出击，应用多种金融手段 推进碳金融工作

当前，世界各国的政府和人民已经在气候变化这一议题上达成共识。中国目前正在推进碳金融工作以应对气候变化。在对世界做出贡献的同时，受限于自身能源结构现状和经济发展现状，碳金融的实施也对中国发展造成了制约。

其一，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能源需求较多。此时对碳排放量加以限制，无疑会对中国发展产生制约。其二，中国的能源结构呈现“多煤、缺油、少气”的特征。为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就要对煤炭使用加以限制，这会对中国发展产生不利影响。针对此问题，中国应变被动为主动，采取主动方式推进碳金融。

所谓碳金融，指服务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一系列金融组合。碳金融的涉及面非常之广，其包括投资、信贷、债券、租赁、保险、基金等业务。中国应在碳金融领域实行有机组合，以此推进相关工作。此外，中国还应综合采取相关产业政策、财政政策，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能源结构调整，进行节能减排和乡村振兴，并将“一带一路”倡议与碳金融有机结合起来。

中国在推进碳金融时，将不得不面对控煤问题。发达国家在此方面积累了相关经验，比如，英国的控碳、控煤对节能减排的作用达到了10%。因此，中国不仅可以借鉴国外经验，还可以同时利用国外的资金和国内的资金来共同推动碳金融工作。

有关控煤后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能源的问题，中国应加大在海外找油、找气的力度，以此弥补中国国内用气量不足的问题。全球也应建立相关能源基金，将各国利益，特别是能源国的利益相连，加大气田和油田的开发力度，以



黎维彬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国家开发银行原顾问
首席经济学家(2011-2013)

此弥补控煤所带来的能源不足。

同时,中国应在信贷和债券方面,以及其他政策方面,加大对节能减排企业的支持。中国的碳金融政策应对参与节能减排的中小企业增加金融支持。与此同时,中国在进行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调整中间,还应注意乡村建设,因为乡村建设是实现碳汇的重要方面。而在金融政策方面,中国应利用投、贷、债、租、信、保,运用基金为进行节能减排或结构改造的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总之,将金融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相结合是中国推进碳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

加快低碳技术发展迫在眉睫

首先,我想提出一个简单但又发人深省的问题——还有什么比干净而优质的空气更重要?如今,人类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这些成就大幅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质量。科技变革推动世界财富增长,其增长量超乎人们想象,但同时也造成了气候变化,加速了生态破坏。全球整体气温逐年上升,可能产生大规模破坏。为了将全球温升控制在《巴黎协定》中所提出的 1.5 度到 2 度,全世界必须在 2050 年前实现温室气体的零排放,并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负排放。我们只有齐心协力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当然,这需要在能源领域快速完成系统化的转型,从节能和提效开始,并逐步利用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燃料。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大部分来自北半球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其目前正在广泛开展减排行动。几乎所有经济活动都需要利用能源进行。这自然造成了这一现状:2020 年,约有 73% 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来源于能源相关活动。

过去十年,减缓气候变化这一问题已引起大众的激烈讨论。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只有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前提下进行减排,才有可能取得成功。我的祖国索马里和很多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均拥有丰富的可再生能源,比如太阳能、风能、地热能和水能,其在提供能源的同时,也为社会 and 经济发展带来了新机遇。过去 200 年的大多数时间里,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繁荣发展和经济进步都伴随着持续增长的能源消耗。然而,如今人类面临着巨大的能源挑战。因此,在 21 世纪,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面临着双重能源挑战——既要填补尚未获得现代基础能源服务的数十亿人的需求,又要与全球一起过渡到清洁低碳的能源体系。世界银行表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技术能力正在缓慢提升。利用现有的低碳技术将全球温升控制在 1.5 度,这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需要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大规模推广低碳技术为前提。



H.E. Awale Ali Kullane

索马里驻华大使

在低碳发展的技术转移和创新方面,低碳技术的成本在降低,该领域的投资、贸易和创新活动也在不断增加。然而,世界上的一些极贫国家和地区并未从中受益,其在低碳技术市场中的交易或创新活动几乎为零,却又极易受极端天气和洪水的影响,基础设施易遭破坏,且会面临丧失栖息地的问题。过去十年,诸多技术进步和削减成本的方法让许多国家和地区得以提高可再生能源的产能。

目前,中国、美国、巴西、印度和德国是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国。有赖于技术进步,这些国家能够在微风等各类条件下进行发电,风力发电公司积极推出更高效能的新设计,而太阳能电池板技术也实现了很多创新。我满怀希望和欣喜地看到: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已开始利用最新技术,投入数十亿资金,以期在未来几十年间实现碳中和目标。这一次,中国再度走在前沿,宣布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并将在短时间内发布更为全面的减排计划,提出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宏伟目标。为了显著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并大力开发绿色能源,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技术变革。有关国家或地区的能源体系转型,共有四项总体战略:一是在所有重要的经济领域(如建筑业、运输业和工业)减少能源需求,从而减少化石燃料需求;二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用更少的化石燃料来满足“终端”的能源需求,从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三是利用低碳或零碳能源,如天然气、核能,以及生物质能、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以替代煤和石油等高碳化石燃料;四是捕获和封存化石燃料燃烧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防止其散逸到大气中。

最后,我想用以下观点总结今天的演讲。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架构应进一步加强,使最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也能从中受益。发达国家和地区应该带头合作,为全球的决策者、利益相关者、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提供相关平台,以供他们分享杰出的研究成果、交流鼓舞人心的想法,为我们的后代创造出更为安全的世界。应创造出对低碳技术产品的需求,并通过补贴、公共采购和资助等国内政策鼓励创新。温室气体减排的技术创新还需更多的专业技术人士积极参与,特别是各类学科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们,因此,知名高等教育学府应该在此方面起到带头作用。非常感谢太和智库邀请我参加第五届太和文明论坛,让我有机会分享自己对此类重要问题的看法。

碳达峰、碳中和 ——中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碳达峰、碳中和是中国政府在 2020 年 9 月 22 日向全世界宣布的宏伟战略目标。具体的目标是在 2030 年之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既是一个现实的目标，又是一个长远的目标。它将推动中国经济、能源系统和生活方式的全面转型。

我今天讲的内容涉及三个方面：第一，碳达峰、碳中和问题的由来；第二，中国碳达峰、碳中和决策出台的背景；第三，如何面对这一机遇和挑战，实现中国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碳达峰、碳中和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终极目标。早在 1992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订之日起，大家就希望在二十一世纪末将温升控制在 2 度以内，即到 2100 年时，全球的温升和 1760 年相比，变化幅度不超过 2 度。

后来，由于气候变化的问题更加严峻，《巴黎协定》提出将气温升幅进一步限制在 1.5 度以内的目标，并把碳达峰、碳中和的时间提前至本世纪中叶或下半叶。也就是说，比 1992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提的目标提前了 50 年到 30 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整个世界都要做出坚决的努力。

正如习近平同志在联合国第 75 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所指出的：《巴黎协定》代表着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大方向，是保护地球家园最低限度的行动，世界各国都必须迈出坚定的步伐，中国也不例外。这是中国向全世界作的庄严承诺。中国做出碳达峰、碳中和的决策，正如习总书记所说，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的决策部署，不是激情之作。中国在 1990 年已经对此做了



李俊峰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
国际合作中心首任主任
中国能源研究会常务理事

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在 1992 年到 1994 年期间,当时的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环保局研究中国未来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策略有关问题,提出了提高能源效率、发展可再生能源以及增加森林碳汇等重要措施以应对气候变化。1998 年,中国政府制定了“节约能源法”,2005 年颁布了“可再生能源法”,为后来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特别是 2006 年开始,中国政府实现能源双控,也就是对能源消费总量和能源强度进行控制。2011 年开始,中国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进行控制,使得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开始脱钩。

2012 年开始,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逐步实现下降和趋缓,为我们后来提出的碳达峰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我们的碳中和目标做出了重要铺垫。特别是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居于世界前列。尤其是风能和太阳能,到 2020 年,发电装机已经超过了 2.5 亿千瓦,总量接近 6 亿千瓦,为我们建立新一代的电力系统奠定了重要基础。所以,中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且是有客观基础的。

中国所面临的碳达峰、碳中和,到底是机遇还是挑战?发达国家大体都在 20 世纪 70 年代、80 年代实现了碳达峰,预计到 2050 年,大约用 50 年到 70 年的时间实现碳中和。而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二氧化碳排放量还在不断增加,中国制定了 2030 年前力争实现碳达峰的宏伟目标,这决定了中国在实现该目标的过程中,必须转变发展方式、能源系统,甚至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才能如期实现碳达峰这个艰巨而又必须达到的目标。在实现该目标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认真分析自身所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克服困难。中国目前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和矛盾:

第一,中国的能源结构偏煤,中国长期以煤为主。最高的时候,煤炭占比超过 70%。虽然在持续努力,但目前中国煤炭占比仍在 60% 以上,比全世界的平均水平高出近 50 个百分点,所以首先要解决能源偏煤的问题。

第二,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承接了大量发达国家转移的落后产能,特别在工业结构方面,如钢铁、水泥、化工等重工业的比重较高,即中国的结构偏重。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比重相对较高,中国的第二产业比重较高,特别是重化工工业较高。

第三,中国的能源和资源的利用效率偏低。由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还面

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和障碍，特别是技术落后、管理水平偏低的问题。因此，尽管中国人均能源消费并不高，但中国的能源效率偏低。中国的 GDP 能源强度和 GDP 碳排放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1.5 倍到两倍左右，是发达国家的三倍到四倍左右。

如果中国解决了能源偏煤、结构偏重和效率偏低的问题，中国也可以与发达国家在同一平台上实现碳中和。所以，中国在实现碳达峰的过程中要不断提高自身能源利用效率，改善能源结构，调整经济结构，从而顺利实现碳达峰，并且是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前提下的碳达峰。这就为我们未来的碳中和奠定重要基础。

关于碳中和的时间问题。发达国家在碳达峰之后，基本都计划用 50 年到 70 年左右的时间实现碳中和，而中国只会用 30 年的时间。很多人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是否需要 50 年或 70 年的时间实现碳中和？

从政治上讲，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宣布，到第二个百年的时候，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0 年的时候，即 2050 年左右，中国要全面实现现代化。

从中国实现碳中和的可能性来看，建国 70 年来，或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用 70 年或 40 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 200 多年工业化的历程。我们完全有能力用 30 年的时间走完发达国家 70 年或者 50 年碳中和的历程。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的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开放，中国学习了国外的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不断进行创新发展，使中国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发达国家 200 年左右的工业化的路程。那么，中国在碳中和的过程中，也要不断进行国际交流与合作，不断学习发达国家在进行碳达峰、碳中和过程中先进的经验和先进技术，从而如期实现“双碳”目标。所以，我们应该有信心和决心，以及持之以恒、不断改变的恒心以实现中国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如此一来，在 2060 年之前如期达到目标是可能的，大家应该树立这样的信心。

碳达峰、碳中和实际是发展转型，也是创新的竞争和竞赛。中国宣布碳中和时间表之前，欧盟已经宣布了碳中和时间表，而中国宣布碳中和时间表之后，韩国、日本、美国都在今年宣布了碳中和时间表。所以，目前占全球 GDP 的 75% 以上的国家和经济体都已经宣布了碳中和时间表，碳中和成为了世界潮流。

碳中和本质是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或低排放发展，本质是从资源依赖走向技术依赖。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每个国家都不想落后，中国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必须学习用创新思维解决问题，把所有的不可能变成新挑战或新机遇，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就是一种创新。这种创新需要不断的技术进步，也需要不断的体制和机制创新。

过去的 30 多年，特别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达成以来，全球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了各类低碳技术，低碳技术因而突飞猛进。以光伏发电为例，1990 年，光伏发电的成本大约一瓦 20 美元左右，现在已经降到了 40 美分左右。在 10 年前，中国的光伏发电还在两块钱一千瓦时，现在已经降到三毛钱以下。在国际上，已经出现了 1.5 美分以下的光伏发电。

所以，国际能源署也认为可再生能源发电，特别是光伏发电，有可能在未来成为最廉价的发电形式。所以，中国提出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欧盟和美国提出构建零碳排放的电力系统，都是一个道理。都要用非化石能源或是可再生能源来取代我们的传统化石能源发电，以此实现我们能源系统的零排放。

同时，我们还要在工业系统、建筑系统、交通领域，甚至我们的生活方式方面，完成绿色低碳的转型和变革。如果我们的创新取得了实质进展，我们的目标就能如期实现。我们也应看到这是大势所趋，也是国际化进程。

我们可以看一个典型案例：2021 年 5 月 26 日，荷兰海牙法院判决荷兰皇家壳牌公司在 2030 年底前将其二氧化碳排放量在 2019 年的水平基础上减少 45%。壳牌是一个富可敌国的大公司，它的辩词也非常严谨。

首先，壳牌认为有消费才有杀戮，有开汽车的，才有卖柴油、卖汽油的，因此称自身无罪。第二，壳牌认为，如果卖汽油、卖柴油有罪，那么卖汽油、卖柴油的公司并非只有自己一家，它认为“非我一人是戴罪之身”。第三，壳牌认为，如果自身败诉，那么全球为汽车行业提供能源的工业都会受到打击和“围剿”，这会危及全球能源安全。

但法官认为，吸毒和贩毒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吸毒的人是受害者，贩毒的人是获利者，所以应该对贩毒的人处以惩罚，而不是惩罚吸毒的人，所以判决壳牌有罪是有道理的。至于壳牌的第二个理由就更站不住脚，法官不可能把所有罪犯都绳之以法。但当人们把罪犯放在法官的面前时，

只要其有罪，法官就会判处有罪。至于能源安全，不在法院管辖范围内，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要到本世纪末实现碳中和，要用非化石能源取代化石能源。所以，如果壳牌当真认为自身无罪，则应该去颠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或者与荷兰政府打官司。

该判例对所有的企业、个人都是警醒。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过程中，人人有责。每个企业和个人都应考虑自身生产过程、消费过程、消费习惯，认真考虑自身碳足迹，消除自身碳足迹，共同为碳达峰、碳中和做出贡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未来，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相关技术进步和发展转型，把一个美丽的地球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只有这样，我们才无愧于这样一个时代。

希望大家在碳达峰、碳中和的过程中不断思考，不断创新，走出一条低排放、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保证我们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如期实现。

中国的脱碳技术正在为全球实现 温室气体零排放做出积极贡献

我们这次是讨论碳排放和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希望能够使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解决全球最为严重的气候变化问题。目前，各国专家在全球范围之内都已经达成一致，那就是人类燃烧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导致了温室效应，致使平均温度升高，给人类生活带来了许多负面后果，特别是不断恶化的环境也导致了很多人患传染病和流行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每年全球有 20 亿人患有传染病，其中 1400 万人会因此而死亡。根据联合国数据，在近几十年来，由于气候变化导致全球荒漠化的速度加快，现在全球由于荒漠化已经有 20 亿公顷生产型的土地退化，每年有 1200 万公顷的土地退化。与荒漠化、土地退化、水资源短缺和粮食安全相关的问题也影响到整个上合组织的区域，特别是中亚区域，中亚区域的社会经济稳定对于整个上合组织都是至关重要的。

在此背景下，我们看到咸海在不断干涸，气候变化给这一曾经是世界上第四大的湖泊带来了一场环境灾难。2019 年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结束时，在上合组织成员国的首脑宣言中强调，日益增长的跨境安全挑战和威胁包括气候变化、饮用水的短缺，这些都需要全世界、全社会进行特别关注，并进行合作与互动。同时我们也希望，在上合组织区域内能够实现生态平衡、恢复生物多样性，确保人口的福祉和可持续发展，同时能够执行上合组织成员国环境保护领域当中的相关概念。2020 年上合组织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议上，乌兹别克斯坦主席也提出，在上合组织内采用上合组织绿化带的发展计划，这个方案的目标就是在经济领域当中使用一些可以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增加可再生能源和低排放能源的份额，减少向大气当中温室气体的排放。现在我们的绿化带计划正在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进行讨论。当前，上合组织成员国正在努力减少碳排放，实现碳中和，这将会涉及到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生产力的提高，稳定提高粮食产量，



H.E. Vladimir Norov

上合组织秘书长

确保粮食安全。同时，防止自然灾害以及加强上合组织成员国的能源独立性，对于中国与亚洲国家，对于全球的气候变化斗争，都是一个好消息。

2020年9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做出了2060年前力争实现碳中和的承诺。对全世界而言，中国做出这些承诺使国际社会更接近于实现《巴黎协议》中将全球变暖限制在2度以下的目标，而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计划的实施，也将给中国带来切实的经济效益。根据现有的数据，实现1.5度目标的计划将使国家GDP增加2%-3%，到2050年减少对化石燃料的需求约80%，并减少75%-85%的碳排放。中国的脱碳举措为加快技术创新和生产现代化创造了巨大的机会，这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的经济。同时，中国是一个全球制造业和创新中心，通过为本国设定新的目标，中国正努力成为实现温室气体零排放的国家以及最大的脱碳技术供应国。在今天的会议以及接下来的分论坛当中，我们会就推动工业数字化以促进碳中和技术和碳金融领域的创新、实现全球和上合组织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共同目标进行讨论并提出具体的建设性建议。

关于碳中和问题的一点思考

一、碳中和驱动我国经济转型

未来 10 到 40 年间，碳达峰愿景、碳中和愿景是我国经济改革发展的时代背景或说约束条件。因此，我国定会加速推进经济转型，追求可持续发展。具体而言，主要依靠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转变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和交通运输结构，最终实现经济增长、社会包容与环境可持续。

二、碳中和或导致不同主体淡化和逃避减排责任

进入 21 世纪的第 3 个 10 年，许多国家和地区政府以及大型公司已经发布实现碳中和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这一方面令人鼓舞，全球各界展现决心，共同减缓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但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导致不同主体淡化甚至逃避减排责任。碳中和的概念同时包括碳源和碳汇，也就是说“碳源-碳汇=0”，即碳源等于碳汇。有了这个数学等式，就有了变通的可能。相对较为富庶的国家和地区以及有实力的大型跨国公司，既可以通过减少碳排放来实现碳中和，也可以通过投资碳汇项目，如从碳市场购买碳指标来抵消碳排放，进而实现碳中和。存在三种情形可能导致不同主体淡化或逃避减排责任：一是碳指标买方更有意愿和实力压低碳价格（碳市场上买方少、卖方多）。二是易于造成贫困国家和地区成为污染聚集的热点地区，陷入贫困和环境污染的恶性循环。三是许多碳汇项目汇集碳量的评估方法不科学，具有随意性和不确定性。以林业碳汇为例，森林固碳量依赖于林木种类、大小、质量、生长年限等诸多因素，而且万一森林出现火灾或被砍伐，那么其以前固定的碳又可能重新排放到大气中。

举个例子对比说明一下，我国现行实施了一种政策措施——耕地红线：确保 18 亿亩耕地红线，但允许耕地占补平衡，也允许各地整理出来的耕地



林永生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市场经济

研究中心主任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

研究院副院长

指标跨省交易。这里也运用了一个数学等式，即允许占补平衡和跨地交易的方式来确保耕地红线，不过，这种方式有利有弊，极有可能的情形是，那些交易来的、用于平衡的耕地指标，其质量或肥沃程度远远逊色于初始被占用的耕地。

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各国各地追求实现碳中和的过程中，建议更多强调从碳源上削减排放量，在碳汇方面是否可以考虑限定允许抵消的排放指标比例，以减少或避免碳市场买家的不作为现象。

三、注重碳公平与碳补偿问题

特定时期内，比如一年内，任何国家或地区都会生产和消费一定数量的产品，且由于存在对内和对外贸易，所以生产的产品数量和消费的产品数量通常不相等。与此同时，产品生产过程会消耗资源能源并排放各类污染物，而产品市场价格中往往只包括了劳动力、原材料和资金等成本要素，并不能完全体现资源与环境成本。所以，对那些生产端资源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量远大于消费端的国家或地区而言，贸易制造了污染物排放的空间分配问题，包括碳公平。以京津冀为例，我们已经完成的一项研究表明，河北地区每年生产端排放的污染物数量远远大于消费端所排放的污染物数量，北京与天津则相反，京津冀地区贸易隐含大量污染物从北京和天津向河北净转移。

因此，无论是全球尺度上的国际贸易，还是全国尺度上的国内贸易，都隐含着碳排放的跨境和跨地区转移，从而引致碳公平问题。若要解决这个问题，碳净移出国家和地区应该对碳净移入的国家和地区支付一定额度的货币补偿，相当于是从隐性的碳交易市场购买碳指标，我称之为“碳补偿”。值得警惕的是，欧盟正在酝酿实施的碳边境调节机制（又叫碳关税）显然有违于这里提及的碳补偿原则。借助于国际贸易，欧盟将包括碳在内的主要污染物向出口导向型的发展中国家转移，使得后者成为“污染天堂”。欧盟不仅不给予补偿，还要对出口国的产品出口征收碳关税。欧盟碳关税政策果若实施，碳公平问题必将进一步恶化。

中国与印尼携手合作对实现碳中和至关重要

能够参加本届太和文明论坛，我深感荣幸，太和文明论坛是分享知识和推动经济科技合作的平台。我想谈以下三点。

首先，有关印度尼西亚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在印尼与中国建交的 71 年间，两国在 2013 年 10 月 2 日签署了《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未来规划》，双边关系进一步升级，而且两国的经济数据更能体现两国关系的加深。

在双边贸易方面，中国过去几年一直是印度尼西亚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21 年上半年，两国双边贸易额达 535 亿美元，印度尼西亚因此成为中国的第十三大贸易伙伴。在投资方面，2021 年上半年，中国大陆及香港地区对印度尼西亚进行项目投资 40 亿美元，促使中国成为印度尼西亚的第三大投资国。

第二，印度尼西亚政府已制定相关计划，预期在 2070 年实现碳中和目标，到 2025 年将可再生能源利用率提升至 23%，到 2050 年将可再生能源利用率提升至 31%。此外，在维持现有经济状况的情况下，印度尼西亚承诺在 2030 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少 29%，如有国际社会帮助，则将碳排放量减少 41%。为了实现这一规划，印度尼西亚将对大量潜在可再生能源加大利用，风能、太阳能、潮汐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将为印度尼西亚产生 4170 亿瓦特电能。但是，可再生能源目前只占印度尼西亚全部能源的 11%，因此，为了实现碳中和这一目标，印度尼西亚需要做出更多努力。

第三，国际交流与合作必不可少。印度尼西亚政府一直本着合作的精神与各国进行交往。与此同时，中国也立志减少化石燃料使用量，并承诺在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尤其在太阳能和风能领域，



H.E. Djauhari Oratmangun
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

已居于世界前列，且在以上领域成为全球最大的投资国。

鉴于此，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有着相同的愿景和需求，且具备互补优势。比如，两国已在投资、建筑、运营、技术、知识转移和人力资源发展方面展开全面合作。在可再生能源领域，两国也存在广阔的合作空间。事实上，两国早在 2017 年 11 月便签署了能源合作《谅解备忘录》，将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节能等领域展开合作。

我深信，中国和印尼要实现碳中和目标，加强可再生能源技术合作至关重要，对各个参与方均有多重益处。我坚信，政府、企业、学者、民众及其他利益攸关者的携手合作对于实现碳中和这一共同目标至关重要。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全体人员将全力协助各位协调和联络能源及科技方面的相关合作。

“双碳”目标下传统行业的转型与金融助力举措

很高兴在太和文明论坛就“双碳”目标下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之路和金融助力“双碳”目标实现的创新举措这两个话题谈一些认识和理解。

第一个话题，关于能源化工、煤电、钢铁这三个对“双碳”目标比较敏感的行业的转型升级发展方向谈谈看法。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能源化工特别是煤化工和石油化工行业的转型升级之路，未来应是从当前的燃料应用为主，逐步转向以原料为主的发展方向。简单来说，就是尽量不利用此类能源资源作燃烧反应以提供动力和热能，而是将其制成材料使用。这样就可以把隐含其中的碳原子加以固化，而不是转化成二氧化碳释放到大气中。以煤化工为例，传统上煤化工的主要产出是焦炭和甲醇以及后续的乙烯产品。焦炭则被用作燃料炼钢，这样就会大规模释放二氧化碳。从减碳的角度来讲，理想的情况应是煤化工的产出都是甲醇和乙烯等工业原料，而不再是焦炭这种燃料。但由于甲醇的碳氢原子比例为1:4，而煤炭中碳氢原子比例远高于此，因此利用煤炭自有的氢原子制造甲醇以及下游化工产品，总会产生碳原子的盈余，这些碳就会以焦炭等形式存在。为了把这部分焦炭也转为甲醇原料，就需借用外部的氢原子。一个解决方案是，用光伏和风能的绿电来电解制氢，以此制备的氢是绿氢。绿氢和焦炭结合用来制造甲醇、乙烯等工业原料，实现煤炭完全的工业原料的清洁利用。这些工业原料的终端消费形式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把碳封存起来，不会大规模释放二氧化碳。这是煤化工的一个转型思路。

关于煤电转型，未来即使实现了碳中和目标，煤电也不会彻底消失，而是通过技术和管理手段提高发电效率，保留其中一部分用以调峰，以此解决光伏和风电等供电不稳定的问题。这部分不可避免的煤电产生的碳排放，未来



孙天印

清华大学绿色金融发展
研究中心副主任

要以低成本的 CCUS 技术加以抵消。

关于钢铁行业,未来发展方向有二:一是氢能还原,二是长流程炼钢逐步转化为短流程炼钢。焦炭的主要用途是炼钢,一方面用作制热剂提供热量,另一方面用作还原剂置换铁矿石中的铁元素。提供热量这一环节可以用电炉来替代,但是还原就必须用其他还原剂加以实现。目前全球探索最多的是氢基炼钢工艺,即用氢替代传统煤焦作为还原剂来置换铁矿石中的铁元素,以实现冶炼过程的完全零排放。但受技术限制、成本较高等多方面因素制约,氢冶金仍以示范工程为主。

刚才所谈的是针对长流程炼钢,即从铁矿粉到钢材的全流程生产过程。短流程电炉炼钢则是指废钢的再利用。这一流程短了很多,直接让废钢进电炉,变成钢坯,再进行轧制,制成钢材。这样就去掉了还原过程,而还原过程是能耗和排放最大的部分。短流程炼钢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长流程排放量的三分之一还低,因此短流程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第二个话题,关于金融助力“双碳”目标的创新。

从激励政策的角度而言,一是央行的绿色宏观审慎评估。简单来讲,就是央行对金融机构的整体表现设置打分体系。为了鼓励金融机构支持更多绿色低碳的项目,这一打分体系将绿色贷款、绿色债券等业务作为较大的加分项加以体现。二是央行的绿色再贷款政策。再贷款是指由央行贷款给商业银行,再由商业银行贷给普通客户。如果央行给商业银行支持绿色项目的再贷款利率较低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就可以将较低成本的贷款给到绿色低碳项目,降低项目融资成本。三贴息和担保手段。主要是地方政府在实施,比如江苏、浙江湖州等地,都采取为绿色低碳项目贴息或担保的形式来降低低碳项目的融资成本,激励金融机构支持,也激励企业发展绿色低碳项目。

从产品创新支持低碳转型的角度,除绿色贷款、绿债等传统上支持新建绿色低碳项目的金融产品,目前也在推进一些支持传统行业转型的金融解决方案。比如,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或挂钩贷款,简单来讲,就是债券和贷款的成本不是固定的,而是未来随着项目的碳排放表现而浮动的,这样就可以很大程度上激励项目执行方(也是资金使用方)积极减少碳排放。

从利用国外低成本资金和转型金融方面,最近我们也在研究助力煤电提前退役的转型金融

方案。其原理用国外一些低成本资金,通过某种形式以当前的市场价格将某些煤电项目的股权买断,通过期限较短的低成本资金来置换期限较长的高成本现金流资产,实现这些煤电项目从原有 25-30 年的寿命周期缩短到 10-15 年提前退役。有关这一设想,目前国外某些金融机构,包括亚洲开发银行、花旗银行、汇丰等金融机构已经在开展尝试。好处是留给煤电项目足够的过渡期限,同时从金融角度也是可行的,尽量减少转型情景下煤电资产可能产生的经济和金融上的风险和问题。此外,还有与碳市场相结合的金融创新,比如将碳排放权用作抵押物以贷款融资等创新方式。

实现“双碳”目标， 中国需要更多的话语权

“双碳”是当前最热门的话题，但是我们需要冷静思考，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它不仅是环境问题，还是政治、外交、经贸和科技问题，它的复杂性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认识清楚，因此当前对“双碳”的讨论仅仅是开始。这一议题需要真正的国际合作，气变问题是联合国一个重要议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等都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如果这一点弄不清楚，那些造成污染、造成大量碳排放的一些国家缩在后面，而中国走上前台，为什么？中国的碳排放现在占全球的1/3，大家都盯着中国。但中国毕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所以在气候变化和减碳、“双碳”目标的实现上，要回归到联合国的基本原则。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不应该是同等待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议题，博弈才刚刚开始。

“双碳”本身意味着一场深刻的社会经济系统性的变革，牵涉面非常宽，不仅是能源革命的问题、技术革命的问题、工业革命的问题，还关乎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变，涉及到每个人。这也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所有的国家都应该关注，只有全球的共同参与才能解决这些问题。结合习主席提出的“两山理论”，以及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和落脚点，都证明这是全人类所面临的问题。目前，中国从上到下都在行动，各个行业都已经动员起来，全民意识也在不断提高，也需要国际方面的合作。“双碳”目标是一个需要争取而不是作为完全定死的目标，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国，面临的任务非常艰巨复杂，不是说给出一个目标就可以轻松实现的。从技术、指标和标准的制定，中国都有一个学习的过程。现在中国有一定的基础条件，完全可以参与标准和规则的制定，以便在应对气候变化当中能够站在前列。



孙永福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中国商务部欧洲司司长
(2003-2015)

对待气候变化问题应有清醒认识

当今世界最热门的问题莫过于应对气候变化。不过对待最热门的问题，恰恰需要最冷静的思考。我们既要跟上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步伐，又不能带着节奏走；既要有所作为，又要量力而行；既要实现减排目标，又要兼顾发展需要。总之，要根据我们自身的利益，做出正确的选择，采取正确的行动。

为此，我们必须清醒地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留给我们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的时间非常紧迫，容不得我们有半点儿懈怠和迟滞。我们必须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和坚定的信心和决心，以只争朝夕的精神，采取刻不容缓的行动，才能实现目标。这也是一个负责任、有担当的大国应有之举。

二、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已消除了绝对贫困，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建成了小康社会，但发展依然任重道远。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我们还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我们的经济还需要有长足的发展和不断迈上新的台阶。因此，在减排和发展的问题上需要妥善处理两者的关系。减排太狠太急，必然导致经济滑坡、失业增加、社会不稳。减排太慢太缓，难以实现已承诺的目标。这就需要统筹谋划、综合协调、平衡有序、稳步扎实地推进经济发展和减排的问题。

三、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仅靠现有减排技术和手段很难实现我们的减排目标，必须要有技术的创新和突破，必须要有新的去碳化和低碳化的技术，必须要探索和研发更新的、更有效的可再生能源。就目前而言，仅靠发展太阳能、风能、核电等替代化石能源是远远不够的。就现有碳收集、碳捕捉和森林碳汇的额度，冲抵碳的排放只是杯水车薪。因此，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是对我们



吴海龙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

智慧的考验，是对能否突破我们现有知识和技术局限的考验。

四、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实现碳中和需要改变我们现时的生活和消费行为。随着我国的发展，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百姓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但毋庸讳言，一些浪费和奢靡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也随之而来。我们每天都在消耗着无数的一次性用品；我们每天有无数的商品过度包装到了夸张的地步；我们每天在餐桌上浪费的食品无以计数；我们无数的建筑为了外表的华丽增加了大量的能源消耗。这些都增高了碳排放的比例。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们的生活和消费行为，重新定义高质量生活的理念和含义。只有低碳、绿色、节俭的生活和消费才是高质量、高品位的生活。为了地球和我们的子孙后代，让我们崇尚俭朴，拒绝浪费。

五、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需要有战略、有规划、有路径、有方法、有标准、有评估、有监督、有立法。落实“双碳”切记不能有水份、有泡沫，弄虚作假，做表面文章，甚至打着碳中和的幌子，滥用碳中和的概念，蹭碳中和的热度，追名逐利，巧取豪夺。实现“双碳”既要靠市场的力量，也要靠政府和社会的力量。碳交易市场的建立固然有利于推动碳中和的实现，但这只是实现碳中和的一个手段。政府的引导、监督、规范、立法等方面的作用无可替代。实现碳中和是全社会的事，涉及到每一个人，因此，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比如媒体、智库、非政府组织等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六、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美西方一直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要我承担更多责任，甚至把气候变化的责任诿过于我。另外，欧洲国家讨论出台“碳关税”的政策。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全球各国的合作，需要全人类的努力。光靠西方发达国家制定出一些超越发展中国家能力所及的措施和规则，甚至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规则，是解决不了气候变化问题的。

最近的迹象表明，一些西方国家，企图把气候变化问题政治化，把冷战思维带入其中，搞气候变化的政治集团，这是十分短视和狭隘的，会严重损害和破坏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和进程，必须予以明确反对和抵制。

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进程中，中国既要做好我们该做的事，承担起我们

应承担的责任，朝着我们承诺的目标迈进，也要应对好外部各种因素的干扰和阻挠。这一进程是对我们领导和决策能力的考验，是对我们科技创新能力的考验，是对我们市场调控能力的考验，是对我们产业韧劲的考验，是对我们全民气候意识和观念转变的考验，是对我们应对外部各种复杂因素的考验。

我坚信，中国能经受住任何考验，克服和战胜一切困难和挑战，实现 2050 年第二个百年奋斗的目标，实现 2060 年前碳中和的目标，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

数字经济时代的脉搏、机遇与挑战

一、信息技术革命引发新红利期

世界进入第六次科技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第三次互联网革命的交汇期，科技革命由为人类赋“能”转向赋“智”；工业革命推动工业制造由自动化、信息化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演进；互联网革命推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向物联网拓展。

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先进信息网络、物联网、量子计算、量子通信等前沿技术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是科技革命的主导，而信息通信技术革命使得整个世界的经济形态、经济联系、经济结构和经济动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新的技术革命带来了新的红利期。

二、数字经济改变了世界和人类社会

通信技术、IT 技术的融合发展，PC 与互联网的融合发展，智能手机与移动互联网的融合发展，均引发了数据的爆炸式增长。大数据的发展前景激发了人类社会的想象力，人类对大数据产生的价值赋予了更多期望，大数据也随之成为了时代发展的热潮。

人们利用数据创造价值的需求高涨，带动了以数据为核心、实现数据价值的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数字化的信息和知识成为了新的生产要素，先进的信息网络成了重要载体，信息通信技术成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

数据驱动的“第四范式”以及数据驱动的商业模式逐渐兴起，推动了基



张新生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通信科学
技术委员会秘书长

于网络经济、平台经济、数据驱动经济的数字经济迅猛发展。世界变了,世界由单纯的物理世界、现实世界变为了“物理世界和现实世界”与“数字世界和虚拟世界”并存的两大世界。

人类经济也产生了变化。当代经济呈二元性,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互交织。人类社会变了,人类社会呈现“人、机、物”三元性。而农业、工业、服务业的经济结构和价值增值过程也发生了变化,未来可以按照两个平行的维度发展,也可以相互交织。

传统的供与求之间的“线性”链接或“管道式”链接向闭环链接循环方式进行,最终颠覆了生产和消费关系,使产销关系日益模糊,出现了新的“生产消费者”(Prosumers)。世界经济的数字化转型、生产和交易过程可以不同组合方式进行,既可在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进行,也可在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之间进行,又可在纯数字世界中进行。

三、跨界融合成为新的发展趋势,社会呈第四产业特征

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带动生产、消费领域和社会民生领域新的应用需求不断高涨。任何单一技术、单类基础设施、单一服务都无法满足数字经济引发的海量、多元化的应用需求。

信息通信技术 (ICT) 和数字技术 (DT) 融合发展。比如,IT 技术的融合、IT 与 CT 技术融合形成 ICT,而 ICT 与数字技术融合形成 ICDT。新一代 ICDT 技术,及其催生的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在与各种应用技术融合后,会产生新的技术创新和跨界应用。

在基础设施的融合方面,先进的信息网络、使能数字技术以及算力平台构成了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在通信服务的融合方面,个人通信、媒体通信与控制类通信相融合,形成了统一的通信和网络服务;在网络融合方面,网络向云化、软件化、智能化演进,整个架构上“云、网、边”相互渗透、融合、协同的产业生态逐渐形成,信息通信网络成为了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社会提供感知、接连、计算、处理、智能分析和安全的能力;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互融合、相互交织,但同时又具有各自的运行规律和内涵。

技术融合变革引发了产业变革,不仅创造出新的产业发展空间,而且推动了产业格局深入调整。平台作为数据汇聚方和生态整合者,成为向数字化转型布局的重点方向。基于 OTT 的红利(网络红利)向基于优化配置资源、采用数据驱动模式实现数字价值的交易性、互动性、信息交

互型和创新型平台红利转变。

服务与新型信息基础设施融合，ICDT 技术向各行业渗透，信息通信服务业与各传统服务业协同融合，推动了智能制造、智慧农业、智慧城市、智慧医疗、智慧金融、智慧文旅、智慧教育、智慧物流的发展。

社会也呈现出第四产业特征。1962 年，马克·卢普在对知识产业定义时，首先提出信息产业相关概念；1963 年，日本学者梅棹忠夫基于上述概念提出信息产业论；1997 年，马克·普拉特在《信息经济定义和测算》中提出四次产业划分理论，将信息产业设为农业、工业、服务业之后的第四产业。随着数字化的快速发展，信息通信技术渗透到社会经济各个领域，应用日趋广泛，社会呈“第四产业”特征。

四、大国欲夺得技术制高点

大国欲夺得的信息通信技术制高点或大国科技军备竞赛的主战场共分为四类，分别是芯片或集成电路、使能数字技术、使能基础设施、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应用技术。

第一类：下一代芯片，包括半导体芯片和生物芯片。芯片被大国看成是“卡脖子”技术、加速器技术，其影响着国家安全，是可以带来巨大竞争发展优势的关键技术。

第二类：使能数字技术，主要包括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这些是数字经济和数字化转型的重要驱动力，是未来十几年、几十年间大国竞相争夺的重要技术领域。

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广泛渗透及与其他技术的融合，极大加速了相关科学领域的发展，成为当今最活跃的创新领域，深刻影响着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的发展。

例如，化学、生物等依赖大量数据的学科，要利用大数据、计算机仿真模拟进行研究，而基于海量的数据计算可以发展传统研究方式下很难发现的新规律、新现象。

大国针对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后发布了一系列战略发展规划，出台了一系列相关配套政策，布局了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和智能社会发展的创新理论和关键技术，突破了人工智能系统的核心

器件、高端芯片和基础软件，更重要的是推进了人工智能技术向各行各业和社会民生快速渗透融合，如医疗、金融、文化、农业、交通、物流、教育等领域。

第三类：使能基础设施。这是一个技术的战略意义和商业价值逐步提升的过程，是使各行各业应用成为可能的底层技术、结构或模型，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

一般认为，使能基础设施包括信息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及，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海底光缆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而一些大国将具有重大战略影响力和巨大商业价值的交易类和互动类数字化平台也纳入了使能基础设施的范围。

世界目前呈二元性，数字化对物理世界的映射不断拓展，数字化平台可以用于不同的经济活动部门，成为数字经济的中心角色、经济创新的基础、价值分割的基础，对全球经济影响越来越大，所以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制高点，或会引发新冲突。

第四类：应用技术。应用技术是指对特定行业产生变革性影响的技术应用。人们目前可以利用传统技术创造价值，也可以将应用技术与使能基础设施叠加，应用到不同行业或不同应用场景，与不同行业 and 不同应用场景协同、融合，产生更大的经济价值。

例如智慧城市，将物联网和人工智能融合在一起，应用到城市；自动驾驶则结合了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其他技术的应用。无论何种使能技术革命，都能催化产生新的经济形态。同样，任何使能技术与基础设施叠加、协同、融合，应用到社会各领域或不同应用场景，协调融合，将产生乘法效应，为技术创新和价值创造开辟新的空间。

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

经济全球化催生了产业链、供应链，同时，产业链、供应链的优化、重构推动了经济全球化不断向纵深发展。即使经济全球化在一段时间内受阻，甚至遭到破坏，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仍不可逆。

数字化的发展实现了数据获取、数据处理、数据分析、数据价值最大化或货币化的数据价

值链，成为所有经济结构调整和价值增值的新通道。

当代经济出现了两条不同形式的链接链条，一条是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产业链接，如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一条是虚拟经济的产业联系，即数据价值链。

数据价值链与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相结合，推动“第四次经济全球化”浪潮涌起。数据价值链与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相结合，成为新的跨国界、跨地域、跨行业、跨所有制、跨意识形态的新型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这主要由全球化的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目前，需求侧与供给侧形成相互匹配的链接，生产和消费的边界逐渐模糊，从而形成强大的产业生态体系。科技革命、产业变革与经济全球化交织在一起，同步发展，这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第四次经济全球化”大潮涌来，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

六、数字经济与碳中和

数字经济与碳中和是各国需要同时完成的两大重点任务。各国目前均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及碳中和的发展规则和目标，这其中存在机遇、挑战以及更大的经济发展压力。

信息通信产业发展也将节能减排作为重要任务。同时，信息通信技术革命和数字化发展也是碳中和的重要基础和支撑。只有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依靠先进的信息网络、互联网、物联网，才能更好地帮助我们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交通运输行业正在积极参与低碳转型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3月15日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中国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应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作为传统的交通运输行业也不例外,应当参与到实现碳排放、碳中和的变革中。

一、交通运输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行业

交通运输是传统行业,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行业。一是交通运输行业碳排放所占的比例较高。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下称“疫情”)影响,交通运输行业在一段时间内除承担防疫任务外皆按下暂停键,因此2020年碳排放数据不具有代表性。但2019年交通运输领域碳排放总量是11亿吨左右,占全国碳排放总量10%左右。二是今后一段时间随着社会需求发展及交通运输强国建设目标的推进,交通运输的需求仍会呈增长趋势,这个时间可能会维持一个较长时期。三是交通运输行业中的碳排放是被动的,比如客货运输量取决于出行和物流需求,运输工具是制造业提供的。

二、交通运输应“全行业”“全要素”“全链条”参与低碳转型

交通运输行业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任务艰巨,困难较多,但并非说就没有作为。目前交通运输行业正在实施的低碳转型发展的四个“进一步”。一是进一步调整用能的结构,推广低碳交通装备;二是进一步调整运输结构,大力发展多式联运;三是进一步创新组织模式,采用新技术、新方法、新理念,推动新业态发展,推动平台经济发展,提升综合运输效率;四是进一步推动公共出行,形成绿色的生活方式。对此提出三方面建议:一是应“全



张柱庭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中国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
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行业”实施绿色低碳转型。交通运输是大行业，其包括道路运输、铁路运输、水路运输、航空运输、邮政快递五大行业、六十多个子行业。从碳排放所占比例看，道路运输占 74%、水路运输占 8%、铁路运输占 8%、航空运输占 10%。因此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应当调动“全行业”。二是应“全要素”实施绿色低碳转型。尽管对交通运输的定义有多种不同的理解，但其基本内涵是不变的，即人类利用运载工具，通过交通运输线路和枢纽，实现人和物的位移活动。交通运输的基本构成要素包括六个方面：人、运载工具（铁路机车、道路车辆、飞机、船舶、管道等）、交通运输线路（铁路、道路、航道、航路等）、枢纽（车站、机场、港口、货场、仓储）、人和物的位移活动、与位移活动相适应的装卸设备；其中衍生要素也包括六个方面：速度、安全、舒适、目的（即位移活动的目的或称为计划）、信息（即各个要素时空匹配的需求）、组织（即将各个要素时空匹配的组织活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交通运输行业要调动各个要素参与绿色低碳转型。三是应“全链条”实施绿色低碳转型。交通运输行业是一个上下游产业环环相扣的链条，在这个链条中交通运输行业有被动性的一面，比如上游制造业制造出一定排放标准的车、船，就只能按照排放标准使用车、船。上游产业需要大宗煤炭、矿石运输，就只能运输煤炭、矿石。如果城市规划布局为“摊大饼”，那么市民出行即为“刚需”，交通运输只能布局客运线路。但同时交通运输也有其基础性、引导性的一面，例如实施低排放运载工具的强制性标准，引领制造业提高运载工具的先进性。因此交通运输应“全链条”实施绿色低碳转型。

三、交通运输实现低碳转型发展充满信心

交通运输行业实现低碳转型发展的减排战略、时间表、路线图和施工图正在制定。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其一定能实现低碳转型发展，大家应当信心满满。原因在于，我国交通运输领域碳排放总量占全国碳排放总量 10% 左右，这个比例本身是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在这个基础上，一方面在交通运输的碳排放中汽车排放占 74%。中国汽车行业已经把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的“四化”作为战略方向，新能源汽车的销售要在 2025 年占比 25%，因此汽车的低排放将会大大降低交通运输气体排放量。另一方面交通运输行业汽车排放中商用车、客货车比例不到 20%，但由于其使用中耗油高、强度大，碳排放却占排放 50% 以上，随着能源产业结构调整，占货运量最大的煤炭会减少需求，运输需求也会减少。此外客运调整运输结构后，中长距离出行由高铁承担，城际出行由市郊铁路承担、大城市市内出行由轨道地铁承担，对高耗能的客货运汽车的需求也会相应减少。

职业教育的使命、体系与数字化发展

各位专家分享，的确是“胸中有浪花，脑袋有火花”。我的发言是自己浪花和火花的总结，把这些内容分享给大家。

我想到最近三年看到一些不太理解的现象。比如我曾经和负责教育战略规划的官员和专家讨论过一件事，当年提出职教本科，十几年前从普通本科教育分化出应用型本科，现在又提出职业本科，这三类本科负责培养什么人？我得到的答案是，最起码是工程师吧。我说既然都是培养工程师，为什么要分成三类？这件事情至今没有结论，我们仍然不知道三类本科分别培养什么人。

一个月前《光明日报》发布了关于职业教育的大型联合调查，其中一个数据就是今年的中职招生与近十几年的下滑状态相比，有了很大的增长和发展。撰写者得出一个结论：中等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在增强。我表示不理解。有位老师给了我一个回答，即中职招生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学生可以通过中职上高等教育。那么我们能够据此推导出，中等职业教育的适应性也在增强吗？如果说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不同，其中一条就是不同层次的职业教育是为行业、产业培养不同层次的人才。现在大家都说本科生到生产一线是人才浪费，从行业角度说，这既是产业技术发展的必然，也是人才供给的无奈，中职学生不去生产一线，企业就只能找高校学生。



陈李翔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
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
原党委书记

“十四五”规划讲数字中国，明确提出要全面发展数字素养教育。对于全民教育而言，我们到底在数字教育素养上负有什么样的使命？我们能多大层面上解决这个问题？从去年开始，线上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这是疫情逼出来的。从前大家都在论证线上教育的优点，去年各类教育包括职业教育在内，线上学习几乎成为主流学习模式。但是大家到线上平台看一看，几乎所有的学习资源是非数字化的。线上教育到底改变了什么？到底为今天的数字经济发展做出什么贡献？线上教学内容是否跟得上数字经济的发展。这是我看到的一些不太理解的现象。

据此我又在想，比如本科教育问题，很多专家也提出职业教育要实现类型化发展，必须自成体系。对此，我大体赞同这一观点，但问题是这个自成体系怎么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趋势是什么？是比照普通教育的内部结构、内部层次一比一的对应发展。我们的双向沟通难道是如此沟通吗？类型教育是要用普通教育的结构层次来证明吗？所以我提出疑问：从教育的各个层面上，企业永远脱不开，职业教育非常重要的一个主体就是企业，到底企业主体地位从政策和制度层面上如何去实现？至今看不到太多的相关趋势。职教法征求意见稿我读了不下十遍，当年出台第一版职教法的时候我是立法小组成员。修订完成以后从文字内容上讲，职业学校教育大约占了本法修正案征求意见稿的 2/3 以下。这样的态势是否能支撑得起职业教育改革发展 20 条所主张的法律保障？20 条的愿景是希望有法律保障，很多想法都非常好，但是当法律制度要落地的时候又看不到了。与此同时大家又分享了很多当今社会的变化，比如教育和社会的联系。我们看到一个问题，留给职业学校教育的空间到底有多大，职业教育在未来到底能做什么？作为职业教育人，我们需要结合这些数据，考虑这些数据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很多人说正因为如此，要顺势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但真的是这个逻辑吗？

另一方面看技术变革带给教育和学习领域的影响，在我看来有两个基本影响已经很明显了。第一，技术变革使得社会成员获取知识的途径和机会变得越来越便捷，学校教育不再是社会成员获取知识的主要渠道。对此，我们不得不在职业教育领域思考关于职业学校的教育在未来体系当中的位置。

第二，深度学习技术正在导致就业领域非常明显的变革，尤其是智慧型劳动工具与人类的智慧和思维正在快速形成协同性伙伴关系，这是跨历史性的变革。可能会有人说，这种变革也许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不太多，但其实大家天天都在使用。相对低级的表现是，现在的学生与当年的教育相比至少有一个现象，在家庭作业中真正需要背诵的内容有所减少，说明搜索技术的应用在影响我们的思维和我们的工作。按照所谓学习的模型，教育和学习是从记忆开始的，但是这

一部分的颠覆和替代现在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了。

在这种背景下,当我们跟智慧工具越来越形成协同性连接的时候,它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人们未来的工作方式不是支配工具,而是与工具共同工作。在这种前提下,如何看待职业教育的发展和能力的发展?

站在职业教育的适应性上,我们至少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人的发展;二是人才的发展。这是所有教育必须面对的问题。现在有一个偏向,好像谈普通教育就要关注人的发展,讨论人才就是功利;讨论职业教育的人就踏踏实实讲外部的人才需求,不去讨论人的发展。甚至出现一种趋势,用一种偏向攻击另一个偏向。但当谈及适应性时,一定会绕不开两大适应性。在这种背景下,从职业教育的使命、结构和规模等问题看,我认为有三个问题是值得大家深思的。

第一,站在人才发展的层面,职业教育自身和产业伙伴的关系如何协调。这件事情不解决,职业教育中国方案、职业教育各种价值问题其实都解决不了。从人的发展来讲也是一样,普通教育的学习以知识体系为基础,职业教育的学习是以工作体系为基础,在学会做事当中学会如何做人,通过这样的逻辑来建构学习体系,所以职业教育和产业之间的伙伴关系一定是要找到的。

第二,职普融通的核心是什么?无非是说还是要去找到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伙伴关系。在这个伙伴关系里,我们一定要用一个伙伴的内部结构去定义另一个伙伴的内部结构才可以称为同等地位的类型教育吗?

第三,职业教育天然负有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职业发展机会的使命。因此我们必须促进另一个伙伴关系的形成,就是职业教育必须要促进教育与产业形成伙伴关系。需要有具体措施,例如如何为所有高等院校毕业生提供就业和职业生涯发展服务的教育支持,这在全球职业教育当中已经是基本面,但我国职业教育现状还有欠缺,因为我们的关注点还是内部职业学校教育的发展。如果只关注这一点,实际上是无法打开职业教育发展未来局面的。包括曾经讨论的中国特色学徒制。什么叫学徒?学徒的社会身份就是企业身份,就不是教育身份。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达成这一社会身份,在教育层面能做什么。但是现在所谓双主体,实际上在强化学徒制中学徒的学生身份,这显然是反逻辑的。

在印度尼西亚政府的独立校园政策中 加强优质职业教育的伙伴关系

我代表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感谢太和智库的邀请。今天早上希望向大家介绍如何在印度尼西亚政府的独立校园政策中加强优质职业教育的伙伴关系。

正如大家所知，印度尼西亚人口将在 2045 年时达到 3.187 亿。对此我们有一些预期措施，比如以人为本的发展，利用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城市化控制和移民管理等。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教育指标，印度尼西亚推出了五个方面的教育发展战略。其中之一是职业教育、创业精神和品格，这是印度尼西亚 2015-2045 年提高教育质量的目标。我们到 2035 年的目标是，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 12 年。我们计划在知识、技能、态度和价值这三个方面达成目标，增强竞争力。对于竞争力，我们会进一步让利益相关方加入，其中包括家长、社区、教师、同行，都能加入到未来印度尼西亚教育的环节当中。我们也面临着工业 4.0 时代对人力资源发展带来的挑战，世界上 84% 的岗位都将被精密的机器替代，我们应该做好人力资源准备以应对这样的情况。

让我们来看看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合作的里程碑。2017 年 5 月举办了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2019 年 3 月在巴厘岛举办了中印尼“区域综合经济走廊”建设合作联委会第一次会议；2019 年 4 月在北京举办了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基于这些里程碑式的会议，印度尼西亚和中国于 2019 年 4 月签署了“区域综合经济走廊”计划，主要包括三个地区：北苏门答腊省、北加里曼丹省和北苏拉威西省。根据谅解备忘录，我们已经在印尼合作开展了很多全国性项目，在西部、中部以及东部都有广泛分布。在巴厘岛我们开展了旅游基础设施改善和综合交通基础设施的可行性研究，以及联合开发旗舰旅游产品。我们也开展了其他“区域综合经济走廊”项目，主要分为北苏门答腊省、北加里曼丹省和北苏拉威西省三个集群。这些是我们跟



Yaya Sutarya

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
教育文化处参赞

中国合作的项目，双方共投资了 911 亿美金。同时，我们在高等教育、研究、创新和职业教育项目上开展了方方面面的各种合作。这些集群包括北苏门答腊省和北马鲁古省，项目主要目的是发展人力资源。除此之外，中国开展了职教企业社会责任项目，每一年我们都和中国政府在职业培训方面合作，企业社会责任项目共有 16 个培训课程。越来越多的印度尼西亚学生也来到中国学习。2019 年，印尼有 1000 多位校长、教师去中国学习职业培训。

此外，我们和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进行合作，邀请了 1000 多所大学或技术学校以及 901 个职业学校举行一些在线研讨会，主要是讨论发展问题。我们希望将这些会议升级成真正的校级合作。

中国和印尼合作在印尼建立了华为东盟学院，这是非常重要的与中国企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一项目致力于印尼当地人力资源的发展。

每月我们都与中国—东盟中心合作举办线上会议。这是中国高校招收东盟国家留学生线上政策宣讲会，有 25 所大学、1000 多名中学生或职校学生参与线上会议，每所大学都介绍了他们的招生项目和奖学金，为即将到中国学习的印尼学生进行了全面的介绍。

同时，我们与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合作开展校长领导力培训，邀请到很多职业培训学校校长参与。这一项目是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与印尼教育部合作，希望能够共同学习讨论领导力方面的内容，特别是讨论中国如何在职业教育方面进步、如何管理职业培训、如何管理职业学校以及中国中学的情况。

另外我还想谈一下印尼的职业教育体系。印尼有 14000 多所职业高中，有 500 多万名学生在读。职校 33% 在技术和工程领域，这也是最大的占比。

印尼政府出台了一些政策，希望能够提升人力资源和质量来应对全球竞争。印尼教育部、文化部等制定了专门的政策—学习自由政策。学习自由政策引入了很多利益相关方，比如家庭、老师、学校、社会、企业等，共同合作让印尼教育的未来更加优秀。

印尼总统亲自宣布了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包括与产业牵头联系和匹配、行业参与、简化开办职业学校手续等。现在在印尼开办一所职业教育学校可能不到一个月就可以审批下来，外国大

学在印尼进行职业培训的合作流程也非常简单，我们希望中国投资者可以来印尼就职业教育培训进行合作。

前述学习自由政策得到了一些资源支持，比如学术界团队、制定的战略、研发团队、课程开发、课程设置等。我们用“Wedding（结婚）”这个词来形容，实际上就是产学研之间的结合。包括职业教育和产业、劳动力的结合，比如有专门的独立校园、学习过程以及课程开发、邀请行业优秀代表人士做讲座和介绍等。大多数学生毕业之后会在企业工作，所以学校和企业的课程必须非常密切地贴合。

“Togetherness”的意思是把学校和产业结合在一起，我们的职业中学原来是五年制，现在是三年制，可以让学生提前进入相关产业实习。在大学中有不同的级别，比如第二级、第三级以及应用学位。这是使大学、中学、职业培训与企业结合的举措。除此之外，我们还和所有的利益相关方进行合作，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不管有没有新冠肺炎疫情，这种教育改革都会持续进行下去。职业教育应建立在实际技术在企业的运用和操作上。疫情暴发后，很多课程都在线上完成，很多学生没有进入企业实际操作的机会。印尼教育部一直试图减少职业教育的损失，开展了在线课程，并开发了一些在线评估工具。

现在印尼疫情还没有结束，虽然线下教学和活动两周前开始了，但疫情还不是十分稳定。我们希望强化创新措施，通过技术反馈、预期影响来完成这一转变。比如，疫情期间学生的毕业流程可能简化，但对学生“硬技能”、“软技能”和职业操守的要求没有改变。

当前，印尼职业教育进入了新常态，我们要适应新常态，比如一些大公司试点“健康状况”监测，并开展师资培训在线教学等。这对于所有国家都是一样的，而印尼更有特殊性。印尼由1700多个岛屿组成，很难进行集中统一的学习。

这是我关于印尼职业教育政策、如何适应新常态、如何提高职业教育质量的介绍。

工业数字化转型下的职业教育适应性辨析

我的汇报围绕适应性，从行业的角度谈三个观点：一是服务数字化转型是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新战略起点。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职业教育有不同的阶段，以五中全会为标志，特别是总书记七一讲话，职业教育进入了一个历史新阶段。我们必须回答，我们的起点在哪？增强职业教育是两重含义，一方面面向未来可能还有不够适应的地方；另一方面要强调往前看，立足当前往前看。二是优化人才供给是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战略重点。这是面向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征程、新的时代，职业教育位置在哪里？我们需要的重点是什么？三是产教融合是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战略支点。这既是三个观点，也是三个建议。

第一个观点：为什么说是起点？进入 2010 年，有两件事推动了社会经济发展，一是产业变革，二是科学技术革命。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但是不能简单等同。其实科技革命一直在酝酿，只是现在成体系显性展现出来，很重要的原因是伴随着产业变革。2010 年提出回归实体经济，2015 年提出中国制造 2025，我们开启了向制造业强国迈进的步伐，紧跟着 2017 年新一代知识产业的发现，一直到 2045 年成为制造强国，整体是这样一个产业发展趋势。

但科技革命里产业变革的内容不同，工业互联网也好，5G 应用也好，所有的基础就是工业信息技术。产业数字化转型先从制造业、工业开始，然后紧跟社会转型。服务数字化转型是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起点。怎么确定这个起点？我提出三个问题：第一，我们要研究未来三到五年的产业、技术和人才是什么样子。要培养一个标准的专业化人才，至少三年一个周期，因此现在就需要考虑三年后是什么样。如果还考虑当前，培养出来的人才永远无法实现产教融合，因此做好产业研究是适应性的前提，然后在此基础上



陈晓明

机械工业教育发展中心主任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教育培训部主任

再考虑未来的专业是什么，未来专业的资源是什么，未来的优势是什么，未来的生态是什么。这些综合起来可能构成我们面向未来职业教育发展的增强适应性的战略性考量。这是一个观点。

协同创新、融合驱动、聚合赋能、要素优化，这是从产业业态来看近十年来产业变革的几个主要特征。迅猛、高端、定制、极致、重构，这是技术变革带来的特征。所以讲职业教育数字化，教育技术的数字化或者教育数字技术和培养适应数字人才相比，后者更重要。通过分析适应性，目前根据我们的调查，在数字领域的变革，特别是制造领域，实际上就隐含着“中高本”的结构，目前在企业中已经是这样，装备系统的标定、代码编写、数据采集一直到后面数字信息的可视化，基本上与中职职业相关。再往后的数字仲裁、数字化系统的规划，也就是产品的数字全生命周期可追溯，是职教本科的任务。当然数字化技术不仅在制造，也不仅在信息，作为一项基础技术，在汽车、模具、电子信息产品、高端医疗等方面都是有相应应用，也就有相应岗位。

第二个观点：优化人才供给是我们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重点。除“十四五”整体规划以外，从中央布局怎么解决“两提高”战略的问题，提高产业技术高级化和产业功能现代化是重要的核心。职业教育整体解决供给问题以外，还要服务国家战略。“双碳”战略是国家的战略，发改委刚刚发布推进双碳科技创新的技术体系指导意见，这同样与专业人才培养有关，会带来相应的变革。以机械行业为例，大概 10 个重点领域，都需要进行准确的人才培养。比如装备制造关键技术、信息化落地等；比如尽管早就设置了软件技术、软件工程等，但目前在装备制造的国产工业行业里，3D 数字软件的国外产品占有率 90% 以上。为什么我很少讲工业 4.0？因为那是德国的发展路径，如果朝这个方向走，永远在他们的后面追赶，所以首先要确定中国的工业标准和战略，然后走另外一条路。

最关键的是涉及数字化虚拟仿真与实验技术的部分，这和产业创新、科学技术紧密相关。以武器装备行业为例，以前有武器修造专业，曾经也有取消这个专业的声音，但我认为不能取消，哪怕只招很少的量，因为这涉及陆军装备枪械轻武器的制造和修复。这类领域，单一技能的人才迅速在减少，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需求在增加，这项变化很重要的特质是并非人数减少，而是岗位的变化，但我们对行业人才需求往往是关注专业需要多少人就培养多少人。现在国家很关心就业，对青年人缓就业、迟就业零容忍，就业问题是岗位变化的问题，是老的岗位能不能守住。在我们持续近 10 年的调研中，有两个 30% 没有改变，指整体毕业生到入职岗位半年以后流失率大体上是 30%，留下的人在三年后成为技术骨干或者技能骨干过程中，又流失 30%。这些领域过去产教人才供给不足、结构比例不足的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在新的一轮产业革命中，这种需求

在拉大。

最要紧的不是职业教育，而是教师。产教融合教育大家讲的都很好，但我们培养出来的老师，包括部里师资计划作为重点培养的老师，他们和企业、行业的对话不在一个体系上，这是我深刻的印象。很多老师不敢下企业，不敢跟师傅交流，因为不在一个语言体系上。

首先是人才有无的问题。从 2011 年到现在，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产业的比重由 37% 降到 27%。与此同时，职业教育里制造业现在不到 20%，2019 年统计表明企业制造类不到 15%。中央规划这么好的战略目标，谁来干制造？这是我们职业教育适应性最应该回答的问题。第二是规模合理化的问题。第三是结构即比例的问题。第四是质量，特别支撑的能力结构。这里面隐含着对职业教育的意义。第一是挑战，是否愿意真正去认识产业变革，而不仅仅是讲概念。第二是有没有责任使命，是指向还真的是去做？第三是深刻的适应性本身，从文化层面讲是价值导向，是向政府领导负责还是向人民负责还是向学习者负责。

在这方面有两件事我愿意推动。第一件事是动员组织行业企业建立爱制造奖学金，奖励三种人。一是愿意学习制造的学生，其中大部分是来自三、四线城市底层和中西部农村的孩子们，对应他们奖励奖学金。二是奖励这些孩子们的高中班主任，因为孩子报专业时班主任起到很大影响。三是奖励学生的母亲。这个想法我已经筹划了三年，会一直坚持下去，能做多少做多少，要让这些孩子们和社会知道，还有一些人关心他们，希望他们献身制造业。

第三个观点，产教融合是适应性的战略支点。简单来讲，教育工作会议讲了体系，大量研究的支点都在职业教育，基本上是在教育体系自身研究体系，那就不如基于行业进行研究。支撑职业教育体系的还有若干体系，其中产业或者服务作为社会支撑体系不能丢更不能回避，前面讲的职业教育增强包容性也包含在这里。关于动力来源，其实最大的动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需求驱动、价值导向的商品交换，要看是不是满足这个需求。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有着紧密的关系，甚至是一个体系内的关系。但产教融合互为辩证关系，不能完全等同，各有各的重点。产教融合责任主体是教育、人社和工信、国资委等部门，特别是产业部门和行业之间的责任关系。他们不构建这个环境，很多院校就不能进行工作，因为不存在支撑环境，教育就无法管理这些问题。校企合作责任制的主体是学校和企业，但是学校和企业合作的好坏依赖于产教融合的生态。从服务领域来讲，国家产教融合应该更加关注国家战略目标、国家产业政策、行业发展技术以及产业链价值链，包括校企合作的区域优势企业、区域产业集群、区

域企业文化与品牌, 这样才可能构成良好的生态。这个生态很复杂, 因为适应性本身就是系统性的, 命运共同体也好, 生态也好, 核心就是紧、实、优、特、精、久, 围绕产教关系, 增强适应性。

因此, 要构建命运共同体, 夯实职业教育基础支撑。职业教育发展创新很重要, 要加强来自职业教育体系内的治理, 更好地发挥政府的指导作用, 更好地发挥市场的作用, 才能真正调动起企业主体的积极性。除了行业支撑系统和构建生态以外, 增加适应性也需要环境支持, 比如政策供给、政策落地的问题, 包括规避风险的问题。根本来讲还是要讲求科学精神, 特别要加强决策前的决策预演。要丰富职教文化内涵, 不能说职教没有文化, 职教的内涵是很丰富的。最后, 要以史为鉴, 开创未来, 我想也是本次论坛的目的所在。

从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 看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关注第五届太和文明论坛,本届教育文化分论坛聚焦职业教育,主题为职业教育如何“增强适应性”。在今年3月中国两会和4月全国职业教育大会上以及“十四五”规划中均提及职业教育“增强适应性”的问题。本次论坛选择这个议题我认为正逢其时:其一,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世界遇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百年未有之大疫情,世界和平发展安全风险在增加,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不断显现。其二,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大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叉的历史节点,中国也同样面对各种全球性问题:新冠肺炎疫情、地区冲突、气候变化、生态保护、数字鸿沟等。其三,中国正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征程,教育的整体改革与发展必须与之相适应。在这一充满变革的时代,包括职业教育在内的各类教育不可能独善其身,职业教育如何适应当下与未来;如何适应内循环与内外循环?这将是今后一段时期需要关切与回答的问题。

如何增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既包涵“老生常谈”的基础性、本质性问题,也蕴含着先导性、前瞻性即改革和发展问题。

第一,关于职业教育基础性、本质性问题:一是职业教育要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二是职业教育要适应人的全面发展。两者都涉及职业教育主动适应和相互适应的方方面面。过去多年里,教育理论界、实践者对此都有很多探讨和论证。自2019年至今,中国政府亦对此相关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政策、措施。比如关于“立德树人”“产教融合”“三教”改革等等。但如何将两者从内涵与外延有机结合起来,形成良性相互“适应”,还需要很长时间的磨合。



刘京辉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
秘书长(2008-2017)
中国驻德国使馆公使衔参赞
(2001-2008)
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
秘书长、副所长
(1990-2001)

第二,关于未来职业教育改革发展适应性问题,应该将上述“被动适应”更多向主动适应转变,跳出狭义的职业教育圈,不能只是教育界、特别是职教界本身就职教论职教。未来职业教育培养的“职教人”(无论是中职、高职还是本科培养对象),在就业后不仅能被动参与生产过程、完成既定生产任务,更重要的是,在培养过程就能够让学生有能力主动参与未来企业(部门、单位)的发展谋划,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当家作主人”。为达到这一目的,今后在规划、谋划、设计职业教育制度全过程时,都应请相应的经济界、企业界人士深度参与,达到真正意义上的“适应导向”。

第三,中国正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征程。与之相适应,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中国也正在进行新一轮的产业调整和布局。比如针对中国政府提出的乡村振兴计划,在职业教育如何适应问题上,我从另一个角度提出“逆适应”的观点。也就是说,未来国家对经济、产业发展和布局也应主动考虑如何更好适应职业教育发展以及对这类人才的需求,有些工业、产业、研发部门就有可能主动布局在中西部的中小城市或乡村,以此拉动乡村振兴并留住人才。

第四,关于中国职业教育如何适应“内外循环”。首先,从政府层面应将中外职业教育合作纳入整体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的顶层设计与谋划中;其次,应将中外职业教育合作纳入中国整体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中;最后,对不同国家和地区采取差异化合作措施。

面对职业教育发达国家和地区继续实施“请进来”政策,深入解析“吃透”其好的经验与做法,并将这些规律性经验及时融入和“固化”于我国职业教育体系改革与构建中。比如,对于中国职教界耳熟能详的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以及“双元制”大学在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过程中,如何适应当前和未来社会结构性变迁和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经验;特别是德国在教育改革中将“融通机制(Durchlässigkeit)”贯穿于整个教育体系中,“通过资格框架等能力量度工具,实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和学术教育之间统一的能力认可与换算逻辑”;再比如,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职业资格制度与“微证书”的实施与实践等。

面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应该将“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请进来”重点通过论坛、学术会议、实地交流等形式,共同探讨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职业教育的作用与助力,分享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成功经验;“请进来”还包括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养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深谙中国文化、精通专业的职业教育师资队伍。

过去几年,我国以援外和“企业走出去”为目的,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了不同类型和层次的技能、技术型人才培养;我国一些高职院校分别在泰国、非洲等国家尝试建立了若干“鲁班工作坊”或在当地开展合作办学。但总体而言,合作与人才培养还未形成规模和长期效应,未成为国家层面的总体设计。建议借鉴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与做法,将其纳入国家总体援外计划,做好总体谋划和顶层设计。

五年制高职： 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江苏实践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教育总体目标，并提出了“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重点要求。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核心要义在于凸显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供给侧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侧的适应能力。

全国职教大会后，国家进一步明确了“支持在培养周期长、技能要求高的专业领域实施长学制培养”的政策。作为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年制高职承担着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任务。回顾江苏五年制高职的办学历程，实际上也正是沿着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这条逻辑主线不断先行先试、砥砺前行，走出一条具有鲜明适应性特征的发展道路。



刘克勇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
党委副书记、院长

一、适应教育普及化进程中结构优化的迫切需求

1. 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中优化结构的必然需求

美国学者马丁·特罗将高等教育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精英教育阶段、大众化阶段和普及化阶段。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理论实质上是一种揭示变化的理论，其最大的作用在于“预警功能”，即警醒人们：当高等教育的“量”达到一定规模时，整个高等教育系统都将面临巨大的挑战与要求。

尽管我国当前在规模上已经步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但还未能形成支撑普及化的体系和结构。由于在规模扩张之前缺乏对高等教育体系和结构进行整体的规划设计，在大众化和普及化进程中随之而来的便是高等教育的结构与质量问题。当前正处于普及化初级阶段，高等教育制度基本沿袭大众化阶段的组织和结构框架，不同类型、不同层次教育的资源配置尚未均衡、平等。

这一矛盾直接体现在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上:在劳动力市场中,“招工难”与“就业难”两种现象同时存在。尤其各类技术技能人才的求人倍率均大于1,技术员、工程师、高级工程师、高技能人才分别为2.18、2.17、2.12、2.1。因此,教育资源的供给绝不仅仅是规模数量的扩大,更为重要的是教育类型、教育层次和结构的适应性供给。

2.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层次结构亟待优化

我国已经形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从层次上而言,也初步建立了包含初职、中职、高职、职教本科的职业教育体系框架。但是目前这一体系并不稳固,尤其层次结构不尽合理。事实上,中等职业学校在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占比持续下降,目前仅占40%左右。本科层次职业教育雷声大雨点小,规模太小,尤其是以中职毕业生为招生对象的职教本科更少,在办学定位、设置标准、教学标准等方面的政策支持体系缺失。

成熟的职业教育应当自成体系,后一层次职业教育应该建立在前一层次的基础之上,即高职的招生对象应是中职毕业生,职教本科的招生对象应是中职、高职专科毕业生。目前我国仍然是中考后成绩差的学生上中职、高考后成绩差的学生上高职,事实上职业教育成为普通教育的“等外品”,这一现实造成不同层次职业教育之间没有传承,而是割裂的。五年制高职的最大优势就是以技术技能成长为主线,实现不同层次天然衔接,充分体现职业教育类型特征。

二、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人力资源支撑的现实需求

1. 适应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

评价五年制高职是否适应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发展需求,最终还是要落脚在五年制高职对区域经济产业发展的贡献度上来。五年制高职最大优势是面向区域输送“留得住”“用得好”的人才。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通过五年的长学制培养,学生可以形成较高的专业认同和身份认同,从而进一步验证了五年制高职在应对区域经济转型升级方面较强的适应性能力。

五年制高职毕业生个体素质优势明显,江苏中职代表团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所获奖牌80%来自我院学生,学院累计获得国赛一等奖915个,支撑江苏在全国职业院校中职组技能大赛中获得“十二连冠”,组队参加全省高职院校技能大赛持续位居第一;每年学院毕业生高级

工获取率在 80% 以上、就业率在 95% 以上、对口就业率 (65%) 明显高于高中后三年制高职、初次就业平均月薪普遍高于同层次学历人群,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总体满意率达 90% 左右。调查显示,80% 以上学生基础扎实全面、社会责任感强、身心健康活泼、品行优良端正,职业能力强、综合素质高,人才培养质量受到了社会广泛认同。

2. 适应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的需要

五年制高职还体现出显著的社会效益。五年制高职改变了传统意义具有阶层优势的高等教育受众群体,特别是对农村学生敞开怀抱,体现出职业教育的公共性、包容性和全纳性。接受职业教育对个人而言是习得技能、获得薪酬回报;对社会而言可以降低教育公共支出的边际成本,扩大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供给数量,提高劳动力受教育年限,从而提升社会就业质量。研究表明五年制高职生源中,家庭经济相对贫困的学生群体占有较高比例。五年制高职以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己任,对于提升劳动者素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具有不可替代作用,在促进共同富裕中具有重要意义。

五年制高职在乡村振兴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普通高等教育毕业生相比,五年制高职毕业生就业多以本地为主,充分彰显了五年制高职办学对于本地人才需求的支撑作用。学院已为江苏县区及以下地方培养毕业生约 30 万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75% 左右;近五年,每年招收的新生中,县区及以下生源占 80% 以上,其中农村生源占 70% 以上。学院毕业生每年生源地就业率在 85% 以上,回乡村服务就业比例在 65% 以上,服务中小企业比例在 80% 以上,几乎是唯一“留在本地,建设家乡”的人群。五年制高职教育已成为全日制高等教育通向县区 and 农村的主渠道、主力军。

3. 适应“校企命运共同体”发展的需要

“校企命运共同体”除合作利益以外,同时更加强调文化和情感因素的稳定作用。五年制高职作为一种长学制的职业教育办学模式,与中职和高中后高职在校企合作方面的比较优势明显,能够天然地与合作企业建立更加长久、稳固的合作关系,从而形成义利统一、情理交融、开放包容的校企利益共同体、校企情感共同体以及校企文化共同体,进而强有力地推动校企协作育人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五年制高职实施的现代学徒制做到了“四个融合”:一是牢牢把握“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功能定位,加强专业与当地企业重点项目的对接,实现“区域融合”;二是充

分利用教育与产业两个领域政策优势构建协作平台,实现“平台融合”;三是发挥“大师引领、一徒多师”的新型师徒关系优势,实现“教学融合”;四是在长学制内由未成年人向成年人过渡,共育合格学生、合格学徒,实现“目标融合”。

三、适应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成长规律的内在需求

1. 构建“思想引领、素养本位、过程评价”的立德树人落实机制

一是创新五年一贯长周期思政教育模式,把握五年制高职学生跨越未成年人和成年人两个阶段的基本特征,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途径,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二是扎实推进“养成教育”,做到“六个一”,即帮助学生制定一份个性化成长方案,养成一系列良好行为习惯,培养一个良好的爱好,参加一次校级以上竞赛,参加一类志愿服务或创新创业活动,树立一个养成教育品牌。利用五年制高职教育学习时间周期长的优势,促进学生职业意识的形成、职业能力的培养和职业素质的养成,使学生在具备基本职业素质的同时,掌握专业领域高新技术知识和能力。三是开展五年制高职学生发展质量综合素质养成与评价。从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等方面入手,制定《学生发展质量综合评价实施方案》,完善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人才培养体系。

2. 建立“定位准确、导向鲜明、结构完整”的教学标准体系

针对五年制高职人才培养普遍套用三年制高职,没有彰显长学制优势和服务地方特色,学院以长周期技术技能成长规律为主线,集聚多方力量,从省(院)、校两个层面,持续推进教学标准建设。第一轮,建立专业目录、人才培养方案等基础性教学标准,实现五年制高职教学标准从无到有的突破;第二轮,优化标准框架、突出标准的实践属性,实现教学标准与长学制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匹配;第三轮,丰富标准内涵、健全标准类型,强化标准落实,实现教学标准覆盖五年制高职教育全过程、全领域。

3. 构建“五年贯通、循序渐进、通专融合”的一体化课程体系

针对五年制高职课程体系存在中、高职拼接现象,学院依据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成长的默会性与渐进性特征,设计出“基础+平台+专项+拓展”的一体化课程体系。基础模块为全省五

年制高职学生通识课程，贯穿五年培养全周期；平台模块为专业服务领域主要技术技能岗位通用理论和技能；专项模块对接职业能力标准和岗位专项能力要求；拓展模块服务专业相关产业多层次人才需求和学生个性化发展。一体化课程体系切合素质养成、知识获得、技能习得、创造力提升的累积效应与年龄效应，培养出大批“留得住、用得上”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4. 健全“统一规范、全程采集、定向反馈”的质量监控机制

针对教学质量标准不能有效落实、质量监控不全面、反馈调控失真等现象，学院以全面质量管理理论为指导，建立五年制高职质量指标体系、管理制度及工作流程，应用信息化平台适时采集学校治理服务保障、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师发展、学生成长等方面的状态数据，按数据分析与实际调研相结合、坚持标准与注重特色相结合、学院定向督导与学校自我诊改相结合的原则，控制与评估影响人才培养质量主要因素及关键环节，通过正确的督导方向，引导五年制高职办学单位持续强化人才培养工作质量保证主体的责任。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 新政策与新措施

首先介绍一些政策。今年4月召开的职教大会尤其不寻常，与会人士也不限于职业教育系统，而是各个部委都有参与，虽然规模不大，但意义重大。习近平主席的重要指示释放了信号：一是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建设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和专业。继2014年首次提出构建现代职教体系后，今年在这样一个重大会议上更加明确了这一体系的建设思路。二是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加大对职业教育的重视，包括制度创新、政策供给和经费投入。

早期我们认为职业教育的问题是缺钱，但现在发现面临的挑战可能是各个地区的职业教育发展不平衡。因此，需要梳理我们到底需要哪些制度创新？需要哪些政策供给？李克强总理强调未来职业教育改革是重中之重的任务，特别是中高本一体化建设。而这个一体化建设已经界定了一个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立交桥的构建，所以职业教育未来不是单线的，要兼顾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终身教育和非学历教育。这是我们未来的真正挑战和重中之重的任务。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涉及职业教育的内容很多。其中有一个重点是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四要素协同的现代产业体系，这已经不是传统概念的一产、二产、三产。纲要提到的制造强国、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未来职业教育的发展应该对标这种经济发展状态。

纲要中关于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问题，也涉及增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再一次强调了职业技能教育的类型特色。要深化职普融通，实现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双向互认和纵向流动，这是未来的远景，目前我们还有很



孙诚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多路要走。高等教育方面，毛入学率要达到 60%，这是由大众化向普及化迈进，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型，整个中国的产业或者经济形态的变化都应更关注职业教育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纲要中“教育提质扩容工程”也包括职业教育，2019 年的“职教 20 条”里评选出了 197 个双高学校，在“十四五”期间还要继续支持 200 所以上高水平学校和 600 个以上的专业群建设，对中职的要求虽然没有具体数字，但提出支持建设一批优秀的中职学校，向双高学校的标准和内容靠近。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储能等重点领域，布局建设一批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和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建设 100 个高水平、专业化、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这些基地能不能实现共享，也是扩容工程的一个重点问题。

2019 年 12 月，一批“双高”学校被评选出来。2022 年，希望被评选出的“双高”学校能在创新发展中形成一批支撑职业教育质量发展的标准。到 2035 年，希望无论是政策、制度还是标准都真正能日益完善，成为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这是我们的远景。

关于“双高”学校的绩效考核，教育部门和财政部门都有相关的评价体系，这两个标准之间如何构建，是什么关系，也需要我们研究。财政部门制定绩效考核时的视角，关注的是产出、效益和满意度，产出里关注数量、质量、进度。而评估满意度的群体也非常多元，如果我们不构建第三方评估，如何获取更科学准确的数据？需要进一步去探索。

根据“十四五”规划出台了《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标准（试行）》和《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很多高职院校都在积极筹备，朝着这个目标走。要按着这一设置标准发展，不是为了升格而升格，一定要内涵式发展。这是一个引领的通知，都是在今年发布的。

最后特别要思考的是，各部门不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而应该更好去思考中高本一体化设计人才培养的方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 年）》是历史上第一个包含中职、高职和职业本科全部层次的专业目录。既然同时发布，就要思考如何系统地服务国家战略，更好地承担历史使命，来制定更科学、更好的人才培养方案。其后公示共设置 19 大专业类、97 个专业类、1349 个专业，把这 19 大类进行对标，比如交通运输大类在中职专业里所占的比重是 10.8%，本科是 8.5%。我们希望对相关领域中高本的基本判断和基本的人才培养标准以及企业岗位对中高本的需求，有所了解、有所诠释。专业目录新增的部分，中职新增点只有 7.8%，高职是 9.9%，本科是 67.6%。如果想升本，能不能把这一点回答清楚？需要通过一体化的构建，把这些专业和未来

能力标准说清楚。

我们已经进入了数字化、智能制造的时代。欧盟最近发布了《数字教育行动计划（2021-2027）》，他们也感受到数字技术在以惊人的速度不断改变世界，他们在努力帮助他们的公民更好地应对数字转型，这是当前教育领域的关键任务。

总而言之，我们的启示是：面向未来，真正构建高质量或具有包容性的数字教育，将成为我国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大助力，也将构成我国提升教育国际竞争力以及加强国际之间、我国与不同国家之间、我国各地区之间关系的重要途径和方法。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我们国家的数字教育能为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甚至人力资源强国目标的实现贡献更多力量。

增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

有关职业教育适应性的讨论首先涉及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职业教育如何适应学习者的实际情况；二是职业教育如何适应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一些社会现象或数据可以引发我们很多思考。比如，现在我国每年有大约 1000 万大学毕业生需要就业，80% 的学生觉得找工作难，存在焦虑情绪，但是国家同时又缺乏大量技术技能人才。李克强总理在讲话中提到，到 2025 年，我国技能型人才缺口将会达到 3000 万，即存在严重的技能错配现象。另一方面，职业教育并不被社会大众所接纳，接受职业教育始终是家长和学生无奈的、最后的选择。

近些年，我国在促进职业教育发展创新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报告，中国政府在促进创新能力发展方面有些指数已经名列全球前茅，但是职业教育的竞争力排名始终不高，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我国促进创新发展的宏观政策得到普遍认可；二是由于我国职业教育规模已经是全球第一，职业教育竞争力不高的原因不是量的问题，更多是质的问题，即职业教育还没有完全适应国家发展的现实需要。

当今世界，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斯曾经说过：“工业革命，与其说是技术革命，还不如说是一场制度革命”。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涉及很多领域，包括产业结构、人的职业发展、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教与学。如果没有相应的变革，职业教育就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国务院《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在启动“1+X”技能等级证书试点工作时，明确提出要关注“反映职业活动和个人职业生涯发展所需要的综合能力”的培养。什么是综合能力？世界技能大赛题目可以较好地反映综合能力的特点。世赛题目一般会提前六个月公开，



赵志群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国家职业教育咨询
指导委员会委员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但真正在比赛现场的具体内容和要求会有 30% 左右的变化,有的赛项还有神秘模块或未知设备。这不但对参赛选手的专业知识、技能和技巧提出了很高要求,而且要求选手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这里体现的是人文主义的技术观,即将社会价值融入到技术的设计和使用过程中。

按照我们研究开发的 COMET 综合职业能力测评方案,综合职业能力分为不同的发展级别,最低级别的能力是功能性能力,即满足工作岗位基本的功能性要求,主要是操作技能和基本知识。第二个级别是过程性能力,即考虑经济性和成本控制、提高工作的使用价值,并了解企业的生产流程和工作过程。最高级别的职业能力是整体化的设计能力,即满足创新性、社会责任感和环境保护等全面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COMET 职业能力测评的国际比较研究发现,与瑞士同类学校相比,我国高职院校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还是有一定差距。我国学生的专业知识、技能水平与瑞士学生相比并不弱,但是他们的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感发展明显处于劣势,且不同地区、不同层次学生有着同样的能力发展特点(能力轮廓)。这说明,与瑞士的职业教育相比,我们存在着系统性的偏差或结构性缺陷,即学科模式仍然是我国教育教育的主流课程模式。学科课程在职业教育的最大问题是,学科逻辑和工作世界的逻辑不同,学生无法藉此去整体化地认识工作世界。况且,职业院校的学生不习惯、也不善于进行抽象的理论知识学习。

教育部职业与成人教育司陈子季司长曾经说过一句话:“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最大的区别在于,普通教育是先理论后实践,职业教育是先实践后理论”。这也恰当地反映了我国职业教育教学和德国的不同。迄今为止,我国职业教育的主流教学模式仍然是先学文化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然后再学专业课,而德国一开始就学习简单的专业课,文化课则伴随着整个学习过程。他们认为,“职业基础课”是文化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培养学生“职业”或者“工作”的认知能力,这与我们通常关注的“数理认知能力”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德国著名教育家凯兴斯泰纳曾经讲过:“职业教育是人类教育的入口”,“最理想的教育机构非职业学校莫属”。德国另一位教育家斯普朗格也认为:“职业是文化和教育的媒介”,“职业是通往更高一级普通教育的唯一路径”,这种理念可能是德国建立强大职业教育的基石。但是,职业教育的育人作用在我国却常常被忽略。北京师范大学年轻学者刘云波曾经利用 PISA 数据做过一个研究,并发现:职业教育学生的非认知能力显著高于同年级的普通教育学生!非认知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个人综合素养的高低。这说明,职业教育并不是二流的教育,同样可以有效促进青少年综合素养的提高,并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发展前途。这里的关键是,如何为职业院校

学生提供适合他们自身特点的学习方式，即少一点理论，多一点实践，按照职业能力发展逻辑，而不是学科逻辑开展教学。

大家认为，职业教育是与经济发展结合得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人类社会从产业发展经历了工业 1.0、2.0、3.0 和 4.0 阶段，职业教育课程也经历了相应的发展阶段，即从课程 1.0 到 4.0。中国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大部分企业处在工业 2.0 向 3.0 的过渡阶段，极少数企业可能在 3.0 或者探索 4.0 的阶段。职业教育也应当适应这一现状，既可以提供针对 2.0 泰勒式岗位技能培训的课程，也可以提供适合工业 3.0 阶段的综合职业能力培养的一体化、综合性课程。针对工业 4.0 的课程尚处于探索阶段，我们并不完全了解。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必须树立数字化学习的新理念。目前我们数字化教学资源设计的基本指导思想还停留在 Web1.0，主要关注信息技术知识传递功能，如讲解新知识，或通过呈现复杂操作过程激励学习，或降低学习难度等。课程 4.0 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不倡导仅用于展示“事实性知识”的教学软件，而更关注如何设计开放性的综合化学习系统，为学生和教师提供在教与学的过程中自我建构知识的机会和空间，强调更有效的人机对话和人机互动。这需要我们对技术进行更全面的理解，即技术不仅仅是客观事实和操作工具，而是技术的可能性和社会愿望的统一，应关注社会的期许和普遍的愿望，满足社会、文化传统、价值观和法律法规等多方面的要求。

总的来说，职业教育要适应现代技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要求，就要努力促进学习者发展“综合职业能力”，即个体当前就业和终身发展所需的能力。未来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设计导向”，所培养的学生不是简单而被动地适应技术发展的要求，而是要积极参与设计未来社会和技术发展，并发展出独立、自信和负责任的人格。

气候变化对未来工作发展趋势的影响及青年行动力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太和文明论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佟洁琼，是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兼海外科研拓展专员。我们是设在高校的气候政策智库。在业余时间，我时刻关注影响力活动，我也在名为“全球解决方案节”的公益创客马拉松项目里担任组织者。该项目是为期两天的创客马拉松，聚焦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第一届公益创客马拉松于2016年在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启动。此外，我还是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杰出青年北京社区成员，倡导应对气候变化。

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背景信息，可持续发展目标是由联合国提出、发起并组织制定的。其中有几个关键数字，分别为“2030”“17”“3”“169”。

“2030”是指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收官之年，联合国框架下的所有成员国希望在2030年之前完成17个目标。这17个目标包括的主要议程有：消除饥饿、消除贫困、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其下分为169个具体目标，作为各国政府评估目标实现情况的标准。这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主要包含三个方面：“E”代表环境，“S”代表社会，“G”代表政府治理。第13个目标是气候行动，其与其他目标紧密相联，涉及性别平等、生物多样性、能源、陆地生命以及水下生命。



佟洁琼

清华大学气候变化
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
海外科研拓展专员

气候变化包括全球变暖和极端天气事件，这些均由工业革命以来化石燃料燃烧和森林砍伐等人类活动造成。此类活动会产生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从而导致全球温度自工业革命以来升高了1度至3度，这一数据来自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新评估报告。这次工业革命导致的升温就像给地球裹了一层毯子。睡觉时不盖毯子可能会受凉，但如果毯子太厚，也会让人难以入眠。因此，我们的目标是将全球升温幅度限制在1.5度或2度以内，以此避免气候变化。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中国的光伏装机量居世界第一，中国还承诺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气候变化对未来工作有何影响？其实，对每个人而言都存在三个关键点，分别是政府、个人所在的机构以及个人本身。政府会极力推行目标高远的气候政策，从而直接影响国家的碳排放轨迹。比如，欧盟推出了碳边境调节税，根据企业排放量而非企业利润进行征税。如此一来，个人所在的机构就必须制定相关减排措施，在适应政策变化的同时，满足普通消费者的需求。

我认为，在政策制定和气候行动方面，青年一代将发挥重要作用。从消费习惯到饮食方式、出行方式，微小的个体行为可以影响全球气候。应对气候变化，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浅谈未来办公方式及中国互联网科技对创业者的影响

我叫郎伟，来自德国。我在德国初入职场，后来去了美国。我第一次创业是在德国，四年半前我来到中国（大陆）。我是一名创业导师兼领导力培训师，热衷举办创业比赛和影响力竞赛，比如黑客马拉松和创意马拉松。

作为一名企业家，中国最吸引我的一点是这里人才济济且机遇很多。挑战通常意味着不确定性，这是每个企业家都会面临的问题。但是作为一个身处中国的外国人，我的中文水平算不上惊艳，因此语言障碍是我需要额外克服的。此外，我热衷学习中国人际交往文化，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我理解的中国创业文化和创业经验很大程度上就是如此。在中国，人们压力大，面临的竞争异常激烈，因此需要不断地更迭知识、转变理念、接纳变化和发展自我。

2015 年我搬去了香港，然后 2016 年来到北京。到北京后，我先后举办了一百多场与创业有关的活动，有幸与多家初创企业合作。我密切合作的初创企业达 20 到 30 家之多，合作身份包括全职员工、顾问、导师、培训师。在此期间，我获益匪浅，因为每个团队在不同市场阶段和市场领域所面临的挑战也不尽相同。这是我人生最大的收获之一。我们正在举办的活动包括创业磨坊系列活动。我们邀请创始人、企业家分享他们的创业之路、他们的创意马拉松和黑客马拉松之旅；邀请开拓进取的年轻人们接受企业挑战或社会挑战、环境挑战。参赛者们要在短时间内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案，然后我们会邀请最佳团队加入“天使黑客加速器”。我曾有幸带领多个团队从中国到旧金山，参与初创企业加速器计划。

在美国和欧洲，有很多公司在疫情发生前就已采用远程办公模式，即“随时随地工作”，但是这种工作方式尚未在中国流行开来。大家还是需要集中到办公室上班，从早上 9 点一直到晚上 10 点或 11 点，有时一周甚至需要工作 6



Jonas Wolf

领导道创始人

天。相比之下，在初创企业，虽然每个人都面临巨大压力，但企业对员工的最低期望是保证把工作完成，而不是在办公室磨时间。这就是很大的区别。我相信，一旦人们从远程办公的方式中获益，比如有更多时间用于个人爱好、旅行或陪家人，人们就会很快采用并爱上这种方式。如果人们可以不用每天坐班，就可以选择住在郊区，离大自然更近。孩子们可以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成长方式，也可以和家人一起在山村住一个月。我们完全可以这样做，尤其是在中国，网速很快，几乎任何地方都有 4G 和 5G 网络覆盖。

有人问我东跑西颠的目的何在。我回答说，我只是在不同的地方工作而已。随着中国企业日益国际化，它们在将来也会进一步采取远程办公的方式，以降低成本。比如，随着公司的发展，公司可能需要在旧金山、纽约、巴黎或任何其他地方租一大间办公室，这一成本虽然很高，但是现在有了共享办公场所，可以按需租赁，更具灵活性，只需租用一个小空间。平时员工在家办公，只在团建或开会时大家聚在一起。所以我认为这是中国企业降低“走出去”的成本和风险的一大机遇。我希望我也能为此做出贡献，以某种方式参与其中。

我认为世界各地的企业家也好，个人也好，都应该亲自来中国看看、感受一下。首先，人们对中国有太多刻板印象，这是不对的。他们应该来亲自感受一下，中国和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所扮演的角色都越来越重要。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中国科技发展迅猛。所以，世界各地的企业家到中国来感受一下这里的应用软件和互联网生态系统将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很多人打趣说世界上有两种互联网生态系统：中国互联网生态系统和非中国的互联网生态系统。其实现在有很多国际企业家都在抄袭中国的超级应用，比如美团。如果你去东南亚、非洲或拉丁美洲，会发现他们正在开发的应用软件，很多都是抄袭中国的超级应用，而不是西方国家的类似应用。因为西方国家的应用在范围和功能上有很多局限性。这也侧面反映了我刚才说的第一点，即中国的重要性。中国科技正在迅速发展，不来中国会错过很多，不只是机遇，更是学习和成长。

需要提及的最后一点是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人们应该相互理解。中国毫无疑问是世界人口大国，如果人们不了解中国及其各地的情况，包括像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大都市以及中国其他地方，那么人们就很难完整地了解世界的情况。我认为为了世界长期和平，让世界各地的人们了解中国非常重要。了解中国的机会会有很多，互联网、社交媒体以及全球通信都助力人们开展协作。

为应对疫情,各种远程协作工具相继出现。当然,疫情出现之前也有类似工具。尤其是现在,所有工具都尽在我们掌握。我们能够组织几万人规模的在线会议,让所有人都可以参加会议。以前很多会议是凭邀请函签到,也有人因负担不起机票而不能到场。这样一来,他们自然就被屏蔽在会议外。现在有了直播和在线远程参与方式,这为进一步协作奠定了基础。此外,远程工具也使年轻人更加了解或近距离感知人类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比如气候变化或与人们息息相关的其他问题。

首先,要来中国看看,这有时候会有点难,但克服这些困难很值得。第二,尽可能多地在当地结交朋友,这将有助于你真正了解中国。人们移居海外很容易陷入所谓的“同胞舒适圈”。第三,找一个导师,谁都可以,只要这个人所熟悉的领域是你想进入的,这个人所在的行业是适合你进入的。可是在当地生活更久的同龄人,也可以是比你更年长的人。我有幸结识了一些处于不同年龄段、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他们为我在中国生活提供了莫大帮助。第四,虽然学中文很难,但是让我受益匪浅。因为学习了语言就可以更好地了解当地人和当地文化。一定要有开放的心态,因为人们太容易有先入之见或刻板印象,敞开心扉接纳不同的文化真的很重要。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中国,我想不到其他可以让我在当前人生阶段收获如此之多的地方。我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我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领导者、企业家抓住这个机遇,来这里学习、创造、共创,让中国变得更美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国际关系分论坛 中美关系研讨会



陈虎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世界军事》杂志总编辑(2006-2019)
《中国军队》杂志主编(2009-2019)

处理中美关系不仅美国需要“护栏”，中国同样也需要“护栏”。中国需要的“护栏”是为了给美国画出底线，底线之内的“竞争”可以接受，跨越底线的行为则不能容忍。



陈征

太和智库研究员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
高等研究院讲师

随着中期选举的到来，中美之间可能改善关系的时间窗口日益缩小，中美关系可能将继续保持低位运行。



崔立如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2005-2013)

可以预见的是，只要华盛顿决策圈不转变对国际关系演变及中国和平崛起的主流观点，加之严重受制于2022年和2024年两次选举的政治需求，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调整很难走出目前的困境。当下中美关系的状况将是未来几年的常态。



郭长林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未来中美关系怎么走？我们确实不能抱什么幻想，但也并非全无希望。希望在于“民之交”，在于两国的经贸关系，在于作为中美关系桥梁的专家学者之间的交流。希望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让我们重新架起中美关系的桥梁。



Cliff Kupchan

美国欧亚集团主席

鉴于中美两国的国力远超其他国家，结盟等“外部平衡”措施是次要的，远不如“内部平衡”措施来得透明、可靠、可预测。两极格局将比多极化格局更加稳定，中美两国的注意力可以更多地聚焦在彼此身上，而非其他国家。



李成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
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及外交政
策项目资深研究员

中产阶级(层)是一股维护稳定的力量,通过人文交流增进中美中产阶级(层)之间的相互认知,有助于避免相互“妖魔化”,增强同理心,促进中美两国摒弃零和思维,尊重彼此的愿望和利益。



娄晓琪

文明杂志创始社长兼总编辑
首都文明工程基金会
创始人兼执行会长

在文明进程中,只有通过文明价值及文明话语的传播、交流与互鉴,即文明对话和文化交融才能达到人类社会的升华境界。



Stephen Orlins

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

造成中美分歧的许多问题都难以解决,敏感的政治问题更难触及。中美只有通过采取小的、具体的、实际的。有时甚至是单方面的步骤,才能够重建信任。正所谓: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钱峰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
研究部主任

“联盟制华”虽看似摆脱特朗普“单打独斗”的蛮横套路，符合所谓“政治正确”，也契合二战以来美国的传统外交理念，但现实操作中难题不少。美国“核心”地位不复当年，中国已远非“吴下阿蒙”。拜登以意识形态划线背离了当今时代大势，其组建安全联盟的做法也存在先天不足。



Susan Thornton

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
蔡中曾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

当前，中美在外交上应努力促成双方领导人会面，这有助于舒缓紧张局势，促进两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合作。中美应在应对疫情和气候变化方面加强合作，并努力避免科技竞争可能造成的负面外溢效应。相信中美领导人能够在两国关系和全球合作问题上做出正确的选择。



王文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执行院长
丝路学院副院长

中美不应像十八世纪、十九世纪那样主要通过军事手段开展竞争，中美竞争需要以更加文明和进步的方式进行。中美应该为解决全球发展困境而竞争，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而竞争，在推动全球科技创新方面竞争。总之，中美应该为了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而竞争。



王湘穗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中美现在都承认双方是一种竞争关系，但都不承认也不认为这种竞争是要彻底消灭对方的恶性竞争。谋求“竞争式的共存”是中美开展良性竞争的基础。为此，双方必须明确对方的非敌性定位，认同彼此的价值观和利益具有合理性，以建设性的方式开展竞争，并坚持非暴力的底线。



王在邦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攻中守的互动态势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因为霸权主义有其内在的生命逻辑和历史逻辑，只要称霸，就免不了破产衰落。



吴海龙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

中美关系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根源是美国在如何看待中国、判断中国上出了严重问题。中美关系要想改善，要想避免冲突和对抗，最根本的还在于美方要改变对中国的认知，要理性、客观、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的发展，看待中国的对美政策，重新审视中美关系的定位，重新评估中美的利益关系，重新调整美国的对华政策。



周波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
安全合作中心前主任

中美两国海军的对话是有益的，但成果并不显著。去年 10 月，中美国防部通过视频会讨论了危机管理的问题，这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中美两军在 2014、2015 和 2016 年举行了海上意外相遇联合演习，这种演习应该持续进行下去。



朱云汉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面对全球疫情，如果中美两国携手合作，形成全球共同行动，必将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同理，朝鲜问题、反恐问题，以及近期出现的阿富汗战后重建问题也是如此。但是，拜登的外交团队并未展露相关胆识与魄力。总之，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并不乐观。

国际关系分论坛 中欧关系研讨会



H.E. Ahcene Boukhelfa

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
(2016-2021)

当今世界需要中国作为国际社会中强有力的参与者，其能够加强国际关系应当遵行的价值观，并推动国际关系变得更加平衡，逐步实现多元化。



Sven Biscop

比利时埃格蒙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
“世界中的欧洲”项目主任
根特大学教授

中国和欧盟需要摒弃一些偏见和误解，不应将彼此视为竞争世界政治领袖的对手，并且要区分恶意故意的敌对以及因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出现的、不可避免的竞争。



H.E. Nicolas Chapuis

欧盟驻华代表团团长

欧盟是否反对中国崛起? 让我给你一个简短而直接的答案: 不, 恰恰相反, 因为中国的现代化和繁荣对全球增长至关重要。



丁一凡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如果今日的欧洲要像当年(清朝初年)的教皇一样, 要强力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时的中国社会治理模式, 中欧之间的交流一定会像当年一样陷入僵局。这种发展趋势无助于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文明交流, 无助于相互借鉴、获得更多的知识。



H.E. Wim Geerts

荷兰驻华大使

加强中欧关系的驱动力依旧强劲的。尽管面临挑战, 但中国和欧盟仍是世界舞台上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中欧合作关系对于双方的共同繁荣以及应对全球挑战也至关重要。



Alexander Kulitz

德国联邦议院议员
(2017-2021)

看未来中德或中欧关系，无论是在文化还是人文领域，我们都希望能达成更多的相互理解，进一步推动彼此间的关系发展。



Alexander Lukin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
东亚与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
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大学
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系主任
浙江大学求是讲座教授

为了让多极体系能够成为一个稳定的体系，必须使规则真正成为国际化的规则，也就是说，要建立必须让所有主要国际主体都能接受的规则。



李瑞宇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意大利共和国
特命全权大使兼驻圣马力诺共和国
特命全权大使 (2013-2019)

始终从战略角度把握中欧关系发展方向，积极推动中欧关系长期友好发展，妥善处理彼此矛盾分歧，共同应对世界面临的各种挑战，是当前摆在中欧面前的重要任务。



马克卿

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
常务副会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捷克共和国
特命全权大使(2014-2018)

中欧关系对双方、对世界都太重要了。双方应从中欧关系的历史发展中汲取有益的启示和教训，坚守初心，增进相互认知，始终从战略高度、以更宽广的视野运筹中欧关系，推动中欧关系行稳致远。



门镜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
研究院特聘教授

欧盟对中国的强硬政策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只是来自美国的压力。欧盟自身有着向美国靠拢的需求，对华施压符合欧美双方利益。



孙永福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中国商务部欧洲司司长
(2003-2015)

当前中欧双边关系处于建交以来的低谷，中欧投资协定批准程序也被搁置。但黑暗终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去年和今年逆势增长的双边经贸数据表明，务实合作基础牢固，合作共赢仍是双边关系的主流。



吴海龙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

中欧关系出现今天的局面，其主要根源是欧洲在对华政策上跟美国太紧了。中国没有把欧洲当对手，也不想让欧洲把中国当对手。这个世界不需要对手，更需要伙伴。中国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会是欧洲的合作伙伴。只要欧洲的对华政策对头了，中欧关系的路就会越走越宽广。



郑若麟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文汇报高级记者

跨国垄断和金融资本目前在欧盟占据着主导地位，其面临的主要矛盾不是中国，而是美国和欧洲内部的极右翼政治势力。

经济科技分论坛



丁一凡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碳减排任务要重得多,实现碳减排任务的时间也短得多。最近几年,中国在新能源和可持续发展模式推广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我们只有更快地推行绿色发展模式,才能在世界经济中抢占新的技术高地,实现高质量发展。



H.E. Awale Ali Kullane

索马里驻华大使

国际气候治理体系应加强,以有利于最不发达国家。最发达国家应该带头合作,为全球决策者、利益相关者、科学家和工程师提供交流平台。



黎维彬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国家开发银行原顾问
首席经济学家(2011-2013)

碳金融涉及面非常之广,包括投资、信贷、债券、租赁、保险、基金。我们要变被动为主动,通过有机组合来推进工作。



李俊峰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
国际合作中心首任主任
中国能源研究会常务理事

碳中和是大势所趋,不论是国家、地区、城市,还是企业,在全球碳中和的过程中都不愿意成为一个孤岛,只有直面挑战,才会赢得未来。



陆培丽

太和智库研究员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研究员
中国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特聘讲师

做中国自己的国际定价碳指数,降碳离不开数据,碳数据为水,碳算法为舟。碳交易市场让产业第一次站到了国际交易的大舞台,碳金融的普及必不可少。



H.E. Djauhari Oratmangun

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

在碳达峰、碳中和方面，中国和印尼不仅拥有共同的愿望，还拥有互补的潜力。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已在投资、建设、运营、技术、知识转让和人力资源开发等领域开展了全方位合作。在此基础上，两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仍有充分的合作空间。



潘本峰

河北先进环保产业创新中心副主任
生态环境物联网与大数据应用技术
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

我国需加强关于碳排放监测核算的基础课题研究，为实现“3060”目标提供坚实可靠的数据基础。



孙天印

清华大学绿色金融发展研究中心
副主任

碳中和目标设定是我国大国责任担当的体现，并满足了我国在未来世界经济格局中保持竞争力的需要。实现碳中和目标，机遇与挑战并存，需做到有序转型。



孙永福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中国商务部欧洲司司长
(2003-2015)

“双碳”目标意味着社会经济的系统性变革。中国虽在部分领域具有技术优势，但实现“双碳”目标的任务依旧十分艰巨，需要各行各业共同努力。



吴海龙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

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留给我们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的时间非常紧迫，容不得我们有半点儿懈怠和迟疑。我们必须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和坚定的信心和决心，以只争朝夕的精神，采取刻不容缓的行动，才能实现目标。

教育文化分论坛



陈李翔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
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
原党委书记

技术的变革使得社会成员获取知识的途径和机会变得越来越便捷，学校教育不再是社会成员获取知识的主要渠道。深度学习技术正在导致就业领域的变革，尤其是智慧型劳动工具与人类的智慧、人类的思维正在快速形成协同性伙伴关系，这是跨历史性的变革。



陈利文

湘潭市委副书记
湘潭市教育局原局长

增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是一个小切入点，却是一篇大文章。现在中国经济社会进入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增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是一个时代的要求。同时，以人民为中心来开发人力资源也是价值的体现。从教育治理体系、能力的现代化和构建新格局来看，也是一个重要的举措。



陈晓明

机械工业教育发展中心主任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教育培训部主任

服务数字化转型是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新战略起点，优化人才供给是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战略重点，产教融合是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战略支点。产教融合一定要往生态上构建，核心就是紧、实、优、特、精、久。



方焱

长江教育研究院研究员
华中师大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要通过对法律的细化与解释，合同各方权利义务的约定，尽量引导企业、社区、院校探索一些可持续性強、伙伴关系融洽、办学流程简化、办学方式灵活、权责分明的职业技术教育。



高鸿

辽宁教育研究院原副院长
辽宁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

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我们总是把四链里的教育链放在前面，实际上应该是产业链放在前面，产教融合是产在前教在后，从产业链或者产业集群里才能够推导出岗位链、岗位群，然后职业院校用专业群或者专业链、产业群来对接，最终才能实现教育链和产业链的深度融合。



高扬

天津城市职业学院副教授

教学质量评价的出发点,不是为了用于教师年终考核,而是构建基于教学全过程的闭环质量评价体系,通过及时反馈和改进,不断优化学生的学习环境,促进教学质量的持续提升。



郭延峰

北京市劲松职业高中校长

生产关系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有研究表明,相比于1978年,1984年我国的农业总产量增长超过了61%,而这其中有近一半的增长得益于家庭责任制的引入。所以,职业教育要想走好这一步,需要很多的专家学者从理论、政策、制度等方面去解决。



贺星岳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校长、教授

我认为提高职业教育适应性的切入点是老师,只有老师提高了自身的适应性,才能够保证专业、课程和教学内容的适应性,从而培养出能够适应社会的毕业生。



刘建同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
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职业教育适应性最核心的两个词，一个是结构，一个是功能。现在是一个一切需要跨界、一切需要集成的时代。职业教育既是生产力也是生产关系，从生产力的角度我们要适应科技和经济的变革，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我们要适应整个大的教育以及社会的变迁。



刘京辉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秘书长(2008-2017)
中国驻德国使馆公使衔参赞(2001-2008)
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秘书长、副所长
(1990-2001)

职业教育是教育初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肩负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任；职业教育是类型教育，具有其特点和特色，肩负着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特殊人才的责任；职业教育需要政府在未来制度设计上创造更适宜的环境，以促进职业教育更好的改革和发展；职业教育的发展必须立足当下，着眼未来，面向世界。



刘克勇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
党委副书记、院长

评价五年制高职是否适应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发展需求，最终还是要落脚在五年制高职对区域经济产业发展的贡献度上来。五年制高职最大优势是面向区域输送“留得住”“用得好”的人才。



刘一沛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理事长、院长

职业教育面临师资层面的挑战，所有的学校都面临这一挑战，民办学校尤甚。对于民办学校来讲，需要形成一个相对来说更加合理、更加科学的流动机制。



刘义国

中国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
教学教材室主任
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
教育学博士

高质量的教育体系一定是老师愿意积极参与的，老师不是旁观者，不是看客，老师能理解改革举措并结合实际转化到课程教学中。如果老师在专业教学中传递不出对职业岗位深层次的情感和追求，又如何能感动孩子，如何让孩子能够学会和热爱呢？



陆春阳

全国电子商务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常务副主任
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
职业伦理研究所所长

在校企合作中，既要发挥领先企业作用，也要更加关注中小企业的独特作用。



马燕生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中国驻法国使馆
教育处公使衔参赞(2013-2017)

国际化应用型人才培养必须依靠职业教育国际化水平的提升,而提升国际化水平必须依靠国际合作与交流作为主要渠道和支撑。对职业院校来说,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的根本目的,无论是出发点,还是落脚点,都是为了更好服务于国际化人才培养。



宋凯

有色金属工业人才中心副主任
全国有色金属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
员会秘书长

我们不能简单把职业教育作为教育来看待,它也是国际服务贸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目前来看,相对于本科和基础教育,我国职业教育在整个国际教育服务贸易中是最有竞争力的。



孙诚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面向未来,真正构建高质量或具有包容性的数字教育,将成为我国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大助力,也将构成我国提升教育国际竞争力以及加强国际之间、我国与不同国家之间、我国各地区之间关系的重要途径和方法。



唐以志

中国教育部职业技术研究所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编辑部主任

中国职业教育的基本形式或主要载体是职业学校教育。职业学校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具有基础性、系统性、全面性、长期性的特点和优势。但随着技术更新速度不断加快,生产方式、劳动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不断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结构改变,相对稳定的职业学校教育系统就出现了不适应,特别是人才培养的针对性、灵活性、适应性显得不足。为此,需要在制度设计上进行改革,“1+X”证书制度就是为增强人才培养适应性而设计的一种职业教育制度。



王春燕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职业教育需要从增加存量式教育转变为以增加增量式教育为载体、以激发流量式教育为目标的教育模式。具体来讲,就是以职业岗位为逻辑起点,根据产业发展变化中岗位或技术领域对不同层次和专门人才的需求定位职业面向。



杨钊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系主任、副教授

我觉得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有三个大目标,一是提高中国教育软实力,二是扩大国际朋友圈,三是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提供教育国际公共产品。



余有根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副秘书长

疫情让我们反思国际教育工作的内涵。职业教育的国际交流工作更加深入，更加务实。



赵志群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国家职业教育咨询指导委员会委员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未来现代化适应性的职业教育最大的一个特点是设计导向。培养的学生不是简单地适应技术的发展，他要参与设计未来的社会技术的发展，要发展独立、自信、负责任的人格。职业教育也是培养人，不是培养简单的操作工具。



周凤华

中国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研究所评估中心主任、副研究员

类型教育要撑起来、立起来、强起来，必须要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这个特点、特色。

青年对话分论坛



陈金洲

新一代数据协作平台
-黑帕云创始人

在科技的加持下,数字化抽象了物理世界的工作载体,让人的时间精力花在最需要的地方,去思考和验证。数字化工作强化了人们的大脑,但可能带来别的方面的挑战。其中最显而易见的可能是人们对于工作的满足感。不同于与物理世界的真实触碰,数字化越发展,人们越期望从线下获得有意义的、趋近人性的体验。



Dr. Kaddour Chelabi

苏门集团联合创始人

生活和工作就像头和尾。我每天都会反思是否对地球的未来做出了贡献。减少使用塑料制品,时刻牢记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回馈社会,并用实际行动带来改变。所做的一切对人类有益还是有害,都在转瞬之间。



韩冰

盈动资本合伙人

数字化是一个过程、一个趋势、一个重新定义未来工作的方法论。



佟洁琼

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
研究院海外科研拓展专员

未来的工作方式必须具有包容性,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对现有的劳动力进行二次培训,也需要考虑到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差异,激励世界各国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从长远的战略角度和短期目标出发,适应气候变化。



Marilyn Waite

《Sustainability at Work》作者

专业人员不仅要充分了解气候的方方面面,还必须具备将气候带来的影响量化的能力。换言之,董事会和高管团队对气候专业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



郑科骥

未来学家俱乐部
联合发起人

学习灵活使用数字化沟通协作工具将成为每个人的必备技能，
这意味着每个人能主动自由选择自己的办公方式。



郑正

独立设计师，
私人造型师，互联网人

设计需要创意，生活更需要创意。未来远程办公是一种高效
且同时兼顾工作与生活的样子。

媒体传播

受疫情影响,2021 太和文明论坛延续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论坛对外传播工作成为重中之重。太和国际交流中心着力运营智库新媒体平台自有账户,通过拉动海内外高权重媒体,通力打造论坛影响力。

前期预热阶段,本届论坛发布预热视频 66 个,宣传图片及海报 92 张,国内自有新媒体平台发文 28 篇,海外自有社交媒体平台发帖 51 篇。论坛期间及论坛后期,共发布视频 159 个,宣传图片 21 张,国内自有新媒体平台发文 27 篇,海外自有社交媒体平台发帖 18 篇,发布中英新闻通稿共计 18 篇。

根据不完全统计,2021 太和文明论坛宣传物料在新媒体平台自有账户的浏览量超 960 万、播放量超 95 万、点赞量近 2 万、评论数超 2000 条。有赖于太和国际交流中心与各媒体达成的长期友好合作关系,2021 太和文明论坛获得海内外媒体高度关注,每日经济新闻、人民网、凤凰网、中国网、香港中评社、封面新闻、CGTN、南华早报、大公网、明报、中国日报、中国教育新闻网、欧洲时报、东方卫视、塔斯社、今日俄罗斯电视台、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等多家知名媒体对本届论坛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全平台累计发稿近百篇。

其中,在国际关系分论坛中欧关系研讨会上,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吴海龙与欧盟驻华代表团团长郁白(H.E. Nicolas Chapuis)关于中欧关系的精彩辩论得到了观察者网、央视新闻、环球网、人民网、澎湃新闻、光明网等多家媒体机构的广泛报道和转载,抖音单平台点击量破亿,点赞数近 300 万,引发了大众热烈的讨论及强烈的舆论反响,提升了太和文明论坛在民间的知名度。

相关媒体报导（部分）

- 人民网 【人民网 - 国际】第五届太和文明论坛将于 9 月 5 日在京举行
- 【人民网 -English】5th Taihe Civilizations Forum to be held in Beijing
- 【人民网 - 国际】纵论天下古今 第五届太和文明论坛开幕
- 【人民网 -English】2021 Taihe Civilizations Forum launched online, casting eye o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 【人民网 - 国际】第五届太和文明论坛经济科技分论坛——实现“双碳”目标应加强国际技术交流与合作共享
- 【人民网 - 国际】第五届太和文明论坛经济科技分论坛“碳系列指数”发布会召开
- 【人民网 - 国际】第五届太和文明论坛国际关系分论坛——吴海龙：美方要理性、客观、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的发展
- 【人民网 - 国际】第五届太和文明论坛国际关系分论坛——王湘穗：中美良性竞争应恪守四个原则
- 【人民网 - 国际】第五届太和文明论坛国际关系分论坛——李成：中美之间应加强两国人文交流联系
- 【人民网 - 国际】第五届太和文明论坛国际关系分论坛——董云裳：中美之间存在多种合作可能性
- 【人民网 - 国际】第五届太和文明论坛国际关系分论坛中美关系研讨会——美方应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的发展和中美政策
- 【人民网 - 国际】第五届太和文明论坛国际关系分论坛中欧关系研讨会——中欧务实合作基础牢固 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主流
- 【人民网 - 国际】第五届太和文明论坛青年对话分论坛——疫情及气候变化加速推动工作方式转型与发展
- 【人民网 - 国际】第五届太和文明论坛教育文化分论坛——让职业教育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发展
- 【人民网 - 国际】第五届太和文明论坛闭幕 聚焦科学文化共同价值

【人民网 -English】2021 Taihe Civilizations Forum concludes with focus on “Scientific Culture” and “Common Values”

【人民网 - 国际】提供低碳发展中国方案 展现气候治理大国担当——第五届太和文明论坛经济科技分论坛与会专家解读“双碳”目标

【人民网 -English】Experts chart way forward for China’s vocational education

凤凰网

【凤凰新闻客户端】第五届太和文明论坛将于 9 月 5 日在京举行

【凤凰新闻客户端】纵论天下古今 第五届太和文明论坛开幕

【凤凰网《风向》官方大风号】特朗普卷土重来,拜登“中产阶级”外交政策能否奏效?李成解读

【凤凰新闻客户端】第五届太和文明论坛闭幕 聚焦科学文化共同价值

【凤凰网视频】欧盟驻华大使就中方反制裁大放厥词,吴海龙怒斥:你制裁我,不让我制裁你?这毫无道理

中国网

【中国网 - 智库中国】第五届太和文明论坛将于 9 月 5 日在京举行

【中国网 - 新闻中心】中美关系成美国政治内斗“牺牲品” 拜登对华政策难有作为

中评社

【首頁 - 外交縱橫 - 高層外交】纵论天下古今 第五届太和文明论坛开幕

【首頁 - 中評社記者專欄】太和文明論壇邀中外專家議中美關係去向何方

【首頁 - 智庫匯聚】崔立如:拜登政府对华有五类政策目标

【首頁 - 中評社記者專欄】周波談中美海上風控:最重要是討論危機管理

封面新闻

【封面新闻客户端】第五届太和文明论坛在京开幕 中外学者探讨全球可持续发展之路

每日经济新闻 【每日经济新闻客户端】专访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政策所副所长董战峰：我国推进“双碳”有良好基础，碳市场发展要形成规模效应

【每日经济新闻客户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中美应建立良性竞争关系

【每经网首页 - 世界】荷兰驻华大使 Wim Geerts：中欧合作对共同繁荣、应对气候变化至关重要

【每经网首页 - 世界】耶鲁大学蔡中曾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 Susan Thornton：中美可优先在疫情、气候变化等领域合作

【每经网首页 - 要闻】李俊峰回应每经：实现“双碳”最迫切的技术突破是构建新型电力系统，需要储能技术作为支撑

【每经网首页 - 要闻】专家热议碳达峰、碳中和实施路径：“双碳”不能只依赖颠覆性技术，关键在于把传统技术用好

【每经网首页 - 智库要闻】云端办公或成后疫情时代重要选择

【每经网首页 - 智库要闻】未来学家俱乐部联合发起人郑科骥：“游牧式”将会成为未来工作的重要方式

【每经网首页 - 商学院动态】长江教育研究院方晶：发展职业教育需提升企业参与度 破除‘校热企冷’困局

【每经网首页 - 商学院动态】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孙诚：发展职业教育需加强顶层设计，深化校企合作

【每经网首页 - 商学院动态】聚焦职业教育“适应性”太和文明论坛教育文化分论坛落幕

CGTN [CGTN-World] After Afghan withdrawal, will U.S. turn to China?

[CGTN-Miss Wow China] China to Spend Trillions to Stop Climate Change

[CGTN-China] Future of work: Will breaking up with the office last forever?

南华早报 [China-Dilomacy] ‘You don’t even understand the basics’: Chinese ex-diplomat lashes out at EU envoy

大公网 【首页 - 新闻】专家:中美关系成美国政治内斗“牺牲品” 两国未来寄望民间交往

中国教育新闻网 【网易号 - 中国教育新闻网】提高职业教育适应性从何处发力

明报 【每日明报 - 中国】京智库論壇 談中美歐關係 吳海龍:歐洲應學會接受中國崛起

【每日明报 - 中国】中美學者論未來關係:需為競爭設邊界

【每日明报 - 中国】專家:美對華政策只有更強 中美關係看民間

【即时新闻 - 两岸】政治風險專家:未來中美脫鈎預計愈見明顯

【每日明报 - 中国】歐美海上頻軍演 華學者:易擦槍走火

China Daily [Home-Opinion] Action planned

[Home-Opinion] Tech support

China Watch [Exclusive] Tech support

[Exclusive] Action planned

东方卫视 【东方卫视 - 看看新闻】视频 | 专访王在邦:美国疫情“甩锅”中国体现心虚

中华网 【中华网 - 新闻】纵论天下古今第五届太和文明论坛开幕

【新闻 - 聚焦】【2021 太和文明论坛:国际关系分论坛】姜晓琪:用文明话语体系探讨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问题

【中华网 - 中国新闻】吴海龙怒斥欧盟驻华大使:你连最基本的都不懂!

中国青年报 【中国青年报】第五届太和文明论坛青年对话分论坛——疫情及气候变化加速推动工作方式转型与发展

教育信息速报 【潇湘晨报 - 教育信息速报】刘京辉:从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看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

新浪财经 【新浪财经 - 产经】专家热议碳达峰、碳中和实施路径:“双碳”不能只依赖颠覆性技术,关键在于把传统技术用好

东方财富网 【首页 - 财经频道】专访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政策所副所长董战峰:我国推进“双碳”有良好基础,碳市场发展要形成规模效应

环球网 【国际新闻 - 国际要闻】专家:病毒溯源政治化是对国际合作抗疫的巨大冲击
吴海龙怒斥欧盟驻华大使:欧盟不顾事实,不分是非,颠倒黑白!

ChinaZ.com 【首页 - 传媒】陈智敏: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在实现碳中和目标中的作用,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中的伦理和法律问题

北晚新视觉网 【北晚在线】吴海龙怒斥欧盟驻华大使:你的见解我非常震惊!

澎湃新闻 【澎湃媒体】吴海龙怒斥欧盟驻华大使:你连最基本的都不懂!

光明网 【光明网】吴海龙怒斥欧盟驻华大使:欧盟不顾事实,不分是非,颠倒黑白!

央视新闻 【长江新闻号】欧盟驻华大使无端攻击中国外交政策 吴海龙有理有据驳斥
如果欧盟要制裁中国 中方当然可以用各种方式反击

网易新闻 【网易首页 - 前沿时刻】为立陶宛撑腰?西方悍然突破“一中规则”,中方痛斥欧盟驻华大使

【网易视频 - 首页】欧盟驻华大使连最基本的都不懂,吴海龙当面回击,一句话特别解气

人民资讯 【人民资讯】吴海龙:世界上只有美国不按国际规则办事

观察者网 【观察者 - 微信订阅号】吴海龙怒斥欧盟驻华大使:你连最基本的都不懂!

【观察者网首页】前驻欧使团团团长吴海龙怒斥欧盟驻华大使:你连最基本的都不懂!

塔斯社 Эксперт: Китай может применить к Литве мер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воздействия из-за Тайваня

Interview with Mr. Zheng Ruolin by TASS at the 2021 Taihe Civilizations Forum

Эксперт: наука позволит человечеству исправить большинство ошибок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общества

Interview with Mr. Qian Feng by TASS at the 2021 Taihe Civilizations Forum

Эксперт считает, что Китай и США вряд ли объединят усилия для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Афганистана

欧洲时报 【欧洲时报】专家:中欧务实合作共赢仍是双边关系主流

【欧洲时报】专家:中欧经贸互补性强 应扩大合作

【欧洲时报】荷兰驻华大使贺伟民:欧中密切合作至关重要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画卷 - 经济】专家:中国数字人民币可以在境外使用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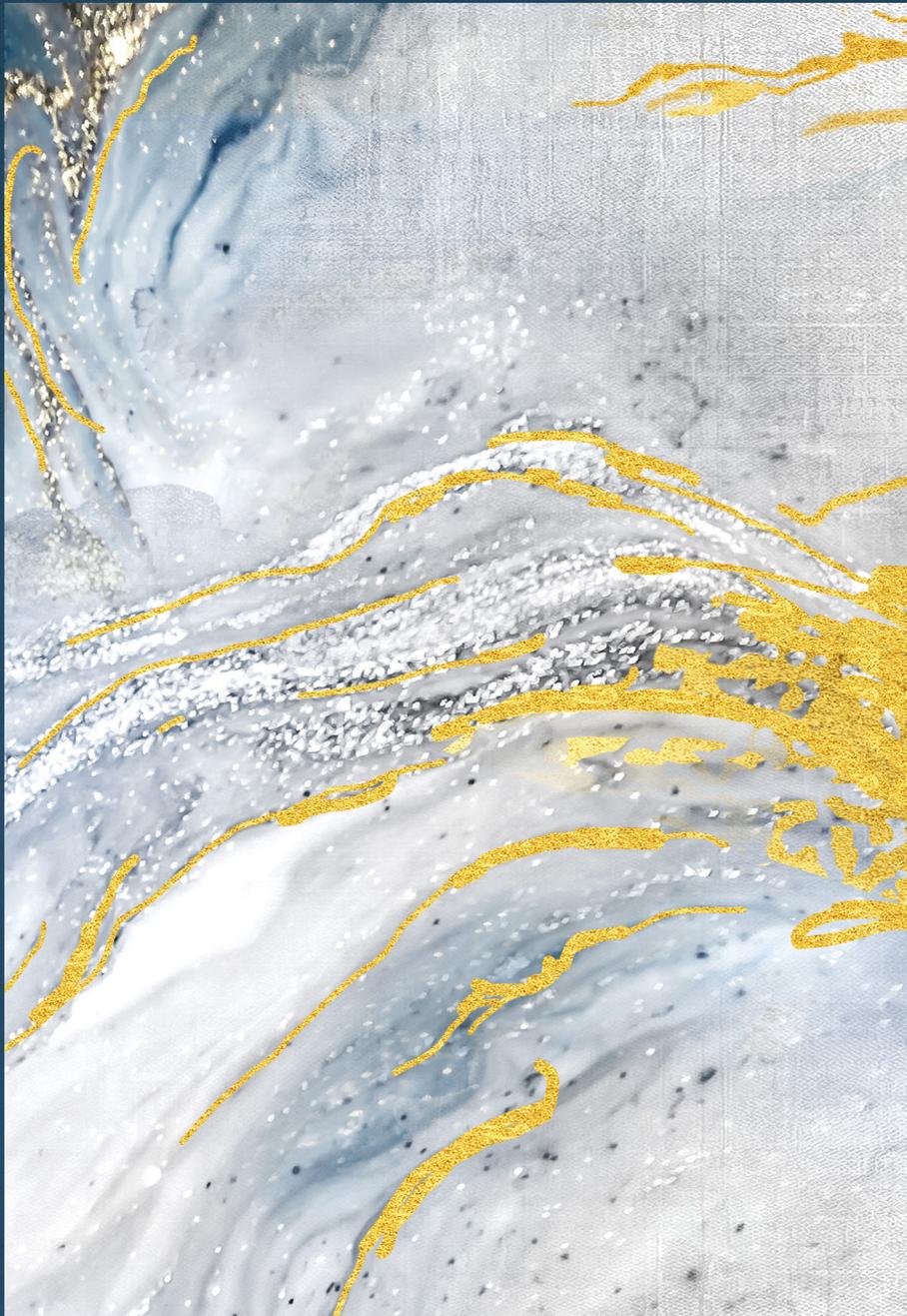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画卷 - 军事】中国专家解释中国连年增加军事预算的原因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画卷 - 政治】中国专家:中美关系在拜登任内很难改善

Китайский эксперт усомнился в улучшении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США



太和文明论坛
Taihe Civilizations Forum



电话 +86-10-84351977

传真 +86-10-84351957

网站 www.taiheinstitute.org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南路
甲52号 顺迈金钻大厦23层
100022

